

炎黄春秋

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

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最后岁月

郑炎潮经济理论的创新与遭遇

粟裕与淮海战役

共和国才子廖鲁言

第**7**期
2004年
炎黄春秋杂志社主办

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

● 张根生

1949年3月初,接到冀中区党委的通知:调我南下,立即到石家庄集中。当时中共中央华北局决定,以山西晋中区党委为主,组成一个南下区党委班子,随大军南下。这个南下区党委下属五个地委、专署,由晋中区出三个地专班子成员,察哈尔省、冀中区各出一个地专班子成员。华国锋是晋中一个地委班子的宣传部长,我是冀中地委班子的专员,互不认识。我们这一批南下干部在石家庄,听了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传达之后,3月16日就出发南下,原定是分配去湖南的,到了河南省时,因为湖南尚未解放,便集中到巩县县城待命。此时中原局机关正住在开封,为了充实机关干部,决定从各地南下干部队伍中抽出一部分人到机关工作,因此,我被抽到中原局(后改为中南局)政策研究室工作,直到5月初武汉解放了,我们随即赶到武汉。到8月,湖南和平解放,他们都去了长沙,这批人后来大部分分派到湘潭地区各县。1950年初,我下乡去湖南湘中地区调查了解情况,曾去湘阴县,华国锋当时任县委书记,以后我到广东工作,有时到中南局开会也见过面。

1963年10月,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华国锋和李瑞山,带领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地委书记等33人到广东省来参观水利建设和农业生产。广东省委派我(当时任省委候补书记)和杨德元(佛山地委副书记)陪同参观珠江三角洲的电动排灌工程和花县的水利灌溉工程,同时看了6个人民公社农业发展情况,共有八九天的时间,在相互学习、相互交流中,大家就熟悉了。他们回到长沙后,给党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毛泽东和党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批转了这个报告,表

扬了湖南省委虚心学习、反对骄傲自满和固步自封的精神。后来两省来往就更多了,人也更熟悉和了解了。不久在华国锋、李瑞山的主持下,湖南省修建了洞庭湖大型排涝和韶山灌溉工程,对湘潭等地区的农业生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和赞扬。

1972年,我由下放煤矿调回广东省委工作之后,多次去北京参加计划会议、知青工作会议、农业学大寨会议,参与修改人民公社60条等。1977年秋,我调到国家计委、农林部工作,此间华国锋先后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总理等职务,因此接触比较多。

印象深刻的有三件事。第一件是1973年6月全国召开知青工作会议时,华国锋当时是参加国务院业务组的成员(类似副总理职权),主持这次会议,我是作为广东省委革委会副主任来参加会议。会议期间,我找他个别谈过一次话,向他谈了中央派赵紫阳回广东工作时,周总理亲自向丁盛明确说了中央决定叫赵紫阳负责省委全面工作,赵也在现场,而丁盛回来在会上却宣布赵紫阳只分管省革委会的全面工作。赵对农村工作是很熟悉的,但他提出的一些意见不被重视。谈话后华就立即向周总理作了汇报,事情很快得到解决。中央立即决定任命赵紫阳为省委第一书记,免去了丁盛的职务。而且,由此事引起了党中央注意,发现有的人思想上受到了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影响,发展下去很难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因此中央作出决定:除少数人转业到地方工作以外,全部支左干部都撤回部队去,过后证明这是十分重要的正确措施。

第二件是在那次会议中间,当时任浙江副省

长的冯白驹同志在北京突然病逝了，华国锋、纪登奎找我去参加给白驹同志作生平的评价，纠正了原来1958年广东省委对冯白驹同志的错误决定，肯定了他在海南岛长期坚持革命武装斗争，23年红旗不倒的重大功绩，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作出了比较公正的结论。虽然没有宣布完全平反，但在那时也算比较好了。

第三件就是1976年7月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他依靠谷牧副总理和国家计委的几位副主任，以及到会的大多数领导干部，与“四人帮”进行了激烈斗争，我参加了这次会议，是中南大组召集人之一。本来这次会议是要解决反击右倾翻案风后，经济严重下降的问题，但“四人帮”提出要批条条专政，进行干扰破坏，原定开半个月，分两段各七天，结果进行了20天也毫无结果。上海帮的王洪文、黄涛，辽宁的毛远新更直接指挥沪辽两省市代表提出追查国务院的务虚会，把矛头指向李先念、余秋里等副总理包括华国锋总理，妄图把他们打成邓小平右倾翻案风集团。这时又发生了唐山地震。华国锋果断与谷牧和国家计委商量之后，简单讲了讲话，便立即结束会议，全力投入救灾工作。

1982年5月，我因患胸壁结核到北京医院住院开刀治疗。华国锋因患高血压、糖尿病也在北京医院住院，因此在早晚散步时较多见面。我俩也曾进行过一些简要的交谈。如：我曾向他提出过他不应搬到官园去住，不应该听陈永贵的意见，搞大队、公社的穷过渡。但并未深谈。近几年他到广东来了一次，我也去了北京两三次，见面谈的比较多。经过了10多年的形势发展，我对党内的斗争情形有了一些了解。1999年3月9日上午，我亲自询问了华国锋当年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他详细向我介绍了当时的经过情况。

华国锋说：1976年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困难的一年。“四人帮”在这一年里疯狂地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1月8日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总理去世了，在“四人帮”的策划下，发生了惨酷的镇压广大人民群众悼念总理的“四五”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又再次被打倒了，7月7日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朱德元帅也因病逝世了。叶剑英元帅被借口身体不好暂停工作。李先念、

余秋里等几位副总理都无法工作，分别离京到外地“养病”，只有谷牧副总理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四人帮”又让李素文、吴桂贤、孙健、姚连蔚等直接管理几个方面的工作，以便于他们操纵指挥。在新闻传媒意识形态方面，更是由姚文元完全控制，一手遮天。他们以为我是他们夺权的主要障碍了，他们没把我放在眼中，又打又拉。我心中很明确：不能让他们一伙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但要把握好时机。政治局常委只剩四人了，王洪文、张春桥占两人，叶帅和我也是两人。而且76年2月7日，毛泽东又决定让叶帅养病休息，由陈锡联代替负责军委工作。当时谁也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在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任命我代国务院总理的通知中加了叶帅休息这么一句。我估计这和江青“四人帮”和毛远新造谣污蔑叶帅反对文化大革命有直接关系，在政治局委员中，除“四人帮”外，大都是反对他们的。

当年9月9日，我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了。“四人帮”认为时机到了，因此更加变本加厉地进行篡党夺权活动，党和国家真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四人帮”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建立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力量。张春桥的弟弟（总政副宣传部长）亲自下到某坦克师活动，上海市再次给民兵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在党和国家危在旦夕之际，我于9月10日下午，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我和叶帅比较熟悉，在林彪搞的第一号令时，把叶帅分散到长沙住了较长时间，我与他接触比较多，1975年8月叶帅接见梅县地区县委书记时，还叫我去参加了见面。他是我们党德高望重的老师，在部队有极重要影响，所以我对他非常信任，在这紧急关头和“四人帮”势不两立，我早已下决心要搞掉他们一伙。因此派李先念去找叶帅联系。为提防“四人帮”察觉，李先念于13日借去北京市植物园的名义，然后突然转向前往西山。当时叶、李两人由于有一段时间没交谈了，互不摸底，相见时先是寒暄问好，又到院中走走，经过一段交谈之后，才转入正题，正式交换了对当前时局和对“四人帮”的看法，并转达了我的意见和派他来的意思，表示了看法和态度，但并未深

谈。

此前聂帅、徐帅和王震、杨成武等将军、老同志都向叶帅反映“四人帮”是一伙反革命分子，他们要篡党夺权，一定要高度警惕和采取措施粉碎他们的阴谋活动。

为了稳妥执行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我还亲自和叶帅直接取得联系，交换看法，作准备工作，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并找了汪东兴谈话，思想也完全一致。而且还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要挑选可靠人员。我还亲自找了北京市委吴德、吴忠谈话，指示他们要坚决防止北大、清华等学校的学生因不明真相，受到谢静宜、迟群的煽动闹事，要坚决杜绝一切意外发生。

当一切准备就绪后，10月6日晚，我和叶帅在怀仁堂亲自坐镇指挥，由汪东兴具体实施行动。当时是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参加会议，顺利地逮捕了他们，并由我当面向他们宣布：中央决定对其实行监护审查。由于姚文元不是常委，因此通知他是审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书稿，请他参加会议，这样姚文元也一同被捕了。江青是在中南海住宅里被捕的。与他们同时被抓的还有毛远新、谢静宜、迟群等。并且在抓江青、姚文元后都当面宣读了我签发的、对他们实行监护审查的决定。

在完成对“四人帮”一伙的逮捕任务之后，便立即通知政治局委员到玉泉山开会。我请叶帅主持，他要我主持先讲，我宣布了“四人帮”已被隔离审查，并着重讲了“四人帮”阴谋反党夺权，疯狂活动的罪行，为了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不被他们篡夺，不让他们的罪恶目的得逞，因此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粉碎他们的阴谋，严惩他们的罪行。叶帅介绍了对“四人帮”逮捕的经过，而且着重讲了全党全军都坚决反对他们一伙的反党罪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对他们采取非常手段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舆论部门都被他们

控制了。还有上海一伙反党分子已经发了大批枪炮，为了避免流血伤亡，稳定全国局势，被迫采取这种特殊手段，这是正常情况下不可采取的办法。经过讨论政治局一致表示拥护。

我先提议请叶帅担任党中央主席，他德高望重，两次挽救了党。叶帅则起来说提议要我担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这是毛主席指定你当接班人的，我已经79岁了，你年纪比我小20多岁，你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讲民主、尊重老同志，你应该担起这个重任。经过大家认真讨论后，一致通过叶帅的提议，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这也是临危受命吧。

华国锋在后来一次谈话中还说了：政治局会议后，各主要部门都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传达，大家都坚决拥护。但是纪登奎却没有在国务院立即传达。对此，我还批评了他，为什么在政治上那么不敏感。

近几年来，在与华国锋进行的交谈中，我还诚恳地提出了他在指导思想上的“两个凡是”的错误。他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这



1996年6月作者夫妇(左)与华国锋夫妇合影

就阻碍了一些受迫害的老干部及早出来工作,特别是不能早日纠正“左”的和极左的错误路线。可以谅解他的是,按其资历、经验、能力、政治水平,当全党的一把手,身兼三要职是有一定困难的,但这种情况是在一个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出现的,最高领导人支持纵容“四人帮”把党的老一代领导人统统打倒和靠边站了,而他确实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回想当时我们许多人对毛泽东都是有很大迷信的,华国锋也是一样。他不可能马上正确识别毛泽东晚期“左”的错误,他当时搞“两个凡是”又是想靠高举毛泽东旗帜来稳定大局,如只靠他本人的能力、威望是有困难的。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个月,在12月10日华国锋又召开了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上指出了全国农业情况十分严峻,有1亿多人吃不饱肚子。这说明了他对农业生产是十分重视的,这是正确的。但是他提出来的工作方针仍是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这就错误了。大寨起初是艰苦奋斗,狠抓农田基本建设的先进典型,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寨已经蜕变成以阶级斗争为纲,推行极左路线的典型了,因此在1977年至1978年的两年时间里,由于总的指导思想和采取的措施不对头,致使全国的农业生产虽有好转,但没有明显突破。与此同时,华国锋还继承了毛泽东提出的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遗志”,设想以此为突破口,开创农业生产的新局面。这也是不可能的。从我与他多年的接触中,他给我的印象是对党忠诚、为人忠厚、工作踏实、没有官架子、作风民主和团结同志好、能接受批评。华国锋同志对“四人帮”的斗争是非常坚决的,是冒着重大风险的,他恨透了“四人帮”,早已与之势不两立,因此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就下决心除掉这一伙反党反人民的反革命集团。这是他的优良政治品质的主要方面。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央曾召开了36天的工作会议,会议原定的主要内容是讨论经济计划和农业问题。当时我没有正式参加这个会议,但是我参加了会前三个农业文件的起草和会中对一些问题的研究,其中:一是修改《人民公社六十条》;二是修改《加强农业生产的若干意见》。在会议上经过大家讨论,对第二

个文件作了重大修改,而第三个文件《关于农业的长远规划》没有拿出来讨论。《人民公社六十条》在三中全会上获得原则上通过,但由于后来农村改革实行了包产到户,也就没有再提到全国人大会议上立法。加强农业若干意见写了二十多条,但却保留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并且写上了不要包产到户,这是由于当时还有较多的人在思想上不赞成包产到户,致使极力主张包产到户的一些省委书记不完全满意。但此次会议总的精神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对扭转形势推动农村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对当时的农业发展真正起了最大作用的是提高了20%的粮价;超额完成任务的加价50%;征购任务一定5年不变;多进口了一些粮食,以适当减轻农民的粮食征购任务。另外则是增加了化肥、农药等物资的投入。

当然,这次会议取得的最大成果是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因此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会议重点揭露、批判、清算了“四人帮”“左”和极左路线的严重危害,始终坚持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为指导。在会议之前,胡耀邦亲自组织撰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并且在全国展开了大辩论,这对于端正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会议明确宣布废除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确立以经济建设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的政治路线。

华国锋之所以在改革大潮汹涌而至之时,思想不能完全跟上形势,是与他长期在省、地、县委工作有关系。参加革命后主要是学习毛泽东指示,又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泽东提拔起来的。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他只能依靠树立毛泽东的威信,打着毛泽东的旗帜稳定局势,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在政治上,坚决反对“四人帮”破坏经济建设、取消党的领导、阴谋篡党夺权的活动。在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他就提出了不许批判“唯生产力论”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他的最大贡献就是支持全党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他在政治、思想、理论上都有局限性,这也是他犯“两个凡是”错误的主要原因。

应该肯定华国锋在主持这次中央工作会议,

和紧接着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所做的工作。他比较能发扬民主、接受大家对他的批评。当时所有人的发言都照登简报,可以指名道姓地批评任何人,是较好发扬民主的一次会议。会上华国锋对于自己的“两个凡是”和其他问题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并接受大家的意见,态度是诚恳的。对这次会议上大家强烈要求解决的一些问题,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和紧接着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先后解决了如下一些大家强烈要求解决的问题,其中包括:

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为二月逆流事件受到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为六十一人重大错案平反;为彭德怀平反;为陶铸平反;专案审查康生、谢富治。

这次会议对中央的人事安排,各组提出了很多建议,在正式召开的三中全会上得到了解决。

在这几次的交谈中华国锋还讲了,他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时,完全赞成和主张转向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他提议由谷牧带领国务院考察团去西欧五国访问,回来汇报时提出借鉴国外设加工区的做法,建议建立加工区等措施,他是赞成和支持的;习仲勋建议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等措施,邓小平确定先在深圳建立特区并定名为“特区”等,他都是赞成的。当时任仲夷在辽宁,提出了大连也应建立特区,他也是同意的。

历史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客观记载,整理和编写历史,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真实地反映历史事件的全过程。在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应本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判断其是非功过。只有这样才能留下真实的历史资料,并接受有益的经验教训。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曾经提出所谓“历史要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在广州举办的毛泽东“四个伟大”的展览中,竟然出现了毛泽东与林彪井冈山会师握手的大照片。这是政治野心家任意篡改历史的一次丑恶表演,在人民群众中曾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也正是这个期间,被林彪第一号令赶出北京来到广州从化温泉的朱德、董必武、邓子恢等革命元勋,在王首道同志的陪同下,有一天到展馆参观,一进门邓老首先

看到那幅“毛林会师”的巨幅照片,立即就说“井冈山会师是毛泽东与朱老总会师的啊!怎么成了这样?这是历史,可不能随便改变的。”朱总司令和董老听了都笑了笑,什么都没说,陪同的王首道很不好意思,也没有办法回答是怎么搞的。

华国锋在“两个凡是”上是犯有错误的,按他的政治经历和水平,一身担任党的中央主席、总理、军委主席是不很合适的。但那是当时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洪流把他推上这个地位的。粉碎“四人帮”是他和叶帅取得联系,一致行动,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应该承认华国锋是起了极为重要作用的。但后来有一个时期,社会上有些书籍、报刊和个人讲话,根本不提华国锋的作用,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在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这场斗争中,叶帅的确是起了极重要的作用,他和许多中央老同志作了大量酝酿准备工作(详见范硕著《叶剑英文革“风云录”》),可以说华国锋与叶剑英是一同起了决定作用。由于华国锋当时所处的地位,是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主动与叶帅取得联系进行这场斗争,其决定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否则,叶帅当时首先提议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等职务,并经政治局一致通过,就会是不妥当和不应该的了。至于后来华国锋不适宜身兼三个第一把手,经过中央会议改选是另一回事。但他主持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并充分发扬民主,作了自我批评,接受大家的意见,为“四五事件”和许多中央领导人平反昭雪,并调整了中央领导核心,都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在近五届全国党代会上都选举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也可以说是对他的肯定和评价吧!

(此文转载自《中国农村改革六十年回顾》。此书2004年5月由海天出版社正式出版。此书已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2003年审读通过,由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出版管理司于2003年11月14日备案修改批准出版。作者今年5月19日将此文推荐给本刊发表时,只对文章个别地方作过技术性改动。作者张根生,吉林省原省长、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责任编辑 致中)

郑炎潮经济理论的创新与遭遇

●
陈
敏

最早提出“私营经济”

陈敏（以下称陈）：我想了解一下你二十五年来理论探险、思想探险的历程，可以称作郑炎潮历险记，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是讲讲你作为广东理论界的改革先锋之一，与广东理论界其他改革先驱如卓炯等，及与广东政坛的改革先驱比如任仲夷先生等等的互动。第三个层面是把你和你的师友们的理论历险、思想探险与广东改革开放二十五年的历史联系起来考察，把你们的个人命运和广东二十五年的命运联系起来考察。

郑炎潮（以下称郑）：那我就谈一下。关于这些问题，我手头有一些资料，这些资料很陈旧，但应该还有价值。（手持已发黄的1982年研究生毕业论文，封面题目是《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及其发展》）这是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是我最早和最有代表性的论文之一，是今天要谈的我的第一份历史资料。这是论文原稿，写成时间是1982年。当时我的导师是黄家驹教授和丁家树教授，但我精神上的导师主要是著名经济学家卓炯教授，当时他在广东社会科学院任副院长，兼任华南师范大学经济学研究生的授课和指导导师。现在看来，这份论文的学术价值我认为有两点：其一，在我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营经济”概念；其二，提出“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理论是经济改革的基础理论，它决定着经济改革的方向、目标、内容，关系到我国在这次改革中能否探索出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我国应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

（手持另一份资料，封面题目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篇文章是我在小平南巡之前写的，小平南巡是1992年春，我这篇文章是1991年11月结的稿。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小平南巡之前学术界已有探讨，并留下了一些文稿，但开始没人敢发表。小平南巡后，就马上发表了，这篇是在广东《学术研究》杂志1992年第一期发表的。

苦难出学者

陈：可以先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学术生涯吗？

郑：我是西安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的，毕业后分在陕西一个汽车大修厂工作。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制度，1979年我考入华南师范学院读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

陈：这是你的幸运，你的学术生涯从广东开始，从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开始。

郑：是的。正因为身在广东，而我国改革开放广东先行一步，所以我把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广东省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进行超前性的理论研究。

我1979年进校，1980年确定论文题目，1981年开始写。写之前

已允许个体经济发展并且很多个体户雇工人数已大大超过政策规定(当时只准许雇工八个),已经有了特区(深圳特区是1980年年底挂的牌)。广东的个体经济、中外合作经济、外资企业和私营经济最早发展,为什么呢?一方面因为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方面因为广东是侨乡,百分之七八十的港澳同胞和华侨是从广东出去的,国门刚打开,港澳同胞和华侨就回乡投资或支持亲人发展个体经济或中外合作经济等。所以我的理论不是个人空想出来的,是先有这些社会实践作研究素材,我才能够写出我的毕业论文。为什么我的毕业论文产生在广东,而不是产生在别的地方呢?因为当时内地没有这些社会条件。

陈:你是理工科出身,为什么会转向社会科学研究?你的这种理论兴趣跟你的个人生活有什么关系吗?

郑:我的人生转向、我的理论兴趣跟我的个人经历是分不开的。我的老家是著名的侨乡之一广东恩平,大学时代,每次放假回家总要听到很多偷渡香港或国外的故事,总有一些乡亲突然就再也见不到了,甚至有一些乡亲因为偷渡淹死在海里,这对我刺激很大。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选择中国生存发展,而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偷渡境外?为什么我的同胞苦难深重,而报纸上却始终莺歌燕舞?我不能不思考,中国到底怎么啦?中国的路到底该怎么走?

我以前是学理工科的,读大学以前,我没有任何社会理想,我是农民的儿子,父母都是文盲,苦了一辈子。我考大学的目的,就是离开农村,吃商品粮。进大学后正好碰上文革,文革给我们带来灾难和伤害,同时也激发我们反思和追求。我发现我不适

合搞理工科,下决心改行。这里也有一个故事。大学时代,我曾经是重点批判对象。我本来“根红苗正”,和当时的所有红色青年一样盲目崇拜。后来我为什么从崇拜转到怀疑?家乡的苦难教育了我,文革的苦难教育了我。为什么跑那么多人又死那么多人?为什么停工停产?为什么搞武斗?为什么搞残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些问题从自然科学和理工科教科书中是找不出答案的,于是我相信只有研究社会科学,才能找到救国救民的道路。那时我先读马恩列斯毛传记,后来又读华盛顿、拿破仑等名人的传记,渐渐得到一个启发,就是要树立伟大的志向,干一番事业,这就渐渐改变了我原来那种纯朴的、原始的、中国式的所谓个人理想。开始从一个听话的孩子,变成一个怀疑者、一个“问题”青年了。

陈: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

郑:我66年迷信般的崇拜,67年还崇拜,68年开始怀疑甚至是“叛逆”,反对文革,怀疑林彪,认为毛泽东思想也可以一分为二。69年就开始寻找自己独立的思想。我的一帮同学,都有这个经历。

陈:不是你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

郑:对,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都很不幸,有的被打成反革命,有的被捕坐牢,有的被流放到



任仲夷(左)与郑炎潮交谈

新疆或西藏。我是比较轻的,没抓我,只是作为系里的重点批判对象,大会小会批,并隔离起来,两个同学看守,从吃饭到睡觉、到上厕所都跟着我,搞了半年。那时我还不到二十岁。

陈:也就是群众专政。

郑:对,群众专政、同学专政。毕业时,我的鉴定是这样写的:“犯过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政治错误,不能重用。”然后把我送到部队农场锻炼,再分配到工厂从事技术工作。一直到报考研究生前三个月的1979年3月,西安交通大学平反“错案”,才通知我的工作单位将我的原鉴定撤消。

我为什么要研究社会科学?因为现实让我困惑,我的思想挨批判而无法找到答案。我用业余时间看了很多书,试图从书中找到答案,主要看马列经典。刚好机会也来了,1978年恢复高考,我下决心考研究生,转向研究社会科学。为了考研究生,我白天上班搞技术,利用晚上和业余时间把马克思写的三本《资本论》、三本《剩余价值理论》从头到尾通读了两遍,几乎每一页都有圈点或批注。我对马克思经济理论较熟,功底就是这时打下的。1979年,我考上了经济学研究生,实现了从事社会科学的愿望。

绝处逢生的一次会见

陈:还是回到开始的话题,从你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讲起吧。

郑:读研究生是我实现人生理想的起点。选定《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及其发展》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的题目。关于这篇论文还有几个故事。

我的毕业论文在全国最早提出“私营经济”这个概念。当时我在广东做了大量调研,根据这些调研我断定,个体经济蓬勃发展的趋势已经是不可阻挡。但当时有一个政策,个体经济可以搞,不过必须有一个量的限制,比如雇工不能超过八个。因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到了八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了。经过研究,我发现马克思的这个说法与广东改革开放实际不符。照搬马克思这个说法,对发展经济、对改革开放只会起束缚作用。我认为需要一个新

概念来定义和规范超过雇工八人的个体经济,叫什么呢?我当然不同意叫资本主义,就自己定义了一个概念,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但这个概念很敏感,政策不允许,又不符合马克思经典理论。论文答辩前夕,导师告诉我,关于私营经济那一章必须放弃,不放弃,你的答辩肯定不能过关。当时我很痛苦,到底是放弃自己长期研究和创新的理念;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计后果呢?我自己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学校也没法解决,最后还是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我们都知道,任仲夷书记是广东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他1980年到广东,来之后遇到了难题,因为政策规定个体经济雇工不能超过八个,但广东的个体户相当多,雇工十几个,二十几个,甚至几百个都有。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办?他也很苦恼,当时就要广东社科界研究。那时我没参加有关会议,我还只是一个研究生嘛。但我听到了这个消息,很高兴,我正好研究这个题目啊。于是我从毕业论文中抽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那一章的打印稿,没有作任何修改,用信件单独寄给任书记。我的研究生论文九万多字,这一章大概近万字。

陈:是用平信还是挂号信寄?

郑:平信。信封写上“广东省委任仲夷书记收”,贴了一张八分钱的邮票,就寄出去了。

陈:你为什么要选择直接寄送给任书记呢?

郑:为什么我要直接寄给任书记?因为当时我的印象中有这么一件事,听说中国社科院比我早一届的两个学经济的研究生来广东调研,任书记亲自接见他们。这让我很意外也很感动,我想,堂堂省委第一书记,原来这么平易近人,连研究生调研也接见,那我为什么不试探一下,看看我的论文能否引起书记重视?

当时对这事,我是既抱希望又不抱希望。抱希望是因为我认为,要是任书记能看到我的文章,那么它应该有参考价值,对解决广东的现实问题应该有作用。不抱希望是因为任书记肯定忙,一封平头老百姓的普通信件,他未必能看到。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不到一个星期,任书记的电话就打过来了。不是直接打给我本人,是打到我们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处办公室的。任

书记说找郑炎潮,办公室主任说小郑不在,有事我们转告吧。任书记说不行,这事没法转告,一定要和小郑本人谈谈。任书记留了一个电话号码给主任,要我晚上跟他联系。

我当天晚上就直接与任书记电话联系。电话拨通,我问你是任书记吧?他说是啊。我说我是郑炎潮,你打电话找我呵?他说,是啊,我打电话找你找不到啊。我说什么事呵?他说,你的论文,我收到了,我看了之后,觉得非常好,我想约你谈谈这个事,你有没有时间来?我说可以啊,我也想请教你啊。他说明天来吧,怎么样?我接你过来。我说,不用接,我自己坐车就行了,我知道你在省委。他说,你不用自己来,我派车接你。他好像很为难,说是他请我的怎么能让我自己去。但我不想来一辆省委的专车到学校接我,我不想惊动大家,想低调一些。于是我坚持自己去,说不用劳烦你。任书记只好同意了,并告诉我下午3时在省委办公楼三楼他的办公室等我。

按约好的时间,第二天下午两点半快三点钟的时候,我赶到省委,给门卫说任书记约我来的,门卫就把我放进去了。我直接就到了任书记的办公室。

陈:他的办公室没有别的人?没有秘书把关?

郑:没有别的人,我直接就找到他了。他要我先说说论文的基本观点,我就把论文主题结合调研资料和一些具体案例,做了一个简单的陈述。然后任书记讲话,他的大意是说,现在对个体经济,只能扶持不能压制,但要扶持个体经济,首先就要给个体经济正名,如果个体经济头上始终悬着一把“资本主义”的达摩剑,个体经济还怎么扶持?还怎么发展?到底超过雇工8人的个体经济该叫什么?他们也没想好,也还没有制订新的政策和办法。他说,刚好这个时候看到你的论文,你的论文非常好,为我们的决策提供了重要

依据,我们正在苦恼着啊,个体经济超过了马克思的“八个规定”,我们不好坐视;但如果我们管错了,又会压制新生力量,给我们的经济带来损失。你这个“私营经济”的概念提得好,它不属于传统的公有经济范畴,但又不是资本主义的,按你的说法,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构成,并且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辅助和补充”,它不但没有损害社会主义反而发展了社会主义,那么它当然是有益的,当然不能够约束它,它该怎样发展就怎样发展。所以你的论文非常好,我支持你。并且我们还要围绕着你的这些观点,制定一个政策,给它取个正式的名字,就叫做“私营经济”怎么样?让它发展,让它壮大。

最后,任书记鼓励我继续研究。他非常理解搞社会科学的难处。用他的原话就是:“在中国搞学问不容易”“有风险”。当时我的论文还没有答辩,但导师已经提醒我有麻烦。我没给任书记讲这事,但任书记好像知道似的。他说:“你搞这个有风险,你已经超出了马克思的书本,人家说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说你反马克思你就成了反马克思。”我说,我没有反啊,我说马克思也主张解放生产力,列宁还有“新经济政策”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借鉴呢?他说,你这个比较好,但真做学问,终究是有风险的。不过你不要怕,时代在进步,你要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选准自己的研究方向,选准了方向就要坚持下去,坚持自己的追求,坚持自己的学术品格,不要为任何非学术的评价所动。

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在广东,对我影响



郑炎潮 1993年在泰山

最大的有两位,一个是我的精神导师卓炯,再一个就是任仲夷。晃眼二十多年过去,两位恩师一个已经故去,一个还在世但已是风烛残年。真是岁月无情。但无论岁月怎样无情,两位前辈的人格和精神会激励我一辈子从事学术研究。

陈:任书记跟你的谈话持续了多少时间?

郑:任书记跟我谈话,开始时不到下午三点,谈到下午五点。后来他说,小郑我要处理个事,你再和我们政策研究室的雷宇同志谈一谈,我就失陪了。雷宇是从辽宁跟他来的,他从辽宁来广东别的什么人都没带,就带了个雷宇,安排在政策研究室当主任。他把雷宇介绍过来,我跟雷又谈了将近一个小时。

陈:那么在他接见之后,你的毕业论文就很顺利地通过了,没什么阻力?

郑:对。本来有麻烦,但任书记接见之后,导师对我的看法改变了,并且有些领导放了一个风,说我们学校培养了一个很好的研究生。我的毕业论文因此顺利通过。

陈:一次接见改变了你的毕业论文的命运,也改变了你一生的命运。

郑:是的,如果没有任书记的接见,毕业论文通不过,那我就不能毕业,就没有人敢要我了。当然也有出路,但肯定没有学术上的出路,我的研究生涯也许就此终结了。

陈:后来还同任书记有联系吗?

郑:有,后来我们还会面过两次,一次是1988年,一次是2000年2月。

陈:都谈些什么内容呢?

郑:1988年,我听说他身体不太好,去看望过一次,问候性地说些保重之类的话就走了。2000年2月,由原广州市市长杨资元安排我和任书记在广东大厦谈了一个多小时。我们两人回顾了“私营经济”从不允许存在,到概念提出和转为政策扶持,到现在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短短二十多年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我们感到非常欣慰。

三大群体推动广东改革

郑:刚才谈的是决策者,现在回到学术界,谈卓炯。卓老是广东理论界先驱,是我们广东理

论界80年代的一面旗帜,也是全国的旗帜之一。他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商品经济,80年代初提出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对我国突破计划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当时卓老是我的授课老师,主讲《资本论》,开专题讲座。

陈:当时他带几个研究生?像不像现在有些导师动不动就带十几个、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研究生?

郑:没有的事。那时我们经济学专业总共才六个研究生。我的论文也得到卓老的指导,所以说卓老是我经济学研究的启蒙老师之一。我跟卓老感情很深,研究生毕业我分到广东省社科院,就是他把我要去去的,在他的主管和指导下进行研究。当时可以留校,或者去政府部门和大企业,但我还是选择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其实在学术上我跟卓老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卓老对我影响最大的还不是学术,而是人格。他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人格和学者品格影响我。做学问,最重要的就是人格。

照我的看法,广东改革开放的推动者,大致有三个群体:一是以任仲夷、习仲勋、袁庚、梁湘为代表的政治家,他们有思想,敢创新,负责任;二是以卓炯为代表的一批理论工作者,他们大胆探索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探索多元经济成分、探索对外开放理论,使广东理论界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处于超前地位,不断有新理论为改革开放先行做决策参考;第三是企业家,个体企业家、私营企业家和外资企业家,各种非主流企业家、非公有制企业家及国有企业家,他们改革探索,不断创新,为广东理论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社会实践的活水。三大群体联手推动广东改革开放,广东才有今天,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基本评价。

坚持改革的市场取向不动摇

陈:刚才主要谈了“私营经济”理论引出的风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两个概念也是你较早提出和一直坚持的,这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

郑:我为什么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因为当时出现一个问题,中国改革目标

究竟是坚持计划经济为主还是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之路,我很困惑。当时广东的实际情况是,价格慢慢放开后,一半以上价格由市场调节,形成了市场价格为主的新格局,而我们在理论上宣传上,还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就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状到底如何评估?改革的路到底该怎么走?改革之初我们“摸着石头过河”,这可以理解,因为我们走的是前人没有走过的改革开放之路,我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陈:和红军长征一样。同样是绝境突围,同样是最初时没有明确目标,走到哪算哪。

郑:是这样的。改革之初只能这么办。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的改革之初是没有理论准备的改革,是没有预先设计的改革,是没有整体方案的改革,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碰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但到了80年代中期,问题就严重了,广东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新格局:个体私营经济大发展,港澳台资和外资大量涌进,分配理论突破,价格放开等;现实与传统理论相冲突,我们必须确定改革的方向、目标和对改革进行总体设计。

因此,大概从86年开始,广东理论界就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概念,并公开发起对“市场体系”的系列研究。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了解广东市场发展的情况和广东人的困惑,察觉到了市场经济问题,提出研究改革目标和市场经济问题。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我并不清楚这个来头。省有关部门提出进行广东省综合改革试验方案研究,指定四个人,每人牵头设计一个。我是中青年学者的代表,我牵头设计的那个方案现在还在,方案明确提出广东要搞的是“市场经济”。1988年初,广东省经济学会、广州市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广东社科院、广东省商业经济学会、广东省经济发展中心、中山大学、华南师大等联合发起,召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双月研讨会”第一次会议,我提交了一篇关于改革目标是市场经济的文章,反响较大。那次研讨会结束之后,主办单位委托广州市研究中心主任王利文、我和广州市研究中心的张向荣三人,按大会研讨的精神写份高水平的研究报告,后来被媒体称作“三人团勇闯市场经济‘雷区’”。

王利文把我们安排在白云山制药厂招待所,与外界隔离了五天,形成《广州、广东实行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研究报告》。报告完成后,王利文到北京,将报告送给了当时的国务院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经济学家马洪,马洪又交给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等,吴敬琏做了热情洋溢的评论,马洪便通过有关人员把我们的报告和吴敬琏等人的评论一起送给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领导人非常关注,在报告上批示:“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和探讨的理论问题。”等于是充分肯定了我们的报告。随后,报告又在《红旗》杂志《内部文稿》1988年4月发表。至此,在市场经济理论这个问题上,广东理论界以广东市场转型的社会实践为主,结合国外经验,在全国理论界率先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改革的目标。这当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广东整个理论群体的贡献,广东理论群体的这个突破最终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

但在89年之后,“鸟笼经济”的主张盛行一时,市场经济理论则遭到严厉打压。所谓“鸟笼经济”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在当时环境下,广东省一些机构也组织“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研讨会”,请我参加,我拒绝参加。1991年11月,广东社科界召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理论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我参加了。我提交的论文旗帜鲜明,标题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用新的思维去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用新的思路去创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场就有朋友担心地说,“你这文章是不是太厉害了!”

陈:你1987年就主张并一直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我们接受这个概念是1993年也就是党的十四大之后。

郑:1992年小平南巡,讲过“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经济”,这是原话。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在此之前确实很少有人讲和一直坚持。1991年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理论研讨会”上提出这个概念,但研讨会不敢安排我做大会发言。《学术研究》杂志跟我很熟,我问与会编辑:能不能登一下?那位编辑直摇头,说这篇文章谁敢发。但他们的一位副主编会后看到我的文章,有点心动,说可以考虑吧。正在考虑,刚



郑炎潮 2004 年在香港

好 1992 年春小平南巡 ,他们听到风声 ,壮了胆 ,就把文章登出来了。

文章发表不久 ,小平南巡的消息公开报道宣传了 ,接着 ,十四届三中全会把中国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并写进了全会决定。我们广东理论群体十多年的苦斗至此总算有了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

经济改革的核心是产权

陈 :也就是说你们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

郑 :是结果 ,不能说是结局。因为纵然确立了市场经济理论 ,但我的困惑并没有解决。我讲的也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但这和通常意义上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并不完全一样。我主张的市场经济体系是以解决产权问题为基础 ,即以公私融合所有制和民族产业为基础 ,而不是以传统的公有制为基础 ;传统的 “公有制” 只能是传统的计划经济的产权基础 ,不可能构成现代市场经济的产权基础。以传统的公有制与现代的市场经济架构嫁接 ,这是很多人理解的所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而在我看来 ,这大错特错。传统的公有制跟现代市场经济根本无法兼容 ,现代市场经济需要自己独有的产权结构。因此 ,要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必须重组产

权。也就是说 ,当务之急是重构市场经济基础 ;只有在重构市场经济基础的前提下 ,才谈得上树立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 ,进而也才谈得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显然 ,就现在的情况来说 ,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 ,基础目标还没有达到 ;基础目标没有解决 ,框架、体系问题不可能解决。也就不能说确立改革目标的任务已经完成。我们理论工作者的思想探险之旅 ,远没有结束 ,我们还需要继续探索下去。

陈 :我注意到你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题目就是生产资料所

有制结构问题。

郑 :是的。在二十多年前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中 ,我已经意识到产权和所有制问题的重要性。这篇论文明确讲到 (拿着研究生论文指着说) : “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改革是经济改革的基础” ; “经济改革是生产关系的变革 ,而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既是生产关系的基础 ,又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彻底的经济改革 ,必须以彻底的理论为指导 ,不仅仅要解决计划与市场、集权与分权、行政管理与经济管理关系及物质利益分配等重大理论问题 ,而且必须首先解决并自始至终要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理论问题。”二十多年前形成这样的理念 ,我从未放弃 ,今天则更加强烈。

现在我可以讲讲我的另一篇论文《中国产权改革论纲——理论创新与总体构思》(手持论文原稿) ,这篇文章是我 1993 年春写的。广东的改革实践表明 ,多种经济成分大发展 ,私营经济大发展 ,股份制经济大发展 ,中外合作经济大发展 ,人民拥有的财产大量增加 ,产权交易比如房产交易等等已经存在 ,证券市场、金融市场都已经存在 ,产权市场已经形成 ,社会实践走得很快 ,理论不能回避 ,理论要迎头赶上实践。一定要确定产权改革这个目标 ,解决产权基础 ,刚巧也是跟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相呼应和延续吧 ?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改革的首要 and 根本的问题 ,在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后 ,这个问

题就显得尤其突出了。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后，广东省经济学会会长曾牧野教授、王利文和我等人又发起“联合广东八个学术团体、研究机构 and 高等院校，在南海市西樵山召开“市场经济与产权改革研讨会”，大家推荐我为大会秘书长。我撰写了《中国产权改革论纲——理论创新与总体构思》出席大会。

陈：你谈到的这个产权问题实在太重要，能否对你这方面的主张做更深入的说明？

郑：我的论文提出：“用市场经济新体制全面取代计划经济体制，最根本的是要彻底清除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基础——旧产权制度，创建市场经济借以建树的基础——新产权制度。”改革的根本是重构新产权制度。“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产权制度全面取代计划经济的旧产权制度，逐步建立一个以公民（个人）产权为基础，以多元化公有产权为主体，以私有产权为辅助的公产与私产长期并存、相互依赖、相互促进、互补长短、平等竞争、协调发展的公私混合产权结构；在产权多元化、分散化、社会化基础上，使产权运行、配置、管理市场化、法律化，形成各种产权自由联合的开放性、国际化的产权新制度。”基本想法就是：以公民为产权主体，混合产权结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整体架构，如果不是以真正的人民产权制度为基础，你叫什么完整的市场经济？而我这里的“人民”，当然不能是抽象的人民，而必须是实在的人民，具体的人民。实在的人民、具体的人民拥有实在的、具体的财产权利，经济上的人民主权才可能实现。有了经济上的人民主权，才谈得上其他领域的人民主权。我这篇文章的要点在《南方日报》发表了，大概发了两千字左右。当时就引起了不同反响，有的支持，有的则指斥为“私有化纲领”。我主张的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少数人的私有化，我主张的是广大公民拥有自己财产的民有化，我主张的民有化实际上就是保护公民财产权。公民财产权神圣不可剥夺，这是现代社会的题中应有之意。有些人把我的民有化放在资本主义私有化的筐子里，又把理论问题政治化。我在理论上的每次超前、创新，都是在对广东改革开放、中国改革开放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潜心研究基础上形成的，是在我觉得已经到了非解决这些要害问题不可的时候；但几

乎每次超前、创新，开始我都要受到不公正的评价，过一段时间又证明我的理论是正确的，就这么一个“否定——承认——又否定——再承认”规律。真是在中国做人难，做一个有良知的学者更难。但我现在一点不后悔，在中国进行理论研究和创新，必须做好付出代价的充分思想准备；而我在中国改革的转型期，尽了一个学者的责任和良知。

从一千年的沧海桑田中提炼我们的人生智慧

陈：关于你以后的人生，大概是怎样规划的？

郑：我有一个很宏大的规划。现在我已经五十七岁，我的生命不多了，充其量有二十年的学术生涯，因此我必须在有生之年，把自己的东西搞出来。从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到这个《论纲》，是我公开发表文章的一个“休止”，我不想再在报纸上发表没用的文章、应景文章，我要把中国放在人类历史的长河和世界的大舞台中，从西方、东方不同的道路，从西方、东方的兴衰成败，反思中国的命运，探索中国的未来之路，建立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

我在广东改革开放前沿的经历是二十五年，我的研究，始终以社会实践为前提、以社会需要为前提。所以不能说我是什么天才，只能说我生而有幸，生活在中国转型期这个大历史时代，生活在广东这样的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使我的大脑时刻受到现实的强烈撞击，使我时刻不满现状，时刻探索，进行超前研究。从私人所有到全面公有，再从全面公有到公私混合所有；从公有经济的兴衰到私有经济的兴盛，再到公私混合经济的新选择，这样的沧海桑田，人类或在西方可能花了上千年、数千年的时间，而在中国只用了半个多世纪。人生苦短，但我们的人生并不短，我们在一生中经历了人类上千年、数千年的沧海桑田，这是我们这代中国学者最大的幸运。能不能抓住这个机遇和幸运，从人类千年沧桑中提炼出真经、真知，从而建立我们的知识谱系、思想谱系，改变我们中国人的生存环境，这是我们人生成败的关键，我将毕生为之求索。

陈：谢谢！（责任编辑 吴 思）

先知者的遭遇

——读《马寅初传》札记

● 钱伯城

我读过三种《马寅初传》，分别是邓加荣著（下简称《邓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3月出版。杨勋、徐汤莘、朱正直著（下简称《杨、徐、朱传》），北京出版社，1986年4月出版。杨建业著（下简称《杨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

本文就书中所记“新人口论”事件，排比诠释，看看先知者在历史上的命运。

“新人口论”初出面世，即遭多人指斥，三本传记所记基本相同，时间为1955年6月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期间，内容互有详略（《杨传》162—163页）记载较详，引录于下：

研究了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又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他（马寅初）终于写成了一篇题为《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有关控制中国人口发展论文，而且准备在一届人大二次会上，以提案的方式，正式向人代会提出。但有谁能够想到，马寅初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满怀期望和信心地在浙江小组会上就这一问题发言以后，听到的却完全是一片反对的意见。他甚至因此而遭到了围攻和批判：

“我们根本不能同意你的意见！”

“在社会主义国家是没有人口问题的，你却居然在人代会上敢谈人口问题。这简直是放肆！大胆！”

“你所谈的人口问题，完全是马尔萨斯的一套。还不赶快收回去！”

“不，马寅初的说法与马尔萨斯不同。”也有的代表这样说：“但思想体系恐怕难免仍旧落

到马尔萨斯的窠臼里。”

据《邓传》（249页）：“马老看到这些，知道当时的气氛不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主动把提交给大会上的发言撤回来了”。《杨、徐、朱传》与《杨传》亦有同样文字的叙述，这都是根据马寅初1957年7月在全国人大会上书面发言的自述。马寅初回忆说：“虽然他们的意见我不能接受，但我认为大部分人都是出于善意，故我自动把这篇发言稿收回，静待时机成熟再在大会上提出来。”按1955年人大小组发言稿《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一文，今未收入1981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马寅初经济论文选集》。不过《杨、徐、朱传》（192页）有“甚至有些人打算对马寅初进行批判，只是后来由于周总理的阻止这才未实现”一说，为另二传所无。

由此可知，早在1955年就已有人对马寅初实行“大批判”了。三本传记都没有点出1955年这次在全国人大浙江小组会上对马寅初发起批判者的名字，只用“有人”或“有些人”代替，这是一些当代传记史家出于各种顾忌，通用的避讳笔法，也可称为模糊笔法，读者遂如雾里观花。幸得近年来陆续出版了若干种各次政治事件和政治运动经历者的回忆录、日记等，透露一些史实，有助于了解某些真相和全貌。

宋云彬是当年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浙江代表团小组副组长，曾带头批判马寅初在小组会上关于人口问题的发言。宋云彬有三十年日记，出版社取名《红尘冷眼》，于2002年出版。

其 1955 年 7 月 12 日日记云：“下午，浙江小组讨论五年计划，邵力子、马寅初强调中国人口过剩，余起而驳之。”7 月 13 日日记云：“上下午均赴赵登禹路政协全国委员会出席浙江小组，讨论五年计划。马寅初、邵力子等大谈人口问题，实则不满意五年计划，以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能改善人民生活，改变失业失学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人口增长过速，而又谓马尔塞斯人口论极端反动。余两次起立发言，问此种论点与马尔塞斯有何不同之处，则皆哑然无言。马寅初面红耳赤，谓余不能企图阻止他在大会发言（此公准备在大会发言中谈人口问题）。”7 月 14 日日记云：“上下午小组讨论均由余主持。余特声明：昨天两次提到马尔塞斯，盖恐邵、马二公对于人口问题之见解不自觉地陷入马尔塞斯人口论之泥潭，所谓心所谓危，不敢不告耳。沙文汉递一字条给我，说：‘你说他们重复了马尔塞斯人口论原没有说错，只是说得太早一点，容易阻碍辩论的展开。’下午，骆耕漠（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来列席，准备对代表提出之问题作解答，而马寅初坚持请骆对五年计划作全部讲解，谓‘大家愿意听大课’云云，使骆局促不堪，幸沙文汉为之解围，谓时间已晚，留待明天讲解。人谓马天真，以余观之，实无知也。杨思一最后发言，极有条理，共产党员故自不同也。”7 月 15 日日记云：“上午浙江小组讨论五年计划，仍由余主席。陆士嘉、张琴秋等均对人口问题有所发挥，惜邵（力子）马（寅初）二君不肯倾听也。……马寅初将发言稿清样送请王国松看，其内容谓目前兴修水利、开荒等等皆非根本办法，根本办法在限制人口，满纸荒唐言，不仅贻笑大方，且将为帝国主义及反动派据为口实。沙文汉看后，大为惊诧，与王国松商议，由王找竺可桢谈，请向马劝告。晚饭后，王赴竺公馆，又赴马公馆，归来已十一时矣。”7 月 19 日日记云：“上下午均分组讨论，继续讨论五年计划，邵力子、马寅初等又大谈人口问题，争吵甚烈。”7 月 25 日日记云：“上午小组讨论。沙文汉提议不再谈人口问题，专谈预决算、兵役法及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8 月 3 日日记云：“七时赴前门车站，邵力子、陈叔通、许昂若、严景耀均来相送。独马寅初未来。此老在小组会中谈人口问题与余等意见相左，岂尚

耿耿在心耶？”

按：看以上宋云彬日记，可知当年浙江小组批驳马寅初新人口论大致情况。日记中出现的人物，全都留下真实姓名，则是一般传记难得的史料。历史已经证明，当年那些一知半解地讥笑马寅初“无知”、“荒唐”的人，自身难免无知与荒唐之讥。

从三本传记记载来看，当年的人们，特别是中南海的高层决策者对中国人口问题的看法，并不是一上来就是一面倒地反对讨论的。对待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提出，也不是一开始就持反对态度的。

《邓传》（250 页）对此就有一段背景叙述：“到了 1956 年，我们党和国家开始注意到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并在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上正式规定：‘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周恩来总理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也明确指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继续发展卫生医疗事业，开展体育运动，并且适当地提倡计划生育。……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节制。’周总理还建议成立一个节制生育的专门机构，并对这个机构的组织形式提出了具体的设想。”

进入 1957 年早春，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似乎在中南海的和煦春风里博得了更多高层知音。《杨传》（164—165 页）有这样动人的描写：“此刻，在古色古香的紫光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正在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整个会场静悄悄的，都在全神贯注地倾听马寅初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发言。……马寅初的发言结束以后，整个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当即对他的发言表示赞同。毛泽东同志笑着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完全可以进行研究和试验。马寅初今天讲得很好！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

但是，毛泽东很快改变了对“新人口论”的看法。《杨、徐、朱传》（207 页）载：“1957 年 10 月 14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中

说,有一位经济学家算了一大堆账。结论是:因为人口过多,资料积累太少,不敷分配,所以不能搞很多的大型工业,而只能多搞中小工业。并引用列宁说的‘没有大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文章由此得出结论:他们谈的并不是人口问题,并不是什么节育问题,并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现实的阶级斗争问题,严重的政治斗争问题。’”按此时反右斗争已展开《人民日报》的批判文章都是有来头的。这篇文章不点名指“有一位经济学家”,大家一看就明白指的是马寅初了,预示风向要变了。

形势还在发展。据《杨传》(168—169页)载,1958年《红旗》杂志创刊号发表了毛泽东写于1958年4月的《介绍一个合作社》,文章说:“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又载同年5月,刘少奇按《杨传》此处隐去刘的名字)在党的八大二次大会上的工作报告,指出“某些学者”,“他们只看到人是消费者,人多消费要多,而不首先看到人是生产者,人多就有可能生产得更多,积累得更多。显然,这是一种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人们看到,一场狂热的以人多为胜的“大跃进”架势,此时已呼之欲出,“某些学者”与此唱不同调子的什么新老人口论,自然成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很快,党内“理论权威”陈伯达和康生先后出来,公开点名对马寅初“新人口论”进行批判,甚至进行面对面批斗。陈伯达、康生当然不是个人行为。关于这些批判批斗情况,三本传记都有相似的记载。现取《杨传》(169—170页)所述:

从此,北京大学就对马寅初展开了点名批判。据统计,仅1958年下半年,在北京大学的校刊和学报上就发表了18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同时,一批全国性的报刊,也都先后相继投入批判,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批判马寅初的声势。

据了解,这一时期上阵参加批判马寅初学术思想的人,有二百之多,全国发表的文章有58篇,集中批判他的《新人口论》、“综合平衡”和“团团转”。

这些批判文章给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冠以三顶大帽:说它是马尔萨斯主义,否认了“人

多是好事”这样一个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说它否认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为“人口相对过剩”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下是不会出现多余人口的;还说它对六亿人口缺乏感情。等等,等等。

在康生的策划下,从1959年12月中旬至1960年1月中旬,北京大学不仅举行了许多次的小会批判马寅初;而且曾先后召开了三次全校规模的大会批判马寅初,召开了一次有二百人参加的会议,面对面地对马寅初进行批斗。这期间批判马寅初的近万张大字报也洪水猛兽般地向他袭来。与此同时,各种报刊上又相继发表了82篇文章,对马寅初进行点名批判。面对如此汹涌而来的批斗浪潮,马寅初没有退却,坚持自己的主张,拒绝检讨。他于1959年11月在《新建设》杂志发表的关于“新人口论”的《声明》中说:“学术问题贵乎争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进,决不应向困难低头。”他谢绝了几位朋友要他认一个错,退却了事的劝告,特别提及一位“好朋友”的劝告。他在《声明》中写道:

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1949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希望我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马寅初选集》43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

《声明》中的这位“好朋友”是谁呢?三本传记都曾采用这条材料,却都不点出这位“好朋友”的名字,留给读者一个悬念。但看书的人明白,这位“好朋友”除了周恩来,还能是谁呢?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经历了从理性到狂热的反复,1960年3月以后,马寅初的名字在学术论坛上消失了。在这以后,中国人口继续无限制地盲目发展着,人口问题严重地加剧着。”(《杨、徐、朱传》,215页)

(责任编辑 吴 思)

粟裕与淮海战役

● 闻 实

淮海战役，国民党方面称之为徐蚌会战，是决定现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战。蒋介石兵败淮海，犹如拿破仑兵败滑铁卢，从此一蹶不振，不久延续二十二年的蒋家王朝土崩瓦解。因此，中外战争史研究者把它称之为“蒋介石的滑铁卢”。

可悲的是，蒋介石的统帅部当时和事后都没有搞清楚，在淮海之战中，谁是他们主要的直接对手，谁是造成“蒋介石的滑铁卢”的关键人物。

这个人就是粟裕。

当时，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已经调任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粟裕担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是他向中央军委建议举行淮海战役并适时发展为南线战略决战。他指挥的部队占解放军参战兵力的70%，歼灭国民党军占解放军歼敌总数的80%，在战略决策和战役指挥两方面，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从“子养电”到“齐辰电”，粟裕先后提出发展战略进攻、举行南线决战的战略构想及相应的建议

淮海战役的战略决策，要从1948年粟裕的两次“斗胆直陈”说起。

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以后，粟裕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探索解放战争的发展规律，逐步形成了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构想。他认为，随着敌我双方力量的消长和战略战术的变化，解放军打歼灭战将向

更大规模发展，是一个客观规律。在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以后，在原有政治优势的基础上，又取得了战略优势地位，但是在数量上和技术上仍然处于劣势。国民党军队仍然可以依恃其数量、技术上的优势，在局部地区组织战役进攻。因而中原战场出现反复拉锯的僵持局面。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的关键，是集中更大兵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1947年12月上旬，他准备把这一战略构想以及相应的建议上报中共中央军委，建议在作战和建军两方面采取措施以争取数量上和技术上的优势，在中原战场上采取忽集忽分的战法，集中兵力打大仗。由于他的构想和建议不仅关系战略全局，而且与中共中央一再强调的避免打大仗的意图不同，所以在电报起草好以后，又经过40余天的慎重考虑，并通过平汉战役的实践证明集中兵力打大仗是可行的，方才于1948年1月22日发出，并使用了“斗胆直陈”的措词。按照中国电报地支代月、韵母代日的惯例，1月22日是“子养”，故称“子养电”。

粟裕当时不知道，中共中央在1947年12月的杨家沟会议上已经作出分兵南进的战略决策，决定从中原战场上抽出一部分兵力渡江南下，调动中原战场上的国民党主力部队，以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1948年1月27日，中央军委电示粟裕，要他率领三个纵队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电报强调指出：“你率三纵渡江以后，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敌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至于渡江的时机、地点和方法，提出三个方案，认为各有利弊，

要粟裕“熟筹见复”。

粟裕认为,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显然是为了进一步把战争引向敌人的深远后方,扭转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问题是,从战争全局和中原实际来看,究竟是分兵渡江南进有利,还是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有利?他认为,为了改变中原战局,进而协同其他战场彻底打败蒋介石,中原和华东我军还要同国民党军进行几次大的较量,打几个大歼灭战,尽可能多地把国民党军主力部队消灭在长江以北。从当时敌我态势来看,要打大规模的歼灭战,分兵渡江南进是做不到的,而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却正在成熟。三个纵队渡江南进,无疑会给敌人以相当的震惊、威胁和牵制,但是难以实现预定的战略企图,特别是调动不了国民党在中原战场上的四个主力军,同时又会分散和减弱我军在中原战场的兵力。权衡利弊得失,粟裕认为,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更有利于迅速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进而夺取全国胜利。

1948年4月18日,粟裕再次“斗胆直陈”,向中共中央军委建议,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而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同时提出,在打完第一个歼灭战

以后,“除以一部相机攻占济南外,主力则可进逼徐州,与刘(伯承)、邓(小平)会师,寻求第二个歼灭战”。

粟裕的建议引起了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48年4月底到5月初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了粟裕的汇报,决定在既定战略方针不变的前提下,采纳他的建议,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而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

1948年6月16日至7月6日,粟裕组织指挥的豫东战役,不仅创造了一个战役歼敌9万余人的空前战绩,更重要的是迅速改变了中原战局,并推动全国战局由战略进攻向战略决战发展。实践证明,在中原黄淮地区确有大量歼敌的必要和条件,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决策是正确的。因此,豫东战役以后第7天,1948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再次调整原定战略部署,指示:“粟兵团应在现地作战至明年春季或夏季,歼灭五军、十八军等部,开辟南进道路,然后南进(不歼灭五军、十八军不走)。”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明确决定:“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东、东北作战。”



粟裕在豫东前线指挥所

豫东战役以后,粟裕对解放战争规律的探索又前进一步,形成了南线决战的战略构想。他认为,解放军的歼灭战不断向更大规模发展,“势将成为同敌人的战略决战。而要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决战,必须考虑时机,还要考虑战场条件和后勤供应条件。对于战场和后勤供应条件,我考虑在长江以北决战比在长江以南决战有利得多,而在长江以北决战,又以在徐蚌地区最为有利”。他认为,豫东战役的胜利,实现了由战略进攻向战略决战的转折,当前的问题是如何推动战局向战略决战方向发展,无论是正在

酝酿的济南方向作战，还是未来的徐州方向作战，都要同南线战略决战联系起来考虑。因此，当中共中央提出拟令华野许世友、谭震林兵团迅速攻克济南，以保证豫东参战部队休整，然后配合华野主力打几个大仗，“争取于冬春夺取徐州”的时候，粟裕建议华野全军首先休整一个月，然后“协力攻打济南，并同时打援”。他认为，“只要济南能解决，打援方面又取得胜利，则战局可能迅速向南推移，今冬攻占徐州之计划似有极大可能。”1948年8月23日，又提出：“两个月以后，我们即可举全力沿运河及津浦南下，以一个兵团攻占两淮及高（邮）宝（应）”，为下一步在徐州地区作战及渡江南进创造条件。

在1948年9月的济南战役过程中，集结在徐州地区的国民党军三个兵团17万余人，在华野阻援打援部队阵地前面徘徊，不敢北上与华野交战。粟裕认为，这说明敌人是避免在不利条件下与我军打大规模的仗，也说明我军对敌人进行战略决战的有利条件正在逐渐成熟。因此，当济南城内巷战仍在激烈进行，但已胜券在握的时候，就于9月24日7时发电报给中共中央军委，“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粟裕军事文集》第393页——394页）。中共中央军委经过慎重考虑，于9月25日19时复电，同意粟裕的建议：“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19页）

粟裕指挥的济南战役只用8天8夜就攻克济南城，全歼守敌10万余人（包括起义者两万人），并且在打援战场上不战而胜，实现了中共中央所设想的最好结果，更重要的是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序幕，促使中共中央对原来的战略部署作了进一步调整。济南战役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用五年左右时间，建军500百万，歼敌500个正规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济南战役以后，中共中央考虑到从豫东战役到济南战役、辽沈战役的实践经验以及全国战局的发展，改变了对战争进程的估计。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指出：“我军九、十两月的胜利，特别是东北及济南的胜利，业已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形势。”九月上旬（济南战役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所作的五年左右建军五百万，歼敌五百个正规师，从根本上打倒国民

党的估计及任务，因为九、十两月的伟大胜利，已经显得是落后了。这一任务的完成，大概只需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可达到了。”因此，中共中央决定，继辽沈战役之后，连续发起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加快了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

淮海战役发起之前，中原野战军先后攻克郑州、开封，陈毅、邓小平率领的四个纵队到达徐州附近的萧县地区。粟裕分析战场态势，认为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将由战略上配合作战发展为战役上协同作战，淮海战役的规模也比原来设想的要大，必须建立统一的指挥体制，才能统一指导思想，协调作战行动，最大限度地发挥两大野战军的整体威力。于是，他在1948年10月31日给中共中央军委、陈毅、邓小平、华东局、中原局的电报中建议：“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中共中央军委和陈毅、邓小平于11月1日、2日先后复电同意。就这样，淮海战役的统一指挥问题，在不到3天时间内就顺利解决了。而蒋介石的统帅部，从10月22日提出由白崇禧担任国防部蚌埠指挥所主任，到11月10日指令杜聿明到徐州担任徐州剿总副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用了近20天时间，即淮海战役发起4天以后，才勉强解决了徐蚌会战的统一指挥问题。

淮海战役发起以后，粟裕观察分析全国战略态势，认为南线战略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那时，辽沈战役已于11月2日结束，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也取得了优势。粟裕说：“现在东北全境已经解放，解放战争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要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仗怎么打，怎样能更快地给蒋介石以决定性的打击。”1948年11月8日，他在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分析全国战略态势，估计蒋介石可能采取两种方针：“第一，以现在江北之部队，再加上由葫芦岛撤退之部队，继续在江北与我周旋，以争取时间，加强其沿江及江南及华南防御。第二，立即放弃徐、蚌、信阳、两淮等地，将江北部队撤守沿江，迅速巩固江防，防我南渡，并争取时间整理其部队，以图与我分江而治，俟机反攻。”认为如果解放区对战争还能作较大支持，则以迫使敌人采取第一种方针更为有利。因此建议：“我们在此次战役于歼灭黄（百韬）兵团之后，不必以

主力向两淮进攻(新海敌主力已西撤),而以主力转向徐州(固镇)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消灭之(或歼孙兵团,或歼黄维兵团)。同时以主力一部进入淮南,截断浦蚌铁道,错乱敌人部署与孤立徐、蚌各点敌人。为此,在战役第一阶段之同时,应即以一部破坏徐蚌铁路,以阻延敌人南撤。”这就是著名的“齐辰电”。11月9日,粟裕又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刘峙有以徐州为中心与我决战模样”,正在调整部署,“实为歼敌之良机”。中共中央军委采纳粟裕的建议,毅然作出将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战略决战的决策。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电指示:“齐辰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应。”

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能动地驾驭战局、力争主动、迫使敌就范的战略方针。

在淮海战役发起之前,蒋介石的统帅部曾经考虑“放弃徐州,守江保淮”,采取“守江必守淮”的作战方针。但是,误认为华野和中野“行动甚缓”,“企图不明”,“陈毅(刘伯承)是否合力尚难断定”,因而举棋不定,“守江必守淮”的计划并未付诸实施。当时辽沈战役大局已定。蒋介石担心,辽沈战败,再加徐州撤退,导致政局不稳。因而被迫采取第一种方针,将兵力集结在徐州及徐蚌段铁路沿线,作攻势防御。蒋介石为了保住44军,让黄百韬兵团在新安镇等了两天,结果使黄百韬兵团陷入重围。为了救黄百韬兵团,又把邱清泉、李弥、孙元良等兵团集中在徐州地区,指令黄维、李延年、刘汝明等兵团北上增援。他所采取的措施,沿着粟裕“齐辰电”设想的第一种可能,一步一步地走向在徐州地区决战的道路。对于这一点,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所见略同。他们说:“在徐州附近开打,是被迫无奈的”,“未战而败局已定”。

关于淮海战役,史学界有“小淮海”、“大淮海”之说。一般认为,11月8日以前策划的淮海战役是“小淮海”,11月9日以后策划的淮海战役是“大淮海”。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1948年10月11日的电报,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标题定为《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实际上淮海战役执行的并不完全是这个作战方

针,而是“隔断徐蚌歼灭刘峙主力的总方针”。

上述过程表明,粟裕对淮海战役的首要贡献,是提供了南线决战的战略构想和战略建议,从“子养电”到“齐辰电”,在由战略进攻发展为战略决战过程中,在由“小淮海”发展为“大淮海”的关键时节,粟裕都提出了具有关键性的建议,对中共中央军委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粟裕适时把战局推向新水平,促成南线战略意图的圆满实现

粟裕有一句名言:“对付敌人,不但斗力,更要斗智。”他的谋略思想和指挥艺术的特点和优点,就是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于战争指导,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依靠正确的谋略思想和巧妙的指挥艺术克敌制胜。在淮海战役的战役指挥中,尤其鲜明地表现了这一特点和优点。

谈到淮海战役的特点,粟裕说:“毛主席对淮海战役有一句精辟的概括:一锅夹生饭,硬是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我的理解,是指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战略决战并取得胜利的条件,不是一开始就成熟的。形势的发展变化多端,中央军委、总前委审时度势,统一筹划,集中集体的智慧,正确指导了战役全过程,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还乘敌之隙,充分利用了敌人的错误,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的主要目标是歼灭黄百韬兵团。黄百韬兵团下辖五个军,是淮海战场上国民党军兵力最多的兵团,战斗力中等偏上。一仗消灭敌人五个军,这是一个大仗、硬仗,又是对整个战役影响很大的初战。为求初战必胜,粟裕精心运筹,果断决策,大奏奇效。

在作战部署上,他采取声西击东的策略。先期派出两个纵队向鲁西南进军,以9个纵队用于运河以东,以歼灭黄百韬兵团为主;以6个纵队加4个旅用于运河以西以南,造成南北聚歼李弥兵团、攻略徐州的态势,隐蔽我军意图,错乱敌人部署。蒋介石的统帅部和徐州“剿总”果然中计,在参谋总长顾祝同主持的部署“徐蚌会战”的会议上,徐州“剿总”各个兵团司令官都说自己防

区当面发现共军重兵集结。判断华野部队将由鲁西南南下,而不会在徐州以东发动攻势。因而决定放弃海州、连云港,固守徐州,集结兵力于津浦路徐蚌段,作攻势防御。这一部署正好给华东野战军分割歼灭黄百韬兵团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出击时机上,粟裕根据战场态势变化,决定提前两天发起



粟裕(中)在淮海战役前线指挥所听取战斗情况汇报。右二为张震

战斗。顾祝同主持徐州会议以后,华野指挥机关很快就侦察得知蒋军动向,判断敌人有“集中兵力固守徐州及徐海段、徐蚌段,以阻我南下攻势,掩护其加强江防及江南后方部署”。11月6日又发现,驻守海州的国民党第44军有西撤新安镇并归黄百韬指挥的动向,隐蔽在冯治安部的共产党员何基沣、张克侠在发动起义上“要求更趋积极”。形势的发展表明,淮海战役的发起时间宜早不宜迟。粟裕当机立断,将淮海战役的发起时间提前两天,即由原定11月8日晚改为11月6日晚。11月6日戌时(19时—21时),一面将作战部署上报中共中央军委、邓小平、陈毅、华东局,一面下令部队执行。11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复电,表示“完全同意鱼戌电所述攻击部署,望你们坚决执行”。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决策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夺取了战场主动权,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在这两天时间里,华东局和华野前委成功地组织指导了何基沣、张克侠的起义。华野主力部队迅速通过起义部队防区,切断了黄百韬兵团西撤徐州的通路。同时,以神速的动作完成了对黄百韬兵团的分割包围。国民党统帅部和徐州“剿总”惊叹:“未料共军行动这样迅速!”粟裕后来说:“如果再晚四小时,让黄百

韬窜入徐州,那仗就不好打了。”

在作战方法上,粟裕采取“攻济打援”的战法,用6个纵队围歼黄百韬兵团,用7个纵队阻击由徐州增援之敌。在作战过程中,根据黄百韬兵团由驻守之敌变为运动之敌,又由运动之敌变为驻守之敌等实际情况,适时转换作战方式。由运动战转换为村落阵地攻坚战,用近迫作业的办法把交通壕挖到敌人阵地前沿,然后突然发起攻击,突破敌人的坚固防御阵地,全歼黄百韬兵团。而由徐州增援的邱清泉、李弥两兵团虽然与黄百韬兵团炮声相闻,却不能越雷池一步。谈到淮海战役的战法,粟裕说:“在战役指挥上重视和掌握作战方式的转换以及由之引起的战术、技术上的变化,是一条重要经验”。这种战法,也是出乎敌人意料之外的。国民党军在淮海战场上的主将杜聿明说:“他们(指参谋总长顾祝同等人)并未料到解放军已有一半以上兵力担任阻击打援,并准备在淮海战役中实行战略决战,消灭国民党军。当然我也未料到这点。”

在第一阶段作战过程中,粟裕就开始为下一步作战创造条件。1948年11月7日,即在淮海战役发起一天之后,他就与华野参谋长陈士榘、副参谋长张震议论,认为不论战局如何发展,孤

立徐州,截断徐州之敌陆上退路甚为必要。于是连发三电给中共中央军委、华东局、中原局和陈毅、邓小平、谭震林、王建安,判断淮海战役发起后有提前夺取徐州,使敌不能南撤可能”,认为“目前主要关键为能否全歼黄(百韬)兵团,同时作下一步准备”,要求谭震林、王建安率领的华野部队按预定计划迅即出陇海线,建议陈毅、邓小平率领的中野部队直出津浦路徐蚌段,截断徐州之敌退路,下一步或继续歼灭黄维兵团,或歼灭蚌埠之孙元良兵团。中共中央军委于11月8日复电指出:“估计及部署均很好”。11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又连发3电,指令中野集中4个纵队攻取宿县,控制徐蚌段铁路,切断徐州之敌南撤通路,指令华野部队以勇猛神速手段歼灭李弥兵团,切断黄百韬兵团西撤通路。

在第一阶段作战中,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与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指挥的中原野战军互相配合,始终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超额完成了中共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不仅全部歼灭了黄百韬兵团5个军12万人,争取何基沣、张克侠率领的第三绥靖区部队2.3万余人起义,给增援黄百韬兵团的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以沉重打击,解放了徐州以东直到海州、连云港的广大地区,并且隔断了徐州与蚌埠之间的交通,使徐州之敌处于孤立地位,给下一步作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奠定了南线战略决战胜利的基础。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中指出:“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电报说:“在战役发起前,我们已估计到第一阶段可能消灭敌人十八个师,但对隔断徐蚌,使徐敌完全孤立这一点,那时我们尚不敢作这种估计。”

淮海战役进入第二阶段以后,淮海战场上国民党军总兵力还有6个兵团18个军50余万人。分别集中在三处:徐州地区,有徐州“剿总”和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个兵团8个军30余万人;蒙城地区,有黄维兵团4个军12万人;蚌埠地区,有李延年、刘汝明2个兵团6个军10余万人。

三个战场一盘棋。如何确定主要打击目标,如何处理主攻战场与钳制、阻击战场的关系,有计划、有步骤地消灭这三部分敌人,是关系整个战役胜负的关键问题。

从淮海战役发起之时开始,粟裕就一直关注第二阶段作战对象的选择。在“齐辰电”中,他向中共中央军委建议,华野歼灭黄百韬兵团之后,下一步作战“或歼孙(元良)兵团,或歼黄(维)兵团”。中共中央军委判断,在歼灭黄百韬兵团以后,徐州之敌有南撤或不撤两种可能。指出:“如果敌人不撤,我们即可打第二仗,歼灭黄维、孙元良,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起来。”第一阶段作战过程中,中共中央军委一度设想“第二步歼灭邱(清泉)、李(弥),夺取徐州”。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提出,如果黄维兵团出永城或宿县,“歼击黄维为上策”。那时围歼黄百韬兵团的战斗刚刚开始,其余各部敌军的动向尚未判明,所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需待黄(百韬)兵团歼灭以后,依邱清泉、李弥、黄维三部的情况,才能决定作战方针。”当第一阶段作战临近结束的时候,南北两线战场态势发生重大变化:全歼黄百韬兵团已成定局,邱、李两兵团积极东援的情况并未出现,集结于蒙城、蚌埠地区的黄维、李延年、刘汝明三兵团开始向北增援。1948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军委提出,在北线歼灭了黄百韬兵团,南线歼灭了李延年兵团、歼灭或驱逐了刘汝明兵团之后,“即可全力歼灭黄维,如像在碾庄歼灭黄百韬那样,获得一个伟大胜利”。同一天,黄维兵团进至蒙城地区,向中原野战军部队发起攻击。11月19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提出,华东野战军在歼灭黄百韬兵团以后,“即将主力集中于徐东、徐南,监视邱、李、孙三兵团,争取休息十天半月。同时以尚未使用之五个纵队或三个纵队用于南线,协同我们歼击黄维、李延年”。粟裕等于11月20日复电,“完全同意刘陈邓指示”,决定“抽出四至五个纵队,必要时增加三个纵队,协同中野歼击黄维、李延年”,并建议“首先求得彻底歼灭黄维兵团为主”。11月22日,华东野战军全歼黄百韬兵团,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迟迟不进,黄维兵团向中野南坪集阵地猛烈进攻,出现了歼灭黄维兵团的有利战机。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向中共中央军委建议先打黄维,并请华野“以两三个纵队对李、刘防御,至少以四个纵队参入歼黄维作战”。中共中央军委于11月24日15时复电:“完全同意先打黄维”,指示华野“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粟裕等于11月

24日午时、25日巳时连复两电,表示“完全拥护先集中力量歼灭黄维的作战方针”,决定“大力协同中野歼灭黄维兵团”,并作出具体部署:再抽调3个纵队,连同已交归中野指挥的王秉璋、张霖之第十一纵队,先后投入歼灭黄维作战;以3个纵队加江淮军区两个旅,阻击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向西向北进犯;以8个纵队监视和钳制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兵团,使其不能向南向西增援。这样,第二阶段的作战方针就确定下来,并开始付诸实施了。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一肩三副重担,除先后派出5个纵队参加歼灭黄维兵团的作战外,还担负着钳制、阻击南北两线敌军1个“剿总”指挥部、5个兵团约40万人的作战任务。

在第二阶段作战方针商讨过程中,粟裕在11月20日的电报中判断,黄百韬兵团被全歼后,徐州之敌与蚌埠、蒙城之敌有“以宿县为中心对进,以图打通津浦线联系之极大可能”,决定以8个纵队成大弧形包围徐州,监视和钳制徐州之敌,阻止其南援。以4个纵队加2个旅阻止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北进,“全力保刘陈邓歼黄(维)胜利”。果如粟裕所料,11月23日,黄百韬兵团被消灭,蒋介石急令刘峙、杜聿明到南京开会。决定“徐州方面以主力向符离集进攻,第六兵团及第十二兵团向宿县进攻,南北对进,一举击破共军,以打通徐蚌间交通。”这时,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早已严阵以待。北线经3天激战,由徐州南下的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仅仅前进10到15公里,到第三天就不能再越雷池一步。南线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刚刚前进到任桥地区,就受到华野部队迎头痛击。11月26日,华野部队攻克任桥以东的灵璧,威胁李、刘两兵团侧背。李延年、刘汝明眼看大事不妙,立即指挥所属部队缩回浍河以南。而由蒙城北进的黄维第十二兵团则被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指挥的部队包围在双堆集地区。蒋介石的南北对进计划刚刚出笼,就宣告破产了。

在第二阶段作战中,徐州之敌的动向一直是粟裕最为关注的问题。他分析敌我态势,认为国民党军后方已无兵可调,放弃徐州的可能性较大。徐州之敌有固守和突围两种可能。如果敌人固守,以坚固设防的大城市为依托,将加大我军



1980年粟裕在讲述战役指挥经验

歼灭该敌的难度。相反,敌人突围对我并非不利,让他离开乌龟壳再消灭他是最好不过的。因此决定不把敌人堵死在徐州,而准备对付敌人突围。11月28日,中共中央军委来电指出:“黄维解决后,须估计到徐州之敌有向两淮或向武汉逃跑可能。”接到中共中央军委来电,粟裕进一步分析敌我态势,认为敌人有不待黄维被消灭就放弃徐州的可能,并且判断徐敌逃跑的方向有三个:一是沿陇海路向东,经连云港南逃;二是直奔东南走两淮,经苏中转向京沪;三是沿津浦路西侧绕山区南下,解黄维之围,集中兵力防守淮河。敌人走这一路,将要遇到我两大野战军的强力打击。但是敌人总是对自己估计过高,走这一路的可能性最大。如果敌人的阴谋得逞,战场形势将发生不利于我的重大变化,所以也是对我军威胁最大的一招。因此,在兵力部署上,他将北线7个纵队部署在徐州以南津浦路东西两侧,重点对付徐州之敌向西南逃跑。同时防备其向两淮、连云港逃窜。11月28日,蒋介石果然急令刘峙、杜聿



1955年11月总参谋长粟裕在大连观看军事演习

明到南京密商，决定于11月30日撤出徐州，走粟裕判断的第三条道路，经永城到蒙城、阜阳地区，解黄维之围。11月30日晚上，徐州之敌刚刚撤出徐州，华野就从各种渠道侦察得知，敌人已经撤出徐州，向西南方向逃窜。粟裕立即作出追歼逃敌部署，除北线的7个纵队以外，另从南线抽调3个纵队，加上从山东调来的渤海纵队，共11个纵队，追击、截击、围歼逃敌。到12月4日，就将杜聿明率领的30万人马包围在河南省永城县陈官庄地区，并于12月6日全部歼灭企图突围的孙元良兵团。

粟裕说：“战役指挥的重心放在哪里，对能否掌握战场主动权关系极大。我从历次参加的战役指挥中体会到，每个战役都有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就是在对战役有决定影响的环节上我们掌握了主动，打赢了敌人，从而使我军确有把握取得战役的全胜。因此，战役指挥员不仅要对整个战役有通盘的考虑，预见情况可能的发展变化，在打第一仗时就想打第二仗和第三仗的问题，而且要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战役的转折点

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全力以赴，采取一切手段促使战役转折的实现。”他认为，整个淮海战役的转折点，是在杜聿明集团被围死，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被阻住，我军已能集中足够兵力全歼黄维兵团的时候。在第二阶段作战中，他全力促成这个转折的实现。

1948年12月上旬，淮海战场态势发生重大变化：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被华野5个纵队阻止于蚌埠以南，杜聿明集团被华野11个纵队围困在陈官庄地区，黄维兵团处于孤立无援境

地。华野得到情报：杜聿明向蒋介石建议，从山西、台湾、甘肃抽调几个军到蚌埠，与李延年、刘汝明合股北援；宋希濂兵团已由武汉向浦口开进；蒋介石派他的儿子蒋纬国率领战车部队到蚌埠参战。粟裕分析战场态势，认为南线阻援兵力不足。万一出乱子，势将影响全歼黄维兵团的作战。他估计，华野对杜聿明集团作战还需十天到半月时间，可以再抽出部分兵力到歼黄战场，首先集中兵力歼灭黄维兵团。12月10日，即发电报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中共中央军委、华东局，建议再由此间抽出一部分兵力，以求先解决黄维（对邱、李暂采大部守势，局部攻势）。经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电话同意，华野前委决定，由华野参谋长陈士榘率领第三纵队、鲁中南纵队和特种兵纵队一部，于当天晚上南下参战。这样，就使参加围歼黄维兵团的兵力达到12个纵队另两个旅，在数量上也居于优势地位。战至12月15日，历时23天的第二阶段作战胜利结束，全歼黄维兵团12万人（包括起义者在内），取得了淮海战役第二个伟大胜利。

淮海战役进入第三阶段以后,粟裕认为形势已经完全明朗。杜聿明集团已成瓮中之鳖,绝对逃不脱被歼灭的命运。问题在于,从战争全局来考虑,什么时间发起总攻最为有利。12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歼灭黄维兵团以后,留下杜聿明集团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以使淮海、平津两大战役互相配合。粟裕认为,中共中央军委的英明决策给淮海战场造成了极好机会,既可利用这段时间组织部队休整,又可乘机对敌军展开政治攻势。在组织部队休整中,广泛开展立功运动、评定伤亡、溶化俘虏等活动。经过休整,华野部队兵员充实,装备改善,战术提高,士气上升,更加壮大。淮海战役开始时,华野总人数为36.1万人,战役过程中伤亡10.5万人,战役结束时增长到55.1万人。增长部分,除了补充几个地方团以外,主要是补进“解放战士”。对敌政治攻势更是大放异彩,促使国民党军官兵纷纷携械投诚。到华东野战军发起总攻时,杜聿明集团的30万人马只剩下不足20万人,仅用4天时间就被全部消灭了。粟裕说:“敌人最后被解决得这样快,应该归功于政治攻势的成功。四天四夜还不到,就歼敌10多万,平均每天歼敌四五万人。如果没有政治攻势,最后解决敌人不会这样快,我军的伤亡还要大些,证明攻心为上是正确的。”

1949年1月10日,历时66天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剿总”指挥部、5个兵团、22个军共55.5万人,基本上消灭了蒋介石在长江以北的精锐部队。解放了华东、中原广大地区,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为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粟裕以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著称。在淮海战役中,他把大兵团作战的指挥艺术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对夺取淮海战役的胜利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粟裕总结自己的经验说:“作为战区指挥员,应不断地研究、分析敌我力量的对比变化,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敢于适时地把战局推向新水平,而不能坐待条件完全成熟。从孟良崮战役到豫东战役,再到淮海战役,都使我体会到这一点。”

毛泽东说:淮海战役,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

淮海战役创造了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中国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相比较,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都是以多胜少,惟独淮海战役是以少胜多。辽沈战役,解放军以70余万对国民党军55万,歼敌47.2万。平津战役,解放军以100万对国民党军60余万,歼敌(包括改编)52.1万。而淮海战役,则是解放军以60万对国民党军80万,歼敌55.5万。淮海战役歼敌数字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莫斯科会战和库尔斯克会战。苏军在那两次会战中各歼灭德国法西斯军队50万。所以,斯大林听到淮海战役胜利的消息,连称:“60万战胜80万,奇迹,真是奇迹!”

中国和外国都有人把淮海战役与滑铁卢会战联系起来,称之为“蒋介石的滑铁卢”。但是,任何比喻都是不准确的。就这两次战役对于拿破仑和蒋介石的命运来说,确有相似之处。滑铁卢一战,拿破仑指挥的法国军队丧失殆尽,随即宣布第二次退位,“百日拿破仑政权”覆灭。淮海一战,蒋介石赖以生存的命根子80万主力部队被消灭,接着在内外交困的政治危机中宣布“引退”,不久持续22年的蒋家王朝土崩瓦解。而就战争规模和战争指导来说,淮海战役则远远超过了滑铁卢会战。滑铁卢会战,惠灵顿和布吕歇尔指挥的联军13万人,对拿破仑指挥的法军7.2万人,联军歼敌7.2万人,战争规模和歼敌人数不及淮海战役的五分之一。而在战争指导上,不论是战略决策还是战役指挥,更是大大超过了滑铁卢会战。毛泽东及其在淮海战场上的指挥员运筹帷幄,出奇制胜,用兵如神,不仅创造了战役上以少胜多的奇迹,而且把大兵团作战指挥艺术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在创造这个奇迹过程中,在战略决策和战役指挥两方面,粟裕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毛泽东在1949年的一次谈话中说:“淮海战役,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事实雄辩地说明,这是一个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历史结论。

(责任编辑 吴思)

张闻天在苏区建设 中的民主主张

● 曾景忠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张闻天重视政治民主。他认为,在苏维埃政权下,应实行广泛的民主,实行“苏维埃的德谟克拉西”。他反对党委包办政府工作,主张向选民揭发工作中的一切错误,主张舆论监督,反对空喊反对官僚主义。

张闻天于1925年秋赴苏联留学,系统学习马列主义,后任教,亦讲授列宁主义。他自述:“学习中最感兴趣者即为列宁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与实际。第三年内,对于这门课,曾担任教课,曾加以特别研究。”列宁主义的主要内容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但他对列宁主义理论中的苏维埃民主非常重视。1931年他回国后,先在中共中央做理论宣传工作。1933年初,进入江西革命根据地,后来担任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从事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工作。尽管当时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府均在中共中央“左倾”错误路线统治之下,但是无论从列宁主义学理出发,还是从苏维埃政权工作实践出发,或者说,正好是从这二者的结合出发,张闻天都对在苏维埃政权建设中要贯彻德谟克拉西(民主)的原则非常重视。

要实行苏维埃的德谟克拉西

张闻天从理论上论证,苏维埃政权对工农大众要最大限度地发扬民主。他说道:“这一工农民主专政对于最大多数的工农民众则是最大限度的德谟克拉西。它真正实现了广大群众言论、集会、结社与出版的自由,使广大群众真正参加苏维埃政权,开始自己管理他们自己的国家。”

他引用了列宁的论点:“新政权是大多数人的专政,是依靠而且完全依靠大多数群众的信任。最自由的,最广泛的,最有力量地吸引一切民众参加政权,没有任何隐藏,没有任何秘密,没有广告,也没有形式。(1920年10月20日《关于政治问题的历史》)”当时周遭弥漫着的是强调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即暴力专政的气氛,而张闻天却很重视苏维埃政权要最大限度地实现劳动民众的民主,这无疑包含了张闻天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理解和认识,反映了这位学者型革命家执着追求民主的精神。

虽然在理论上说,苏维埃政权对广大劳动民众应实行最广泛的民主,但实际情况如何呢?张闻天观察到许多相反的情况:“在有系统的发展苏维埃的德谟克拉西方面,我们是异常的不够,甚至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与行动方面,表示出对于这一问题的无知与错误的了解。这主要的表现在我们苏维埃政府中工作的同志,往往只看到苏维埃政权的一方面,即是只看到苏维埃政权的权力的一方面,而不看到苏维埃的德谟克拉西的一方面,以至常常发生绝不能容许的对于群众的强迫命令的现象。”

反对以党代政,重党轻政

张闻天坚决反对苏维埃政权中党委包办政府工作,以党代政、重党轻政的现象。

中国苏维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政权。张闻天看到,在我们党内,对于苏维埃的工作,显然还是存在两种倾向。或者是我们党的负

责同志,直接下命令给苏维埃,要苏维埃执行党的命令,甚至在县苏(维埃)、区苏(维埃)的会议上,党的县委或区委的书记直接出席做报告,决定县苏区的工作。或者是党根本不理苏维埃的工作,把苏维埃的工作当作无关紧要。甚至把党内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都往苏维埃政府送。”

张闻天这里所说的两种错误倾向,实际上是一回事。既然党对苏维埃直接下命令,以党代政,包办代替,自然把苏维埃看作可有可无,无关紧要,把犯过错误的同志往苏维埃送,就毫不奇怪了。值得注意的是,张闻天的文中用的语汇是“许多同志”;“异常的不够”;“往往”;“常常”;“我们党的负责同志”等等。它说明,当时在江西革命根据地不是个别或少数地方,而是相当多的地方,或者普遍存在以党代政,党委包办代替政府工作的情况,而且直接从党的中央起就有这种情况。可见,这是“左”的错误路线、方针在党政关系方面的错误表现。无怪乎张闻天专门撰文批评这种违反并障碍苏维埃民主的现象了。

向选民报告工作要揭发一切错误”

结合当时改选苏维埃的具体工作,张闻天提出了发展苏维埃民主的做法。他要求:“吸收每一个苏维埃的选民,参加苏维埃的选举。”在改选之前,各级苏维埃必须向选民做他们的工作报告”“必须在候选人与工作报告中,发展极大的自我批评,揭发过去的一切错误,同官僚主义与贪污腐化等现象作最坚决的斗争。党不但不应该掩盖苏维埃过去的错误,而且应该领导这一自我批评的发展,消灭群众对于苏维埃负责同志的畏惧心理,使他们感觉到他们自己是苏维埃的主人翁,只有他们有权选出或撤回他们自己的代表。”

张闻天又写道:“在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首先必须利用一切官僚主义的事实向群众解释官僚主义的罪恶”。这里他用了“一切”这个词,没有为考虑照顾某些高级干部的面子或是防止产生什么“不利”的影响,在揭露官僚主义事实时要经过选择和领导机关批准手续留下余地。他接着写道:“在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贪污腐化也

是如此)的斗争中,苏维埃的领导者必须使苏维埃的公民学习他们的召回权与改选权。关于苏维埃公民的这一召回权在苏维埃的宪法上是分明的写着,然而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告诉群众如何使用这一权力。”事实确实如此,宪法上怎样写着是一回事,实际上怎么做又是一回事。张闻天想使实践与学理相一致的思维,面对着的却是行动与书面不相一致的现实。不过,张闻天确实真诚地想在苏维埃政权下实现德谟克拉西(民主),实现选民真正的选举权、召回权(罢免权)、改选权。张闻天接受了列宁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后,仍然信奉着民主主义精神。在他的思想里,这二者是能统一的。

苏维埃政权要重视舆论监督

为实施苏维埃民主,张闻天还重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这里可以引用他批评报纸在反官僚主义斗争中只空喊口号,而不揭露官僚主义事实的一段话:

在我们的报纸中,差不多经常议论到应该反对官僚主义,甚至有些地方由于叫喊反对官僚主义把嗓子都弄哑了。然而,关于官僚主义的具体事实的记载则少到再不能少的地步。我从《红中》(指《红色中华》——引者)106期翻到128期,似乎只有两个关于官僚主义的事实新闻,而且这些新闻都登在最不重要的地位,这些新闻都是拿旁观者的笔调随便写来充充报纸的篇幅的。除了空喊反对官僚主义而外,我们很难找到真正有名有姓的官僚主义者。他的官僚主义的具体表现与他的官僚主义在群众中所发生的恶果的记载。如若这样去空洞的反对官僚主义,那不但官僚主义不会受到丝毫损失,而且官僚主义者也会双手赞成反对官僚主义,因为这种反对决不会影响到他自己的官僚主义。

看来,在当年江西苏区就存在着报纸空喊反官僚主义而又不肯揭露官僚主义的事实及其严重危害的情况。张闻天对这种情况批评得多么深刻,讽刺多么尖锐!这反映了他对舆论工具——报纸不能如实揭露党和政府的缺点错误是何等不能容忍!这反映了他对实施苏维埃民主的心情是何等真切和热诚! (责任编辑 赵友慈)

纪要： 江青文革中的“碑石”

● 苏双碧

1966年1月21日,江青从上海到苏州看望正在养病的林彪,以“文艺革命”为名,提出要召开一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她要求林彪支持她,用她后来在《为人民立新功》一文中的话说,是把林彪当“尊神”请出来。林彪对江青的设想,表示赞同和支持。两人进行了政治交易,江青希望得到林彪的支持,林彪也想借江青的特殊地位达到其政治目的。随即由叶群电告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说江青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并说都什么人去,让刘志坚同萧华商量,把名单报“林办”,叶群提出希望萧华也去。但萧华一再推辞,不愿去,要刘志坚去,理由是“我事情很多,身体又不好,文艺方面的情况又了解不多。”最后决定由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宣传部长李曼村、文化部长谢镗忠、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等人参加。刘志坚向叶群报告参加会议的人选时,叶群转达了林彪向参加会议的部队文艺工作者说的话:“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随时可以同她联系。”刘志坚等人临走前,萧华特别交代:“江青同志是个病人,她对部队文艺工作如果有什么批评,你们不要当面辩解。你们就是‘带耳朵听’,少发表意见。江青这个人疑心大、脾气也大,对她的话,要多听少说,不要和她争,要尊重她。显然,萧华不愿意去,和他对江青的看法不无关系。但是,他从爱护部下出发,对江

青这个人的毛病,他还是交了底。

2月2日,刘志坚一行来到上海,当天下午由张春桥陪同至江青住处丁香花园,得到江青会见。刘志坚当即转达了林彪上述那段话。随后,在下午五时,江青又把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等请到锦江小礼堂,在坐的有张春桥。江青向参加座谈会的人宣布了纪律,即座谈会“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提出“不准让北京知道”。随后江青发表谈话:“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是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的政的时候了”。“现在的论战,还只是前哨战,决战时机尚未到来。”

座谈会从2月2日下午开到2月20日结束,中间的10日到15日,因江青有事,没有开会。会议以“看电影、批黑线”为名,看了十多部电影和三台戏。又以个别交谈和集体讨论的形式,把江青自己的意图灌输给与会者。实际上到会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并没有说多少话。这个座谈会开初以“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名义召开的,形成纪要时被改成《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样,实际上这个座谈会的前台人就不仅是江青,而是林彪和江青了,大大增加了座谈会的分量和政治性。

以彭真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此时搞了一个《二月提纲》,这就成了江青的座谈会必须搞一个“纪要”的重要背景。《二月提纲》后来既然受到毛泽东的否定,江青召开的座谈会就只能是“正确的”,针对《二月提纲》的。《纪要》

对十七年的文艺工作,包括部队的文艺工作进行彻底的否定。《纪要》的第二部分,即核心部分,“对毛主席文艺思想的理解”和“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认识”写了十点意见,认为文艺界在建国以后,基本上没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而对十七年来文艺工作从总体上看,则认为,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纪要》基本上是个“左”的产物,是个否定一切的《纪要》。

《纪要》的形成有个比较复杂的过程。由于座谈会基本上是江青一人的谈话,但她的讲话没有条理,十分零乱。刘志坚等人回北京时向总政党委汇报觉得应有个材料,而江青讲话时又不让记录,于是参加会议的几个人一起回忆、追忆,逐句进行讨论认同,才形成了《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即《汇报提纲》。主要写了三部分内容,即座谈的经过、江青在座谈中谈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以及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落实江青的意见。林彪在济南看到这个“提纲”,并听了刘志坚等的汇报之后,认为这个材料搞得不错,是个重要成果。这次座谈,在江青主持下,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回去后迅速传达,认真贯彻。”但是,刘志坚一行刚在北京下飞机,就接到江青秘书来电,说这个材料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没有能够反映她的思想”,要刘志坚派人到上海,再进行修改。并说,她已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派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来参加修改。随后,刘志坚派陈亚丁到上海参加修改。江青提出的“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陈伯达认为这样提很好。但没头没尾,应该说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是三十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路线的继续”,陈伯达说:“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

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陈伯达认为,只有“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才能更好地认清解放后十七年的文艺黑线。”陈伯达还说,“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把江青亲自领导的戏剧革命,如《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等,都写进去,“这些,真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东西。”陈伯达的讨好,使江青大受鼓舞。她说:“伯达的意思很好,帮助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很厉害。”这次修改,文字有很大的增删,从三千多字增加到五千多字。因为这个稿子江青认可后,以后就不改了。刘志坚批准打印一百份,送总政党委、宣传部、报社,并“拟批送林副主席、江青同志、萧主任、杨代总长等”。北京正在进行中,上海又传来毛泽东修改“提纲”的信息,要刘志坚到上海参加对提纲进行再修改。

毛泽东对江青主持召开的这次座谈会十分重视,当他看到江青送来的“提纲”时,立即对《纪要》进行审阅和修改。首先是在标题上增加了六个字:“林彪同志委托”,从此标题改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而在内容上也作了较多的修改,如在“彻底搞掉这条黑线”的后面,加上“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之后又加上这么一段:“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在“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的迷信”后面,加了“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斗争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后期”一句,等等内容,前后共修改了十一处。并再次嘱咐“请陈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也就是说,经过毛泽东亲自修改后,它也还有充实和修改的必要。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江青的主持下,有陈伯达、张春桥参加,又进行了较大的“充实和修改”。全文由五千多字扩充到一万字左右。对“纪要”的修改,毛泽东十分关注。这一稿修改后,毛泽东审阅时,于三月十七日批示:“此件看了

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意见。”随后,即三月十九日,江青又召集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以及张春桥开会,让他们看毛泽东又一次修改过的稿本,并征求意见。刘志坚提出“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的提法,涉及对整个文艺队伍的估计,建议把“组织”改成“整顿”,江青不同意改。因为,此稿已经毛泽东改过,大家就不再提什么意见了。江青宣布:“如果你们没有什么意见,就算定下来了”。并向与会者交代:“斗争很复杂,周扬在苏州养病,听说我们在同你们座谈文艺问题,好紧张,跑到上海来看春桥,打听消息,春桥没有告诉他。你们回去后,没有正式传达前,不许外传,要保密,这是一条纪律,定下来,一定要守纪律。”并以她的名义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说明《纪要》修改的经过,以及转达毛泽东三月十七日的意见。

林彪看到江青的信后,即以他的名义给军委贺龙等同志写了一封信,说这个《纪要》“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信中说:“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林彪还交代把他的信和《纪要》“分别送军委各个常委,看常委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意见就送给中央,由中央来批发。”在此期间,毛泽东对《纪要》又作了第三次修改,其中如“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改为“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党的领袖和其他同志们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又如把“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革命”,改为“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的革命”。还有诸如把“学习江青”改为“仿照江青”等等。随后,军委向中央和毛泽东请示,并将《纪要》和江青给林彪的信,林彪给军委的信,一起报中央。当时邓小平在外地视察工

作,给中央的这一份文件就送到常务书记彭真处。三月三十一日,彭真请中央军委起草转发《纪要》的批语。由刘志坚等人起草的二三百字批语,送彭真后,即于四月二日,将《纪要》和批语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当日,毛泽东批示:“已阅,同意。四月十日将《纪要》批发全党,并附了1944年1月9日《毛泽东同志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评剧院的信》。”

由江青发起的,毛泽东亲自关心和指挥并参与修改的,所谓《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正式产生了。因为毛泽东的介入,他亲自调动了林彪、陈伯达等来修改这个《纪要》。尤其是林彪被当成“尊神”请出,这个举动是走向“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步骤。正如江青后来在《为人民立新功》一文中所说的,她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是利用解放军的力量去“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这个《纪要》当时在党内外广泛传播,并于1966年4月18日,在《解放军报》上以社论《社论的题目《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形式把《纪要》的主要内容发表出去。1967年5月29日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之际,于5月29日正式发表。同一天《红旗》杂志发表题为《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的社论,社论声称:“这个纪要,是同《汇报提纲》针锋相对的。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文件。”说这两个文件是从两个代表不同阶级的司令部里发出来的两种号令”,“是无产阶级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发动大反击的一面红旗。”这个《纪要》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极坏的作用,是用来在文艺界、学术界兴起文字狱的重要根据。当时却被称为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革命号令”,“是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文件”。好在历史是人民群众写的,曾几何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即1979年5月,经中央批准撤销了这个《纪要》,并公开对这个《纪要》的流毒进行揭露和批判。

(责任编辑 杜晋)

目送胡耀邦的灵车

● 施 亮

十五年前,也就是1989年4月15日上午,我与妻子一起送父母去飞机场。先父施咸荣受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邀请,作为访问学者第二次偕同母亲赴美讲学。那天,他们迅速办妥手续,很顺利地进入关卡。走出飞机场时,天色灰暗,乌云密集,还下着零星小雨。我乘车回家,心内郁闷,似乎是担忧再下暴雨,影响飞机的飞行;又似乎不仅仅是这些忧虑,胸中有一股奇怪的压抑感觉。

走进家门,小保姆正在打电话。我下午要去单位,急于吃午饭,连连向她做手势。她却沒有理会,仍然聊了一会儿。放下电话,她立即对我说:“今天上午,胡耀邦在医院里去世了。”我愕然,反问她:“你怎么知道的?”她告诉我,她的一个安徽同乡在某部长家里当小保姆,因此消息来源是可靠的。我一下子怔住了,又坐在沙发上呆怔了许久,一股悲切的情绪泛上来。前些日子,我确实听人传说,胡耀邦同志在一次会议上心脏病猝发,被送进了医院。可又听说已经好转了么,怎么又突然病逝了呢……

下午我又上班。我在《辅导员》杂志当编辑,这个杂志就在团中央大楼内。当时,机关里的同事们尚不知道此事。听我告知了这个消息后,同事们聚集在我办公室里,一时黯然无语。大家心中的滋味儿是难言的,也是悲怆的。我们钦佩耀邦同志高洁、坦诚和正直的品格,也深深地为耀邦同志所受到的待遇而不平,但是,我们也对那时的国家形势有着深切的忧虑感,那年春天已经充满了扰攘不安的气氛:通货膨胀以

及官倒、贪污贿赂等交织一起的社会问题;老百姓对腐败官僚横行所持的激愤情绪;党内对改革的分歧;以及民众对胡耀邦同志的不平心理,各种矛盾凝聚起来,人们都有某种不祥的预感。

第二天,团中央大楼一层楼前厅里,设立了哀悼胡耀邦同志的小灵堂。正中是披着黑纱的胡耀邦遗像,两旁一副对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它再确切不过地反映了胡耀邦同志的崇高品德。人们进楼后,自发地在胡耀邦遗像前低头伫立,静穆默哀。团中央大楼里一片阴郁沉重气氛,同事们见面,彼此对望一眼,算是打了招呼。大家都是默默无言的,心事重重的。

4月17日上午,我又随许多同事到胡耀邦家里吊唁。那是北京胡同里的一个院子,胡耀邦文革时期从五七干校回京后一直住在那儿。他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也只是自己在办公室里支一张床,并没有把全家搬到中南海住。胡耀邦逝世后,他的家属在家中设立了灵堂,供人悼念。我们团中央机关的许多工作人员,没有任何人组织,结队自发地去参加悼念。我们赶到那里,才九点钟,门口已经排满长长一大队人,直至胡同口的拐弯处。大门前虽然有两位武警守卫着,却并不盘查进出的人们。

同来的团中央机关的一位老人对我们说:“耀邦同志律己是很严的。90年代,他有一回在团中央礼堂说:‘我这个人可能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可有一条我不会犯,就是道德品质和生活作风的错误。’他做人清清白白,就是反对他



胡耀邦 摄于 1988 年)

的人也说不出来什么！”这位老同志还回忆起胡耀邦文革时期在河南潢川县黄湖五七干校的一些往事。

前面排队的一些人也凑过来听，他们都是老知识分子模样。我们互相攀谈起来，才知道他们来自中国科学院。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说，胡耀邦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到中国科学院，搞了《科学院汇报提纲》，为知识分子们办了许多好事，人们至今感念他。

又一个人说，耀邦同志受四人帮迫害，在开他的批判大会时，有人故意叫他上台示众。可是，胡耀邦刚走上台，下面的群众却极其热烈地为他鼓掌。

前面一群知识分子火气很旺，你一言，我一语，说个不住。团中央机关的这些人却矜持得很，谨慎地并不说什么。虽然，大家从内心深处是赞同他们的话。

进了胡耀邦家中的灵堂，只记得有一排家人守灵，似乎其中并无胡耀邦夫人李昭，据说她恰好进去休息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位将近六十岁的老军人，泪水纵横，身体笔直站在胡耀邦遗像前。同来的团中央老工作人员悄悄告诉我们，这个老军人原是胡耀邦的警卫员，五十年代就跟随胡耀邦。文化大革命中，他也曾经起

来揭发胡耀邦。以后，他觉得没脸见胡耀邦了。胡耀邦当了总书记后，却不念其旧过，仍旧把他调来当卫士长。我们匆匆走过重叠的花圈丛中，又走出敞开的大门，只见前来吊唁的人们川流不绝，每人都是悲哀肃穆的神情。我心中感慨，有哪一位中国领导人的深宅大院可以如此让平民百

姓随意进出呢！这恰恰表现出耀邦同志生前襟怀坦白的性格和平易近人的亲民风范。

我听说 4 月 22 日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追悼胡耀邦的大会，团中央可有少部分人参加。不过，名额有限，我们杂志社只能去一人。我找到总编辑，激动地说，我到杂志社工作多年，从未向领导提出什么非分的请求，可这一回，我迫切希望领导能给机会让我参加追悼会，这是我衷心的请求。总编辑犹豫片刻，终于被我的真情所打动，她同意了。

开追悼大会那天早晨，两辆大客车拉去了团中央参加会的人们，除了书记处的领导们以外，大多数是在机关工作多年的老人们。一路上，人们脸色阴郁，闷不做声，氛围异常沉重。到了大会堂，我们这一拨人去得最早，只好在前厅等候。一个小伙子拽一把我的衣角，领我到人民大会堂门口的台阶上，眺望着下面静坐的一大片黑压压的大学生们，据说有二十所大学约三万余人。他们昨晚就从校园出发，深夜十二点到达人民大会堂静坐，要求参加胡耀邦追悼大会。北京市公安局原打算凌晨在人民大会堂戒严，也来不及了。大学生们整整坐了一夜，神情疲惫，但秩序良好。他们为了维持秩序，专门组织

了纠察线,不准外人进入。纠察线圈外,周围站了很多市民,安静地观望着。

在台阶上,也站着几十个人。不远处,就是当时任北京市的一位副市长,他笑嘻嘻双手抱肩,我实在搞不清楚,他高兴的到底是什么!我身边的两位团中央书记,却是神色忧虑,眉头紧蹙。各自不同神情,反映出不同人等对那场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波的复杂态度。远处学生们高高擎举着胡耀邦遗像,还有几幅大标语。盘腿静坐的大学生们此起彼伏的唱着歌,犹如沉闷的雷声交错从阴沉的天空滚过。

我身边一个老太太,50年代担任团中央副部长,她忽然拽住我胳膊,止不住泪流满面说:“里边在开追悼会,外面更是真正的追悼。对一个人的评价最后还要靠人民!人民!”

开追悼会时,我们靠得比较后面。周围的人群都关心有哪些领导人来了,许多人时不时踮起脚尖张望,却是什么也看不见。而那些生动场景,例如党内高级领导人步入会场的神情,聂荣臻元帅坐轮椅去参加追悼大会,胡耀邦夫人李昭抱住聂帅大哭……都是我晚上看电视才见到的。领导人念完悼词后,开始向胡耀邦遗体告别。我随着川流不息的人群走到玻璃棺前,深深望一眼胡耀邦遗体,他身上覆盖一面很大的党旗,躺卧在鲜花丛中。记得四年前,我在一次大型会议远远见到他,相比那时,现在的模样更苍老了,也瘦多了。虽然化妆师抹了挺重的油彩,仍掩盖不住他脸庞斑斑点点的老人斑。

随着人群走出人民大会堂旁门,我不甘心立刻回机关,又折回到大会堂门口的高台阶上。原来坐在台阶上的几排士兵已经站起来,手臂挽着手臂。以前静坐的一大片大学生也站起来,人潮涌动着。大学生纠察线也缩拢了,数万市民都聚集过来。我向站在那儿的人探问究竟,他说大学生们要交请愿书。

正在这时,里面出来一个服务员又驱赶大伙回到人民大会堂,我也稀哩糊涂跟着进去了。在那里,治丧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正收拾会场,许多人聚在胡耀邦遗体旁,不住抽泣。突然,熙熙攘攘的人群自动闪开一条通道,身旁有人说:“胡启立和乔石来了。他们护送灵车去八宝山火葬场……”胡启立泪痕满面,举步蹒跚,走在

前面,一位秘书搀扶着他,他的眼泡红肿,不用手绢擦泪水。他踉踉跄跄快走到玻璃棺的胡耀邦遗体前,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悲哀情绪,蓦然抽出手捂住脸,呜呜痛哭失声。他的身体几乎跌倒,秘书赶紧架住了他。乔石在旁边满脸焦虑又束手无措的模样,一会儿拽一下他的衣襟,一会儿又拉一下他的袖子,还附在他耳旁轻轻说一句什么。胡启立却全然不顾,两手捂住脸,浑身颤抖地哇哇痛哭。

又推来一辆小型吊车,把沉重的玻璃棺罩吊起,胡耀邦遗体被抬出来了。胡耀邦夫人李昭扑过去,哭喊一声:“耀邦我随你去呀……”这凄惨的声音真是令人撕肝裂肺,我的眼泪哗一下流出来了。周围嚎啕哭声也更是达到顶点。又一位面容粗糙黝黑的老农民扑通一下跪倒在地,嗓音嘶哑哭叫道:“耀邦呀……耀邦呀。”他带着衣服陈旧农民模样的一家十余口,男女老少们“咚、咚、咚”磕着响头。听说,那位农民是胡耀邦的哥哥胡耀福,是李昭特意把他们一家人从湖南农村接过来参加追悼会的。工作人员们抬着胡耀邦遗体从我们身边经过,近百名军人肃然立正朝遗体敬军礼,其他人鞠躬,又鞠一躬……

一大群悲痛欲绝的人们簇拥着胡耀邦遗体,抬进披着黑纱的灵车中。奏着哀乐的灵车和小汽车的车队,向长安街缓缓驶去。我目送灵车。刚才满腔的悲恸之情又化为了深深的迷惘。

当天晚上,我在电视中看到从人民大会堂至八宝山,十里长安大街自动站满了臂带黑纱的人民群众,目送胡耀邦灵车经过,连楼顶上都站满了人。

我还回忆起一些往事。

80年代中期,胡耀邦同志的处境就越来越困难,许多人说他“越搞越右了”。我曾经到山西农村采访两次,深切体验到那种“极左”的政治氛围。到了那儿,发现农村干部大吃大喝的现象极为严重。你若谢绝他们的宴请,就被认为是看不起他们,反而要恼火。还有,就是不少农村干部都骂“家庭联产承包制度”。有各种各样说法:“包产到户把农民搞穷了,五保户也没人管了。”如今农民不听命令,公粮也收不齐了。”



1989年4月22日上午,北京市群众在十里长街迎送胡耀邦灵车

“现在的政策,不是复辟资本主义是什么?”甚至还假借民意说:“老百姓把老邓和胡耀邦的头都骂肿了。”有一次,我接触一个共青团干部,他对我悄悄说:“别听他们瞎说八道!我家在农村,我还不知道,农民当然乐意自由一点儿好啦。”可他当时只能暗地讲,而不敢违悖那时上面官员的意志。由此,我得到一个深刻印象:那股保守顽固的极左势力确实是强大的,而且是根深蒂固的。

著名美籍华裔作家陈若曦女士在1985年曾经得到胡耀邦同志的会见,彼此在中南海交谈了两个多小时。陈若曦女士多次向我盛赞胡耀邦作风开明,诚挚坦荡,平易近人,是一个心口如一的人,在她所见的诸多政治家极为罕见。她说,当时大陆开放的程度很不够,对文化人出国的限制也很严。交谈中,她曾经问胡耀邦:“你们为什么不放北岛出国?”耀邦同志不知道诗人北岛的名字,问一遍陈若曦,立刻回头对秘书说,你要记下来呀,北京的北,岛屿的岛,查一下这件事,要发放他的护照呀。这个事例,再形象不过地反映了耀邦同志开明的作风。所以,中国知识界人士把他看成是诚挚的朋友。耀邦同志主张“宽容、宽厚、宽松”的“三宽”政

策,希望能形成民主活跃的社会气氛,坚决反对再搞阶级斗争了。他的做法正是符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可是,他却受到一部分抱有保守顽固观点的人物的反对。而那些人物,也曾经尝过阶级斗争的苦头。以前,他们被别人在运动中整肃,甚至坐监牢。而今,他们为了抓权和弄权,又反过来整肃别

人!这种翻过来倒过去的政治迷圈,实在让知识分子们感到迷惘与愤懑。1982年2月,我去南通采访。那段时期,曾被人们看成是国内政治气氛较为稳定与活跃的繁荣时期,其实也常常充满了“火药味儿”。与我同住一所宾馆的,有一位江苏的老作家顾尔镡先生,他是被江青迫害致死的著名导演顾而已的弟弟,正担任江苏省作家协会的副主席。那时,他在南京某刊物发表了一篇文章,主张应该多一些创作自由,作家才能写出好作品。这篇文章引起北京某些大人物的震怒,以致胡耀邦不得不在公开场合批评这篇文章的观点。可是,公开点名批评顾尔镡后,耀邦同志内心深感不安,又打电话给当时的江苏省委主要负责人,要他安慰顾尔镡先生。所以,顾尔镡先生那次到南通市,名义是休养身体,实质上也是避一避政治风头。我到顾尔镡先生的房间去拜访他,我们谈得很投契。我对他说:“我们这代人内心深处都是很迷惘的。”顾尔镡先生感慨地说:“唉,岂止是你们年轻人迷惘,我们也很迷惘啊!”临走时,顾先生紧紧拉住我的手说:“你们在北京能接触到耀邦同志吗?可能也没有机会吧。你就想办法再托别人,把话带到就可以。请告诉他,我顾尔镡是不要紧

的,也绝不会有情绪。最重要的是他呀,希望耀邦同志多保重!在各方面,多保重!”老人讲这番话时神情凝重,眼里闪着泪花。可惜,我只是一个小人儿,怎么可能接触到高层领导人,又怎么可能给他把话带到呢。如今在文章里写出,也算了却一桩心事吧。从这件事又可以看出耀邦同志那时的艰难处境。他力倡“三宽”政策,而他自己所处的环境都很不宽松呢。

胡耀邦同志是一个襟怀坦荡又磊落的人,他喜欢思考问题,对改革开放有一番深刻的见解。他主张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认为应该脱离苏式社会主义的轨道,探索和建设更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我清楚记得,在1985年,团中央机关传达了一次胡耀邦的内部讲话。他深刻分析了当时苏联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状况,认为改革和民主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流。他提到了在波兰发生的“团结工会”运动,尖锐地发出疑问:为何自称代表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波兰共产党却受到了工人群众的反对?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讲,又具有怎样的教训?而对中共来讲,又具有怎样的借鉴意义?他提出警告,倘若完全由执政党包办“工会”之类的群众组织,这些组织又不能反映民意,在中国“团结工会”也是可能发生的。那一次讲话,他提到政治改革问题,严厉批判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认为不脱离这种模式的轨道,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没有出路。他的这些话讲得很透彻,至今仍然有很强烈的现实意义。传达了上的讲话以后,编辑部里一位思想很左的老同志,就很不以为然,认为耀邦同志的讲话与周扬的“异化论”没有什么区别,讲得太出格了。而我内心掠过一层不安的阴影,心想,耀邦同志的讲话思想很解放,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但是,也会使那些攻击他的人得到口实,别人又能抓到他的“小辫子”了。

那时候,胡耀邦同志各式各样的“大辫子”和“小辫子”已经有一大把被别人攥在手中了。特别是,1986年底和1987初的全国性学潮爆发,更加剧了形势的恶化。

还记得,1987年元旦前后,社会就充满了乱纷纷的各种小道消息。我回到家,父亲总要问

我:“在机关听到什么消息没有?”先父施咸荣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当研究员,担任社会文化室主任。本来,他只是个纯粹的学者,并不关心政治。可那几天,他也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忧虑感。

终于,1987年1月16日下午,团中央机关党委通知各部门,请大家注意看晚上七点钟的新闻联播,有重大消息。同事们大都猜到此事,在办公室却缄口不言。只是乘电梯时,一位老同事才沉重叹息道:“唉——!重大消息,重大消息!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一听这通知就发慌。如今,总以为这‘重大消息’该没有了吧……唉!”

晚上回家,我们匆匆吃过晚饭,就看“新闻联播”。果然,广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公布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的消息。

关闭了电视,我和父亲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都感到一种寂寥与郁闷。我们良久无言。

那天晚上,我询问父亲对以后时局发展是如何估计?他肯定地说,将会进入多事之秋。胡耀邦下台事件,犹如外国人所说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胡耀邦这块牌一倒,以后就是倒一片牌。改革开放可能会走一段曲折道路,中国的政局甚至可能发生动荡。我对他的这番分析有些半信半疑。

胡耀邦同志逝世十五周年的纪念日就要到了。我仅在几次会议上见过他,而从未有过直接交往。但是,我与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非常敬仰胡耀邦同志高洁、坦诚和正直的品格。

1978年胡耀邦同志在给郭小川家属的信中曾经写道:“群众、人民、后代子孙并不记得什么鉴定和悼词,记得的是那些有血有肉的史实。”确实是这样的。人民群众对任何政治人物的评价,心里是有一本账的。伟大的政治家只有靠自己的人格,才能在人民心中凝结成一座永恒的丰碑。

在这座丰碑前,本文作者谨掬心香一瓣,敬奉给胡耀邦同志的英灵。

(2004年3月7日写于北京白云路寓所)

(责任编辑 致中)

也谈秦家店的 来由及其内涵

● 尹振环

读 2004 年第四期《炎黄春秋》,颇为敬佩刘济生先生之文《打倒孔家店与打倒秦家店孰轻孰重》。正如刘文所言,秦家店乃孔家店的“仿造”,实指持续二千多年专制制度——“秦制”罢了。对此,毛主席早有名言:“百代都行秦政制”。可惜历来对“秦制”因何如何产生,它的设计者是谁,它的要点何在,为什么历史终于接受了这个设计等等均语焉不详。

今天接着刘文的话题,继续谈谈它,想来不无益处吧,

一、“秦制”的来由:战争起着巨大的作用

春秋时期,生产力产生某种质变。铁器和牛耕的推广,使大范围垦殖土地成为可能,新兴地主及农民最关注得到土地,于是争夺土地的斗争日益激烈起来。仅据《春秋》242 年的记载,各国间的军事行动凡 483 次,朝聘盟会也是大国对小国的一种掠夺)凡 450 次(引自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册)。大国与大国、小国与小国、华夏与戎狄,动辄兵戎相见,不过春秋时期战争规模不大。到了战国中后期,战争规模十倍、百倍于春秋,达到空前的程度。

首先,全民皆兵,全民均处于战备状态。“考苏秦张仪说,计秦及山东六国,戎卒尚存五百余万,推民口数尚当千余万”(《后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惊人的兵民比例!其中秦“奋击百万”;楚“带甲百万”;齐赵燕合计约在二百万左右;魏七十万,韩三四十万(见《战国策》)。战国人口约二千万,成人以一半计,男子又以一半计,

岂不是全民皆兵?看来,各国都实行兵民合一,兵民不分,有事调集为兵,无事散处为民。

其次,战争极为频繁。据《战国策》、杨宽《战国史》等载,公元前 321 年以后的战国最后一百年里,各国有战争的年头,秦为八十年,魏为三十八年,韩为三十一年,赵为四十七年,楚为二十七年,燕为十九年,齐为二十年。秦几乎无岁不征、无年不战;其他六国虽然平均四五年或二三年一战,但每战常常是一连数年不断。《管子·参患》说:“一期之师,十年之积蓄殫;一战之费,累代之功尽”。《侈靡》说,“逢战之时,丈夫走祸,妇人备食,内外相备”,全民投入战争,碰上种收季节,“一日,败费千金”。可见人民负担是何等之重。国家要对付战争,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

其三,惊人的战争规模。战国前期,交战双方用兵不过十万左右。“吴起之用兵也,不过五万”(《吕氏春秋·用民》)。而战国后期已经是数十万乃至百万之众了。战争持续时期已由春秋的数天增加到数月甚至数年。战争规模大,死伤自然也多。公元前 293 年秦将白起大破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公元前 260 年,秦俘虏赵军四十余万,都活埋了。由此可见,当时及龄男子随时有被编入军队的可能。“临淄七万户,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以二十一万矣”(《战国策》齐二、秦三)。必要时还组成壮女军,负责运输守卫,男女之老弱担负后勤事宜。这真是罕见、独见于世界的兼并战争。在这种条件下,要么千方百计地适应战争,在战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要么国破家亡。剩下的路只能是:一切服务于战争,一切为了战争,战争的需要高于一切。久而久之,这种需要变为社会的需要,而且是社会各方

面的巨大需要。

1、经济方面的需要

首先,需要足够的粮食。这么多人打仗,没有足够的粮食是万万不行的。因此农耕不能不视为国家存亡之本,不能不举国责之以农。同时理所当然地要抑制、打击影响农耕的阶级和阶层。其次,需要足够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战时必须勇猛作战,平时必须勤于耕作,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归之勤农。因此,耕与战并提,责之以农的同时,举国责之以兵。其三,需要充足的金钱、物资。孙子说:“十万之师,日费千金”。何况数十万、上百万之军,历数十数百日呢!上述需要决定了政治必须对经济进行全面的、强有力的干预;对生产、流通、交换、消费乃至分配领域,进行全面干预。

2、政治方面的需要

这方面最大的需要,是要有一个适应战争的、高度集权的国家。与经济方面的需要相比,政治方面的需要显得更直接、更急切、更严峻。

首先,局部必须服从整体,地方必须服从中央。步调必须一致,号令必由一统;其次,人民必须服从统一的指挥,各级官吏必须服从君主,并且要绝对服从;其三,需要将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并有效地加以控制,以便为战争服务。没有这三点,战争的胜利就难以保障。这些显然不是西周分封制那样的国家所能解决的。必须有一个适应战争的新国家。这种国家,第一,必须是中央集权的,不能各行其是,更不能分裂割据;第二,必须是统治阶级保持高度一致的国家,而不能是你争我夺的,因而必须是君主专制的;第三,必须用严刑峻法、专制主义的统治方法统治人民,以确保人民的服从。

3、思想文化方面的需要

这需要是双向的。一方面,战争需要控制舆论思想文化,禁止不利于战争的思想言论扩散。另一方面,因为战争不仅是军事和经济力量的较量,而且是智力的较量,在某种情况下,斗智比斗力更为重要,斗智的失败同样会招致灭亡。而智力却需要自由的条件。因此,君王不得不赐予“贤智者”这种自由,以及优厚的生活条件:“卑辞厚币以招贤者”,养士游说、百家争鸣由此而兴。由于战争首先需要讲求兵法,所以军事科学

最早发展起来,美籍华人何炳棣院士详证《孙子兵法》成书早于《论语》、《墨子》……百年以上(《历史研究》1997年,第五期)。汉初张良、韩信整理兵法书,共得182家,战国占大多数。同样战争更要讲求政术,发展政治科学。因而儒、墨、道、法诸家及他们各个流派的政治学说发展开来。同时兴起了合纵连横的理论,产生了一批外交家、谋略家。在“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的条件下,幻想恢复礼制、施行仁政的孔孟学说,只能受到君王敬而远之的待遇。而兼爱、非攻、寝兵、贵生、重己诸说,就难免不遭到法家的猛烈抨击了。什么样的政治学说才是最需要的呢?那就是兵书与“举事实、去无用”、力主耕战强兵、加强专制主义的法家理论。这种理论经过治国用兵的考验,证明确实是富国强兵的:魏国最早用法家李悝、吴起进行变革,使魏成为战国前期最强国;吴起逃楚,楚用吴起变法,使楚出现“南收扬越、北并陈蔡”(《战国策》齐二、秦三);却三晋、西伐秦(《史记·蔡泽列传》)的强盛局面。战国中期,秦用商鞅、齐用邹忌变法,从而使秦齐同时崛起于西方、东方。商鞅死,秦法未变,以至秦越战越强,终灭六国,一统天下。法家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逐渐总结春秋战国的历史经验,精心设计了专制主义的新型国家的。必须说明一点:吴起、商鞅不仅是法家,且兼兵家。吴起、商鞅,就有用兵专著、专论,且军功显赫。而孙武虽属兵家,同时有人认为也是法家。

二、“秦制”是法家的精心设计

专制主义本来是战争中形成的一种管理手段、统治方法,法家逐渐地将兵家的一些理论、方法改造和移植到为政治上来,使之理论化、制度化。始初它着重于对社会的治理,人民的统治,即商鞅、慎到的“法”、“势”,韩非不仅使之进一步丰富完善,而且侧重于御制群臣的“术”。《管子》则充实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方面,综合兵家和齐、秦法家,兼及儒、道之治道。所以法家设计的专制主义,第一层次是封建统治阶级对于社会、人民的专制主义;第二层次是君王御制群臣的专制主义。此两者运用到政权建设上,则成秦制国家政体的组织原则。

1、第一层次的专制主义

法家总的主张是“务在弱民，本在制民”。《商君书·弱民》说：“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因为弱则轨，弱则有用，弱之制之一如熔炉中的铁，陶范中的泥。如何治之呢？

(1) 以刑为主，严刑峻法

商鞅、韩非力主轻罪重罚，如此则轻罪不生、重罪不至。这叫“以刑去刑”。赏固然不能缺，但“刑九赏一”。《管子》主张“慎罚”，指出“杀戮不足恃”，但管说为秦所不取。

(2) 重本抑末

农，除了是战争和赋税的主要承担者外，用《商君书·垦令》的话说，“农朴”、“畏令”、“下不非上，中不苦官”；“不贵学问”，易于统治。而“诗书游说之士”、“处士”、“隐士”、“技艺之民”、“工商”，凡此五民大不如农，他们“轻禁”、“轻君”、“易徙”、“非上”、“议上”，无耕作之劳及临战之危，却富高于农战之民（《算地》）。因此一方面“民之欲利者，非战不得”；另一方面“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对于“事末利怠而贫者”，连同妻妾儿女，一并收为官奴婢。而所谓“尊本”，除了按夫授予田宅，重赏军功外，其他就是对人民生活的干预：“声服音乐、服饰）无通于百县”，取消旅店、不准自由迁徙，甚至禁止饮酒等（见《垦令》）。

(3) 什伍连坐，重赏告奸

农工商军、官吏及其家属，以至宫廷，一律编为什伍组织，相互监督。“夫妻交友不得弃恶盖非”，相互隐瞒。用严酷的连坐法及重赏来实现什伍的责任。“告奸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腰斩”。统治阶级上层同样行连坐（《商君书·禁使》）。

(4) 国家必须掌握土地

“地者，政之本也”。要“均地分力”；“与民分货”。国家必须控制得利最厚的产业：“官山海”；“挟其食，守其系”——官营盐铁、控制粮食与货币。同时要管理市场、吞吐物资、控制物价，既可调通民利，又可伺机理财谋利（见《管子》“乘马”、“海王”、“国蓄”、“轻重”篇）。

(5) 焚诗书愚黔首，实行文化思想专制

法家认为诗书游说，不仅影响耕战，而且乃

是一种危险因素。《商君书·农战》曰：“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皆怠于农战矣”。《韩非子》（“五蠹”、“六反”篇）把“学者”、“言古者”列为国蠹之首；“奸伪无益之民”。商鞅早就主张“燔诗书明法令”。《管子·法禁》主张“齐土义”，齐的手段是强者折、锐者挫、坚者破，绳之外诛。

2、第二层次的专制主义

其主要内容是：地方大权归于中央，中央之权集于君王。法家反对分封制：“毋与人以壤”。《管子·山至数》说：“如果像西周那样分封，到一定时候，必然会‘伏尸满衍野’，兵决而无止”。商鞅变法的一个主要内容是普遍推行县制。各国的变法实际上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因而法家著作对此着笔不多，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设县置郡后，如何集权于君王，如何防止人臣擅权侵主。

首先看法家的君臣观。

所谓君主专制，主要是对臣而言的，即君王独擅权势。但是在“君垂爵禄，臣卖智力”的君臣关系下，人臣在爵禄上总是贪得无厌的，而爵禄即是一种权势，因而“君臣上下一日百战”。只要条件具备，人臣都可成为“阳虎”——时刻觊觎着王位，或者做损害君王利益而符合自己利益的事。比如后妃、太子，可谓至亲至爱，但有时他们却希望君王早死。因为他们担心妻妾众多的君王会因爱的转移而变易储君，以致影响自己的利益。所以万万不可只看到君臣利益相同的一面，还必须注意到利益相异的一面。《管子·君臣下》、《韩非子》“杨权”、“奸劫弑臣”说，对于君主专制主义的主要危险来自“中央之人”、大臣、重臣，甚至主母、后妃、子姑、兄弟。“难之从内起与从外作者相半也”。因此对一切人都不可太信，“人主信人则制于人”，只有全面多方加以戒备才能有备无患。

其次，君主独擅权势。君之所以为君，臣之所以为臣，是因为权势在君。权势是制臣胜众之资，犹如虎之爪牙筋力。“主失势则臣得国”。因此君王必须：（1）“威势独在于主，不与臣共”。君王必须控制“文武威德”，即行政权、军权、惩罚与赏赐权。同时“生法者，君也”，立法权也要控制（《管子》“明法解”、“任法”篇）。（2）法家强调权势独断，并非不要兼听多听，听要“多其门

户”，甚至鼓励进谏、廷议、咨询，但君王拥有最高、最后决断权。一当决定，必须绝对服从，凡留令、亏令、不行令、不从令、益令，“五者罪死不赦”（《管子·重令》）。（3）独操对人臣的生、杀、富、贵、贫、贱之“六柄”。（4）君尊臣卑。对于君王最重要的是自身的“至贵”、“至尊”、“主势之重”、“主势之隆”（《韩非子·爱臣》），对此万万不可忽视。

其三，防止“大臣太重”。韩非认为战国后期之“公患”是“大臣贪重”，因此必须抑之：（1）不得末大于本，臣不得藉威城市”；

（2）臣不得专兵权，不得臣士卒，“命将太重，边地太守太尊”是不行的；（3）臣不得制财利专财权，“臣得制财则主失德”；（4）臣不得私施救济，不得私买人心与君争民；（5）臣不得“树人”专人权，“臣得树人曰壅”；（6）臣不得擅行令，“擅行令则主失制”；（7）臣不得有刑赏之权，“失刑德则臣易其君”；（8）禁止臣下结交成党，“大臣之门，唯恐多人”，一旦发现就要“散其党，收其余，闭其门，夺其辅”；（9）大臣有行则尊君，“一切功德美名必须戴在君王头上”；（10）必要时质其妻子，设置暗探，直至暗杀（见《韩非子》“孤愤”、“和氏”、“主道”、“爱臣”、“扬权”、“八经”篇）。

将这些主张付诸行动，不就是双层次的专制主义？运用到政权组织上，不就是全能的专制国家吗？

三、秦制：双层次专制主义国家的形成

战国后期，上述主张大都已付诸实施。秦始皇灭六国，缔造的秦王朝则完全体现了上述理论精神：

1、君主专制的国家政权组织



在山东曲阜孔庙故宅井后有一墙壁，相传秦始皇焚书时，孔子第九代孙孔鲋将《论语》、《孝经》、《尚书》等儒家经典简册藏在墙壁中而免于被毁，西汉时这批书又重见天日，为纪念此事，后人砌一段象征性墙壁，勒石刻“鲁壁”二字。

首先，帝王独擅权势，集权于一身，“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其次，在名实两方面加强帝王之至尊、至贵、至重、至上的地位。名的方面集三皇五帝之尊称，谓之皇帝；实的方面不惜调动大量人力，建阿房修骊山。“命为制，令为诏”，一经宣布即为法，诏令与现成文法有矛盾时，以诏令为准。其三，绝对掌握对皇室及大臣的生杀予夺大权，秦二世靠阴谋篡夺了皇位，竟毫不费力地“尽去先帝之故臣”及许多至亲（《史记·秦始皇本记》），生动说明了这一点。

2、地方大权归于中央的国家结构形式

战国时期各国已经逐渐地进行了如下三项变革：

（1）用郡县制改变分封制，用可以随时任免地方长官改变旧贵族垄断地方政权的局面。

（2）推行国家授田制，把土地作为赏赐军功、事功和鼓励人民耕战的奖品；对农民的授田，由国家直接征收赋税，改变旧贵族分级占有土地的状况。

（3）按地域，用什、伍、乡、里等居民组织，生产组织，军事组织，将劳动者组织起来，变为国家直接控制的编户民，改变旧贵族分级占有和控制劳动者的状况。秦统一天下，后来彻底废除封建藩制度，先后在全国设四十余郡，郡之郡守

(管行政)、郡尉(管军事)、监御史(监察郡守与尉),分别执行职务,互不统属。郡下设县,中央和地方所有重要官吏皆由皇帝任免调动,从而铲除了地方割据的可能性。秦始皇对六国原有法令,除吸收有用条文外,都予以废除,颁行统一的以秦法为主的法律,这即是“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同时,统一文字、统一币制、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轨、统一历法、统一伦理,修长城,建驰道,拆除内地长城,拆除妨碍统一的关隘、堡垒,疏通河道等等。事实证明,这种中央集权式的国家结构,是先进的、有效的,它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也加强了各地的联系。如果不被错误利用,它是有利于发展经济文化的。

3、专制主义的统治方法

战争时期对“妄欢呼者”,称誉敌众敌巧者,要“斩之”。也许因此《法经》才有“议国法令者,诛,籍其家与其妻氏”。但是由于战争斗智的需要,战国时期还难以取消私学,对知识阶层也难以实行专制主义。相反要尊贤重士,多方笼络知识分子,除此而外,法家其他各项主张大都在战国时期付诸实施了。秦统一天下,继承战国传统,国家控制主要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皇帝控制官僚地主、军功地主的财产权,各级官吏控制人民的财产权。重赏告奸,任用酷吏,严刑峻法,“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二十人中就有一人受刑。由于战争结束了,不再存在生存发展问题了,当务之急是稳定形势、巩固统治。在秦始皇看来,私学成风,必然混乱思想,动摇形势,危及统治。因此全面实行思想文化专制的时机成熟了:焚书坑儒,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从而双层次专制主义全能国家——“秦制”完全形成了。秦始皇用它征发了三百多万劳动大军,修宫造陵,戍五岭,筑长城,伐匈奴……如若不是全能的政治、全能的政治制度,在一个二千多万人口的国度里,是绝不可能做到这些的。

比起分封制的国家形式,中央集权国家形式是一种进步。没有它,就没有国家、民族的统一。在中央集权基础上实行君主专制,也属势在必行。因为,它能防止和减少最高统治层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但这里潜伏着极大的危险性:由于君王在法律、道德、舆论上都是无所限制的,一旦君王滥用权力,就会把天下投入苦海,而无可奈何。

专制主义的统治方法本来是残酷战争条件下的产物,当时有其不可避免性。但是原封不动地移于和平时期,也就难免走向极端。果然,秦始皇把双层次专制主义变为他推行暴政的工具,滥用民力,滥用暴力,迅速滑向灭亡。“百代都行秦政制”,由汉至清,固然对秦制有所损益,尤其在统治方法上饰以儒术(挂“孔家店”招牌)、辅以道术,但双层次专制主义的国家仍然是秦时的模式。在一个自然经济为主的、疆域辽阔的、民族众多的大国,法家理论及其设计的国家,也许真是有其必然的不可避免性的。

四、结束语:“打倒孔家店”即企盼建立“民家店”

综上所述,现在看来可以作如下结束语了。

如果说,孟德斯鸠、洛克的理论影响了美国国家政体的形成,那么,我国“秦制”的形成则是受法家理论指导的。如果说,西欧的封建专制主义是单层次的——封建统治阶级对于人民的统治,而我国则是双层次的——统治阶级对于人民和君王对于人臣的统治。前一个层次集大成的设计者是商鞅,后一个层次集大成的设计者是韩非。而《管子》则集齐、秦法家之大成,兼及儒道。之所以时代终于接受了法家理论所设计的专制主义,是由于长期兼并战争的需要。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真正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见《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战争,不仅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秦制”政体的形成、双层次专制主义的形成,而且决定了“秦制”是全能主义的。双层次专制主义全能国家,即“秦制”也,“秦家店”也。由于它完全受制于一人一姓,而且它含有战争、兵家、法家的“遗传基因”,所以它的治理总是跳不出“正复为奇,善复为妖”、“正奇之变,不可胜穷”的怪圈,它的治理结果也逃不出“一治一乱,治乱循环反复”的窠臼。一旦受制于一人的“秦家店”变为受制于全民的“民家店”,这时就会只剩下“以正治国”了。那么,孟子所谓“一治一乱,久矣”,将会永远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可见,“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不过是对“民家店”的一种向往罢了。(责任编辑 吴 思)

为《田夫之子》说几句话

● 李 锐

崔军同志这本回忆录很有史料价值。书名就叫《田夫之子》。崔田夫,作者的父亲,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北的农民领袖。书的开篇即写到这个长工之家,在大革命时期父亲怎样参加农会和入党的,后来如何奔走革命,以及当年陕北党发展过程中有关的人事等情况。父亲原名崔文宪,田夫这个名字,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谈话后,改过来的。书中保存了父亲的许多史料原件,如本人的《我的历史和思想方法的反省报告》,以及张鼎丞代表组织对这份检查总结作的结论,更是有价值的原始资料,从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当年延安整风运动的具体运作情况,这有助于对整风运动的历史研究。我在延安六年中,没有见到过崔田夫,但是他的大名是听说了的,从他儿子的记述中,才对这样一位农民革命领袖人物,有了较具体的认识。

1934年,在陕北紧张的游击战争环境中,崔军那年才五岁,就随他的母亲和弟弟一起被捕,关入国民党的大牢;随后,他的伯父也惨遭杀害。儿子

亲见母亲受到严刑拷打,百般折磨。“我母亲头上、脸上、手上都有伤,晚上躺在谷草上翻身都困难。”敌人实际是把他们母子当作人质,想以此来诱捕陕北有名的农民领袖。从七岁到十七岁的十年间,崔军在延安上小学和中学。书中使我们具体了解到这些典型的“红小鬼”、“小八路”,又是“土包子”(本地的)、“洋包子”(外来的)们,在延安时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他们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全国解放后党政部门的领导干部。

书中写的那个“4821”问题,是特别值得关注的。这并不是一个什么工程的代号,而是这样在延安长大的21个青少年,于1948年派去苏联留学及后来在“文革”中发生的事情。崔军是其中之一。当年正是全国革命胜利决战时刻,为了准备执掌政权以后的建设人才,他们被送到苏联学习,都进入工科和财经类大学。这些烈士遗孤和高干子女(他(她)们的父辈是罗亦农、刘伯坚、项英、叶挺、李硕勋、谢子长、任作民、

邹韬奋、张浩以及叶剑英、高岗、罗炳辉、贺晋年、张宗逊、王稼祥、萧劲光等。

1954年,当时的燃料工业部派了一个电力代表团到苏联参观考察,刘澜涛副部长任团长,我以水力发电建设总局局长的身份任副团长。这个团的任务着重考察水电建设,在苏联共逗留了四个月。这时崔军和李鹏、林汉雄、贺毅四人刚从莫斯科动力学院水电专业毕业,他们四人就留在团内,同我们一起活动,并担任翻译工作。回国之后,除李鹏到丰满水电站任职外,崔军等三人都到水电总局系统工作。谁也无法预料到的是,这“4821”竟然会成为一个“问题”。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这21个当年留苏回国的学生,已在各自岗位上克勤克俭工作了十多年,被打成一个“苏修特务案”,坐牢的坐牢,隔离的隔离,受尽了苦难和折磨。”这虽说是“文革”中成千上万大大小小的荒唐事件中的一桩,对身受其害的人来说,其难堪和痛苦是可想而知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文化大革命真是何等的灾难和浩

劫。

我在水电系统前后工作11年,即1952年到1959年,1979年到1982年,这是我生平最长的工作岗位,情有独钟,不解之缘,又遗憾终生。因此,直到现在,同崔军一直有来往。我深知中国的水电建设生不逢时,在计划经济制度和长官意志控制之下,在火电易于急功近利和水利工程片面防洪的夹缝之中,我国水电应当优先发展却不能优先发展。在上个世纪中,不论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无不优先发展水电,许多国家长期水电比重占优势。只有我们中国脱离了这个世界能源发展的规律。崔军回忆录的主要篇幅,写他一生所从事的水电建设事业,其中甘苦,我所深知,所写的许多工程感到特别亲切。几十年间,这位自幼受尽磨难的“田夫之子”,锻炼成了一位经验丰富、业务专精的水电专家,是许多工程的指挥员和技术负责人。书中写了好些他在现场解决技术难题的事例,我是能够看出他所作贡献的分量的。他不但写了自己个人的活动,也写出从事水电建设这一支队伍的活动。像西藏海拔4400米羊卓雍湖水电站工程,那样难以想像艰苦的施工条件,如果不是有这样一支武警水电部队的英勇奋战,是根本不可能建成的。崔军是武警水电指挥部的

副主任,他多次去工地,书中较详细谈到这一工程的种种具体情况。这里我可以附带插一句:1979年到1982年间,我曾是这支部队的前身——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水电部队的兼政委,早就了解到这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工程部队。这本回忆录所写的事情,同我相关的还真不少,许多往事故人又都栩栩如生浮现在眼前。我就更乐于为之作序,拉杂说些读后感言。

崔军酷爱自己的工作,对许多问题有自己的看法。1992年以后,被安排多坐机关、少下工地,他就“常用‘婆婆嘴’,处处‘管闲事’。”“凡是遇到对水电事业有益的事,我就要参谋意见;凡是与水电官兵、职工疾苦有关的事,我就要大喊大叫。”从1989年到1997年的10年中,我给部长和中央领导同志送报告、写信不下百篇,反映方方面面的问题,提出各式各样的建议和意见,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和效果。”他自认为“是一个敢说真话的人”。书中收录了15份这样的报告

和信件。2001年,他已73岁,回到6岁就离开了的家乡绥德农村,住到曾养活他母子3人的三舅父家。“自1997年以来,连续5年旱灾,今年种子都没种下去,全家吃的是淡水煮菜,简直像‘猪食’一样。我打开他家的粮缸,只有几斤生了虫的粗粮。”绥德县的山区农民同我三舅父相比,有的接近,有的甚至还更差。”他为此向中央领导写了封长信,并建议为该县批拨修条公路的扶贫项目资金。他将信给我看了,由我转了上去,算是得到解决。

崔军是个有心人,他在“后记”中还谈到自己的养生之道,尤其坚持常年游泳的好处(我们是常在一个室内游泳池碰面的),以及应当广交朋友。他在文史方面不是专长,所书自不能以文字取胜,内容组合或嫌生硬;有的史事及其分析(如紫坪铺工程下马问题),有待专家考证。可是我相信,读者从他质朴无华的叙述中,必可增进对于当代历史一些侧面的理解,可以从中获益。

(2003年12月4日)

欢迎邮购《炎黄春秋》近年合订本

通告

2003年合订本于2004年1月装订完毕,如购买合订本,请将书款汇至我社发行部

1999年合订本 简装 51元 精装 56元
2000年合订本 简装 51元 精装 56元
2001年合订本 简装 51元 精装 56元
2002年合订本 简装 51元 精装 56元
2003年合订本 简装 51元 精装 56元

(以上均免收邮费并挂号邮寄)

奇女 奇想 奇书

——读王小平《第二次宣言》

● 钟沛璋

最近我读到一本旷世奇书——王小平的《第二次宣言》。

为什么叫第二次宣言？王小平说人类有两次宣言。

第一次宣言是宣告人类从何而来。古猿在大自然的灾害和凶禽猛兽的威逼下，为求生存和发展，冲破樊篱，在劳动中实现生命的飞跃，进化为人类。劳动创造人类。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宣告人类是从猿进化而来。

第二次宣言是宣告人类向何处去。猿类进化为人类后，人类不断改进生产工具，推进了科技革命，开拓了文明。但人类并没有完全摆脱兽性，自私、贪婪、凶残，科技被利用来相互残害，而且越演越烈，人类已处于随时可能自我毁灭的危机之中。为了求生存，求发展，摆脱危机，人类不断探索发展的客观规律。现在人类已经可以科学地控制、主导自己的进化，实现生命新的飞跃。王小平《第二次宣言》，宣告人类将向仙类进化而去。科技创造仙类。

人类要进化为仙类，这是不是荒诞？

不是。追求成仙，原本是千百年来人们美好的愿望。我国人民就创造了许多多长生不老成仙的动人的故事。我国古代庄子、广成子、黄帝都



王小平

把长生之道作为最高的道。人们还把人死了，称为“乘鹤西去”，成了仙。美好的愿望并非荒诞。嫦娥奔月早已不是神话而已成为现实，人类早已登上了月球，而且正在向火星、更遥远的星空飞去。既然嫦娥奔月可以变为现实，那么秦始皇追求长生不老，为什么不可能变为现实呢？王小平指出，纵观人类寿命史，随着人类的进步，人的寿命也在不断地进步。在生产力低

下的4000年前的青铜器时期，人的平均寿命只有18岁，古罗马时代为23—25岁。以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平均寿命来看——夏商时期18岁、秦汉时期20岁、东汉时期22岁、唐朝27岁、清朝时期33岁、民国时期35岁、1985年已达68岁、2000年达71岁。中国人的寿命在解放后短短50年里延长了一倍之多。现有的科学家宣称，人的寿命达到120岁也可能实现。

愿望是美好的，现实生活却是多苦、多难。古代印度有一位王子释迦牟尼，目睹人们的苦难，心怀救苦救难，创建了佛教，要人们把幸福寄托于来世。世界其他大的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中国的道教等，无不包涵着人们摆脱苦难像神仙那样生活的愿望。英国的大历史学家汤恩比，纵观人类的苦难和互相残杀的历史，最后还是想

从宗教中找到解答。被中国人民颂为伟大而自己表明只想当个教师的毛泽东,在七十多年前就教导人们:“人类也要灭亡。人类灭亡是有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来代替人类,是事物发展的更高阶段。”事物发展的更高阶段是什么样呢?毛泽东没有能够说明。

达尔文进化论的发现,曾经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点是人的解放。马克思创建了人的德、智、体、美、乐全面发展的学说和共产主义世界大同的伟大理想。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超越了许多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空想,曾经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寻求解放的人民,在世界各地掀起了革命的浪潮。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被认为是开辟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但是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从发表《共产主义宣言》开始也存有矛盾的地方。一方面,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最活跃的革命因素,指出:“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所有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生存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胎胞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提出阶级斗争的理论,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迅速联合起来,用阶级斗争来推翻资本主义、消灭私有制。于是在俄国、中国出现了物质条件没有成熟的早产的社会主义革命。于是苏联在经过七十多年辉煌和苦难后出现自动瓦解,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红旗纷纷落地。在中国则不只经历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成功的公社化甚至十年“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

任何先进的学说,都是当时人类探索客观规律科学成果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年代科学成果的结晶,有发人深思、引人猛醒的先进性,也不可避免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和一些空想的成分。像一切先进的学说一样,马克思主义也必须是发展的,而不能成为封闭的、排他的、僵化的教条。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的时候,就曾根据实践不断修正和发展自己的学说。马克思之后,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类又不断创建许多光辉灿烂的科学研究成果和学说。其中一支学说叫做未来学。未来学在西方发达国家是一门受到普遍的重视和欢迎的显学。因为未来学总是为人们构筑大家想知道的未来发展形象。托夫勒的《第三次浪

潮》在全球畅销2000万册。托夫勒关于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的预见,对世界各国政要和企业界领袖的抉择和决策起了巨大的作用。罗马俱乐部的经典报告《增长的极限》,为今天人们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奠定了基础。里斯本小组的《竞争的极限》,为自由资本主义的竞争敲起了警钟,呼吁必须“避免一场(经济、宗教、政治和伦理)全球自我爆炸的危险”。曾经与克林顿搭档的戈尔,也是一位学识丰富的未来学家。他在当美国参议员时写的《濒临失衡的地球》一书,短时间在美国重印了10次,同时被译成几十种文字,成为许多国家的畅销书。戈尔从参议员被选为副总统,并在下一轮总统竞选中,仅以几票之差输给了布什。

现在我个人以为我们中国也有了自己的第一本重大的未来学著作,这就是王小平的《第二次宣言》。这本著作对人类和未来世界的影响,将会远远超过过去所有未来学的著作。这是由于王小平综合了现代科学研究的成果,石破天惊地预言:“我们正处在万年未有的大变局——物质生产力、知识生产力、人本生产力的神奇突变的时空点上。高自动化使物质生产力发生突变——趋零生产。高智能化使知识生产力发生突变——神脑科研,高神性化使人本生产力发生突变——天才辈出。这一切变化之巨大、之突然,空前未有!”

这是由于王小平超越众多未来学家只着眼于研究新经济的发展前景及其未来影响,而是继承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点是人的解放光辉思想,指明人的发展是一切发展的根本,人人成仙是人类最全面最彻底的解放。王小平不但塑造了长生不老、全知全能、至善至美、终日极乐,毛泽东没有能阐明的“发展的更高阶级”仙类的形象,而且“凸现了高人性需求在未来经济中的拉动作用,指明了新产业的形成与未来经济的五大发展趋势。这种未来经济形象,源于科学的预测,根据于科学的依据,体现于新经济发展融心、融智、融资三位一体的超越传统生产力理论的人本生产力理论”。(著名未来学家秦麟征为该书写的序)

我觉得《第二次宣言》对世界、特别是人类未来将会发生的影响,不会低于一千多年前的《圣经》,甚至不会低于一百年前的《共产党宣言》。

为什么这样一本奇书,不是出于某位“一句顶一万句”的领袖,也不是出于皓首白发、饱读经书的大学问家,而竟出自于才21岁的“黄毛丫头”。这不奇怪吗?的确,王小平就是一位超越常规的奇女。在学校高一期末考试,她名列全班第一,总成绩比第二名足足高出70分。她却决定退学回家自学。为什么呢?她发现学校一个学期才学十几本书,而自己一个月至少可以读几十本书。她不是一般人理解的回家自学学校规定的课程。而是进行研究型的学习,在研究和写作中进行创造性学习。她十分重视

首先把握现代科学知识总体系,有了总的知识背景、知识视野,再根据研究的需要进行深入学习。她说读书有很多方式,或精读、或泛读、或选读、或快读、或细读。她通常看书,是持研究者的态度,先是鸟瞰式、后是消化式、最后是批判式。她训练自己的速读的能力,又特别重视思考。她以书为敌”,把书当劲敌,找到书中的疏漏,加以批判。她又充分利用现代的信息工具电脑,建立自己的电子卡片数据库,把所有有用的资料全部录入。她又利用网络随时收集和查考现代科学知识。她从《毛泽东文集》中毛泽东的一句话中得到启发:“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她说人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归根到底,都是因为自身本领不够强大所致。只有对传统学习进行超越、变知识学习为本领学习,实现学习中心的根本转变,才能够克服本领恐慌。王小平向世人提出“大成”者的本领菜单——学习能力、思维能力、创新能力、谋划说服能力、交际能力、合作能力、组织能力、自知能力、自制能力等十大能力。王小平17岁登上全国教育学术研讨会讲台,给专家作学术报告。18岁在高校办系列讲座。19岁,与人合著



《大成奥秘——超越美国成功学》。20岁出版《本领恐慌》。想想马克思在当时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大英图书馆的条件,与恩格斯一起写成《共产党宣言》时,才29岁。再想想今天人类科学研究成果已极大丰富,信息咨询条件已极大便利,王小平以她超常的学习和思考,21岁写出《第二次宣言》这样的奇书,也就不足为奇了。

翻开《第二次宣言》这本奇书,人人都可以开卷有益。首先可以大开眼界,领略在日常忙碌中自己不知道的现代科学知识。从书中可以汲取许多

精辟的见解,比如:人类将通过高科技主导自身的进化,使未来的人尽善尽美;比获取空间上的自由更重要的自由是获取生存时间上的自由;世界上最大的监狱是头脑的监狱,人是观念的囚徒;21世纪,最需要的不是金钱,不是资源,甚至不是技术,而是能够使全世界人类联合起来的共同理想;市场是“看不见的手”,科技是“看不见的头”,市场与科技是人类的两尊神;未来的经济是高科技与高人性的联姻。等等。

我感到从《第二次宣言》中得到最重要的教益是:

解放思想,把自己从旧观念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改造自己的思维方式,认清未来决定现在,只有准确预知未来,才能正确制定战略,抢占未来发展的制高点,才能有真正跨越式发展。

深信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点是求得人类的全面彻底解放,深信生命的绝对宝贵性,人的发展是一切发展的根本点。

把握万年未有的大变局,人类正处于或是成仙、或是毁灭,或是上天、或入地狱的关口。每个人都为全世界人人成仙的伟大共同理想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责任编辑 杜晋)

从“以人为本”想到的

● 姚松柳

“以人为本”、“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些体现“以人为本”观念的文字，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内容条款。

“以人为本”就要尊重和保障人的一切权利，包括对人的选择、尊严、感情的尊重；“以人为本”就要关注人，尤其那些底层、弱势的人的自下而上环境与状况。政治措施、权力关怀、舆论观点、文学和艺术笔墨等，应当更多地给予他们。一言以蔽之，“以人为本”就是要重视和关注人的一切。

“以人为本”还反映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在逐步走向成熟。因为，民主的本质与核心就是人权。而只有逐步走向成熟的民主政治，才能使人看到民族复兴的曙光。

确立中国当代的“以人为本”观念，就不能不使人联想起中国古代的“以民为本”思想，以及这一思想的代表人物：晏婴与孟轲，即晏子和孟子。

晏子和孟子不仅是春秋战国时期“民本”思想的代表人物，而且还是中国古代最具民主色彩的卓越思想家。他们的“民本”思想，集中体现在对“民”的强烈关注和深刻认识上。

先秦时期，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民”的概念就是指人，是指除了统治阶层以外的各类人群。《诗经·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假乐》：“宜民宜人，受禄于天”。此外，古代各类史籍中的“民”，亦被释解为“人民”，或“百姓”。因此，晏子和孟子所说的“民”，就是指当时的人民、百姓，他们的“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以百姓为本。

晏子，春秋末期齐国人。曾任齐国灵公、庄公、景公三朝的辅弼大臣。他不但是位思想家，还是一位政治家。他的言论和事迹，记载在《晏子春秋》一书中。

在《晏子春秋》这部史籍中，有很多反映晏子“以人为本”思想的言论和事迹。通过这些言论和事迹可以看到，在晏子的思想中，充满了对“以民为本”的深刻思考。其中，最著名的是在《内篇问下第四》中，晏子和当时的

另一位著名人物叔向的一段对话。叔向问晏子：在社会混乱，失去常道，国君和官僚贵族品行坏僻，背离社会道德的状况下，怎样做才能既安定人民，又不要让人民产生不端的行为，而背弃社会道德。晏子答曰：“以民为本也”。他认为：如果能以民为本，把人民当作社会的根基，使人民安定，哪里会有不端的行为和背弃社会道德的现象出现呢？在这段对话里，晏子不仅提出了“以民为本”的思想，同时还在文字上明确使用了“以民为本”这样一个词语概念。这是与晏子同时代的，或此前的任何一位思想家所没有的。

晏子对“民本”的深刻思考与认识，不但体现在思想上，而且表现在行动上，对处在被统治地位的社会底层群体，尤其是对那些正在遭受灾难和折磨的人们，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和关注，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如景公之时，霖雨十有七日。公饮酒，日夜相继。晏子请发粟于民，三请不见许。……遂分家粟于氓，致任器于陌。”就是将自己家中全部财物，散发给“冻寒不得短褐，饥饿不得糟糠”的人们。此举使齐景公翻然醒悟：“寡人有罪，……寡人请奉齐国粟米财货，委之百姓。”这实际是晏子在用他无言的身体力行，向齐景公谏诤：作为一个统治者，漠视民众，特别是那些弱势民众的生活和生存状况，就是在犯罪。对于他们，必须拿出实际行动和切实可行的措施，以解燃眉之急，予以全力关注。而这些，一定要成为统治者治国的着眼点和思想，执政的出发点和归宿，也就是说，要“以民为本”。

晏子还看到了政治上的“以民为本”同人的道德之间的关系。“意（德）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意（德）莫下于刻民，行莫贱于害身也。”这说明，晏子清楚地认识到，个人尤其是统治者个人的品行，对他在政治上能否实施“民本”的政策措施，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因此，晏子不但将能否“爱民”，作为衡量和透视一个统治者治政好坏的政治标准，而且还将其作为衡量和透视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每个人道德行为好坏的准则。这就从道德规

范的角度,对“以民为本”的思想给予了人的个性化的观照与提升。

晏子“以民为本”的思想,反映在对国家与国君之间关系的认识上,首先将国家利益放到了第一位。他认为“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君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孰能任之。”他甚至直面齐景公:“君得罪于民,谁将治之?敢问:桀、纣,君诛乎?民诛乎?”这是何等的胆识与气魄!国为主要,君为次要,而国之基础在于民。这就是人民、国家和统治者在晏子心目中的地位。

晏子对人民、国家和统治者之间关系的认识,特别是他的“敢问”,以及他的“爱民”观点成为孟子“民本”、“民贵君轻”思想的主要源头。

孟子是战国中期的邹人。他一生游历过许多国家,曾两次客居齐国,做过齐宣王的客卿,在齐国呆的时间最长。据说,他还参与了当时以学术思想争鸣而闻名遐迩的“稷下学宫”。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学说,以及先秦时期的“民本”思想。

孟子的思想学说,集中在他的著作《孟子》一书中。这部典籍,因南宋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儒家思想集大成者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而被立为儒家经籍“四书”之一。

通过《孟子》可以看到,在孟子的学说体系中,充满了对人和人性的探索和思考,反映了孟子思想中的精华,这在两千多年前是极其了不起的。

孟子“仁”的学说把对“人”的认识放在第一位,“仁也者,人也”。他强调人对自身价值的自我认识,“人人有贵于己者”,表达了对个人价值、意志、人格的肯定和尊重。孟子“王道”与“仁政”的政治主张,构想和设计了先“富民”而后“教民”的理想王国。虽然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然而,孟子“以民为本”的心灵世界,表达出对人民深厚的爱。

孟子“天命”和“天人合一”的观点,在对“天”与“人”的认识上,重视人的地位、作用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强调人的道德和精神境界的高尚。正是在这种理念的基础上,孟子对人性——即便在现代科学研究中也是难点的问题,作了深层次的探究。他以“四心”“四端”说为基础,提出了以“性善”为核心的、系统的人性论,通过强调人性与兽性的区别,强调人性的平等,指出“人皆可以为尧舜”,从而表达了人与人平等的观念。

孟子进一步发展了晏子“民本”思想,对人民、国家和统治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地位在历史上首次作了明

确的阐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即“民贵君轻”的著名政治论断和主张。认为在人民、国家和统治者这三者之间,“民”是第一位的,是最重要的。虽然“君权天授”,“君治理民”,但是,“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鲜明地表达出“民”对“社稷”和“君”的决定作用,表达出对“民”的价值的充分肯定,对“民”的尊重。因此,胡适先生认为,在孟子思想中,“有一种平等主义”很带有民权的意味(《中国哲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这在先秦时期绝无仅有,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思想文化中,也十分罕见。即便同时期欧洲的思想,也不能与其相比。他犹如一颗在无际的夜空中闪烁着光芒的星。

但是,民权与君权、民主与专制是截然对立的。尤其对人和人性的摧残与践踏,是封建专制黑暗性和残酷性的一个突出表现。反映在封建意识中,就是对人的人格、感情和尊严的肆意贬毁。这种封建意识根深蒂固,影响既深且远。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当代文化的各个层面,看到这种封建意识的种种表现。中国封建社会是君主专制的社会。孟子思想中的“民本”精华部分,显然是与封建专制格格不入的。因此,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孟子及先秦时期的“民本”思想,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一方面,在统治集团内部,将“以民为本”、“民贵君轻”引为治政理国的自戒箴言,注意到“民可载舟,亦可覆舟”。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领域,又对其“民本”的内涵,不遗余力地加以消解、湮灭,而“不可使知之”。

晏子和孟子的“民本”思想,是中国历史处在大转折,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经历巨大变革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中华文化进入第一个高峰时期出现的,这一思想,特别是孟子思想,对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和文化产生了极大影响。例如,他那“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至理名言;他那“舍生取义”的豪情壮语;他那不知鼓舞了多少仁人志士,为了正义和尊严,同封建专制主义进行顽强抗争的,“激励人心、发愤图强的‘大丈夫’”、“‘大任’的‘浩然之气’”说,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精神,得到继承和宏扬。这就说明了这一思想所具有的进步性和发展性,以及可资借鉴的现实意义。因此,先秦时期的“民本”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宝库中的珍品。这样的思想珍品,在逐步确立“以人为本”观念的今天,如果能够为多元的当代思想、文化很好地吸收、继承和发扬;如果哪怕存在于一小部分“向权看”、“向钱看”的人群中,中国“以人为本”的民主进程前景,就会更加灿烂辉煌。

(责任编辑 致 中)

中共一大代表 李达的最后岁月

● 李 崑

一、重修旧作

李达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一向被尊为“中国的理论巨匠”。

1961年,李达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这年夏天,因为双手颤抖的病症,加上劳累过度,他来到庐山休养。

8月25日,刚刚抵达庐山的毛泽东约见了李达。这是继1959年他们在武汉相会后又一次相见。那一次两位好友谈论文章时,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赞赏李达的《社会学大纲》。随后他也中肯而直率地告诉李达:“你的文章没有从前那样有锋芒。”从那以后,李达十分注重自己文章的“骨肉与血气”。

“看你的气色不太好,人也比过去消瘦许多,是不是工作太重,你可要注意身体,注意休息。”毛泽东一见面就非常关注李达的身体健康。

听到毛泽东的关心,李达十分感激。随后毛泽东又一次赞赏李达30年代所写的《社会学大纲》是那样“脍炙人口”,接着衷心地建议李达“是不是根据新的材料再修改一下,重新出版”,并希望李达在武汉大学多找几个助手共同承担这一任务。

李达当即表示:“我一定不会忘记你的嘱托,尽快把《社会学大纲》修改好。”

接受任务后,李达便雷厉风行。他一边打电话给助手,要求立即把有关书籍带上庐山,一边写信给武汉大学哲学系副主任余志宏,告诉他接

受了毛泽东交给的修改《社会学大纲》一书的任务,希望他能在优秀毕业生中物色两位有所作为的学生作他的助手,并介绍自己准备花3年的时间修改或撰写《唯物辩证法大纲》、《历史唯物论大纲》等6部哲学著作的计划。

给余志宏的信发出不久,李达中断休养,由庐山返回武汉。回校后,第一件事是筹建毛泽东思想研究室,李达调集了几名助手,随后又向学校要了几间房子,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就这样建立了起来。这是全国大专院校里最早建立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室。

李达与助手们经过5年的共同努力。数易其稿,1965年第一部著作《唯物辩证法大纲》终于问世了。当此书征求意见稿送给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给予了很高的肯定和评价:“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它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这些结论是对对立统一规律核心地位的“突出阐述和高度概括”。

二、抵制“顶峰论”

还在李达与助手们聚精会神地全面研究撰写《唯物辩证法大纲》时,康生与林彪等人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唱起了“顶峰论”。

早在1958年夏天的一次会议上,“顶峰论”的始作俑者康生就抛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1960年10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上,林彪指出:“现在的马列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上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思想的顶峰。”

对于康生、林彪等人大力倡导的“顶峰论”,李达认为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有一位领导特地撰写了一篇题为《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顶峰》的文章。当这篇文章送给李达提意见时,李达一看题目,就把文章丢在桌子上,毫不讳言地指出:“这篇文章题目本身就不科学,谁也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顶峰,因为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不可能一次就完成。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也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接着他要求助手们在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时,绝对不能出现这类字眼”。李达的话传了出去,弄得这位领导非常尴尬。

李达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但这并不能阻止那年月大报小刊上连篇累牍的“顶峰论”。相反,在林彪反复叫喊“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的影响下,“顶峰论”成为人们最时尚最热衷的话题。一次李达助手在谈到撰

写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时,提出是否加上“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李达立即对这种想法给予了严厉批评,指出“不能写。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汲取新的养料,不断丰富发展自己,决不会停滞不前,因此也决不会有什么‘顶峰’”。“‘顶峰’这种提法不符合辩证法,是形而上学,是吹泡泡,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李达的观点是鲜明的。然而许多人不能理解,认为李达是固执,是僵化,是埋头学问。当然也有一些好心人劝李达:“写上这一句话,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何必那样坚持,说不定还会犯错误呢!”这些善意的劝告没有改变李达的初衷,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怕什么?犯什么错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犯错误,而违反辩证法的东西就能出成绩?”

李达这种“不讲政治”的“固执己见”,引起了一些领导的不满。

三、武大“三家村”

1965年底,经国家有关部门同意,李达已经搬到了北京,就任全国人大常委会专职委员。然而由于《唯物辩证法大纲》还没有最终定稿,1966年2月,李达又返回了武汉,开始了全书的最后定稿工作。

正当李达全力投入工作的时候,文化战线上掀起了大批判运动。此时中共中央中南局的有些人对李达颇有微词,认为李达“埋头研究,不关心政治”,随即指示武汉大学整理出李达的一份材料,说李达是“反动学术权威”,并通过有关部门报到中央。因为李达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此事关系重大,中央有关同志就此事询问了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当时未置可否。4月,在杭州会议上,有人又向毛泽东谈及李达的问题,当询问可不可以对李达开展批判时,毛泽东仍旧没有表态。接着在上海会议期间,这人“不厌其烦”,再一次询问毛泽东是否可以对李达进行批判,并说湖北的群众有这方面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说了一句:“既然群众有要求,在校内批判一下也是可以的”。



中共一大代表李达

紧接着形势急转直下。1966年5月10日,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发表后,全国上下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大批判迅速出现了高潮。中央“5·16通知”发出后,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北京率先揪出了邓拓、吴晗、廖沫沙所谓的“三家村”。

揪出“三家村”,批判“三家村”,一时间成为全国各地效仿的大事。湖北省一些人立即将武汉大学整理出来的李达的材料加以“修改”、“充实”,作为中南地区的“三家村”,上报给中共中央文革小组。

6月3日,武汉大学召开全校大会,传达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精神,宣布珞珈山也有一个“三家村黑帮”。6月7日,在省委驻武汉大学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的主持下,召开全校三级干部扩大会议,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揭开武汉大学阶级斗争的盖子,将目标集中对准校长李达、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三人。

从此,李达再也没有安宁过。他先是被勒令“停止写书,交待自己所有的罪行”。接着他的助手们也被强制性地“集中”起来,强令写出揭发检举李达材料;他家的保姆被不明不白地弄走了,电话被剪断,北京的来信也被劫去了。

6月8日至9日,中共湖北省委召开贯彻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的会议,决定派出工作组到大专院校和文化艺术界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指出要把革命斗争的矛头指向“‘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6月10日,中共湖北省委正式决定将李达与武汉大学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作为武汉大学的“三家村”。这是全国所有高校被“揪”出来的第一个“三家村黑帮”。

四、不屈的抗争

6月13日,武汉大学组织“7000余名师生员工集会,批斗李达”,声讨“珞珈山‘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湖北省、武汉市几十万人拥入武大校园“声援”武大师生的“革命”行动。《湖北日报》、《武汉晚报》等报刊,长

篇累牍发表“批判揭露”文章,指出:“长时期以来,武汉大学存在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朱劭天、何定华和某资产阶级‘权威’等组成的‘三家村’黑帮,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疯狂地攻击1958年教育大革命,推行资产阶级路线,抗拒省委领导,阳奉阴违,欺上瞒下,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扶植资产阶级‘专家’,把武大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与此同时,湖北省将李达、朱劭天、何定华作为武大的“三家村”,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批判。

此时“批判”和“声讨”,虽然用的是“某资产阶级‘权威’”,但被隔离起来的李达心情异常沉重,他根本没有半点辩解的自由,只有老老实实“认罪”,写“认罪”材料是他每天的“必修课”。

6月30日,对于李达的批判开始升级,李达的名字,在报纸上公开点了出来。《武汉晚报》发表了《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和《揭发武大的“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指出“武大校长李达、前党委第一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组成的‘三家村黑帮’,就是这样一小撮妄图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

进入7月后,批斗的方式开始残酷起来。武汉地区接二连三的批斗大会,李达总是“主角”,批斗、声讨、示众、审讯、辱骂,使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遭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迫害。然而倔强的性格,使李达从不在批斗者面前低头,所以每一次批斗,对他的人体摧残是最重的。

尽管李达遭受种种非人的磨难,但当他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资料被抢走,助手被赶跑、研究室撤销时,愤慨地说:“你们把我的资料抢走了,把我的助手赶跑了,我怎样完成毛主席交给我写书的任务呢?”

无情的批斗,肉体的折磨,李达的身体再也无法承受。他的饮食锐减,病情逐渐加重,身体一天天地消瘦下去。妻子石曼华看到他这个样子,内心十分难过,但李达仍然抱着乐观的态度,“黑暗总会过去,等运动结束了,我一定到北京去,向党中央、向润之告状。”

7月中旬,为了加大对李达“罪行”的批判

力度,武汉大学举办了“李达罪行展览”。这时李达胃病加重,伴有大量出血,每次发作,李达都非常痛苦,有时痛得大汗淋漓。尽管如此,对李达的批斗却没有半点减缓的迹象,批斗、游街、罚跪,可谓变本加厉,直到李达卧床不起。

五、巨星的陨落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又一次抵达武汉视察的消息传遍了武汉三镇,可是李达被软禁在武汉大学自己的家中,无法知道毛泽东来到武汉的情况。

7月18日,中共湖北省委作出《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开除了李达这个“叛徒”、“地主分子”的党籍。

7月19日,看守李达的一个学生悄悄地把毛泽东已到武汉消息告诉了李达。这个消息让李达颇有些高兴,他认为毛泽东一定会出来给他说话的。当天晚上他强支撑起身体,准备给毛泽东写信,可是当他拿起笔来的时候,内心又充满了矛盾,是称呼润之,还是称呼主席?经过半天思虑,他选用了主席的称呼,因为他想在目前的处境下,直呼毛泽东的名字有些不合时宜了。全信的内容短得不到20个字:“主席,我有难,请救我一命。李达顿首。七月十九日。”

第二天,李达小心地用信皮把信牢牢包好,恳请学校“文革”工作队的人,将这封信尽快送给毛泽东。

然而,就在李将信交给学校“文革”工作队(上接80页)想家如果坚持要认真实行,势必同权势者发生冲突。冲突的结果,当然思想敌不过权势,最后是权势者把真诚的思想家当作了异端,把他们的嘴巴也封了起来。于是,独尊的思想也就成了一具空壳。儒学到汉末的隳颓,就是因为它只是一个招牌。读东汉以降的民谣,很可见当时的情形:“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一种社会的指导思想,一旦成了权势者愚弄他人的玩物,人们也就把它视为无物了。舔痔吮痂之辈,卑鄙无耻之徒都登坛说法之际,这“法”还有谁去理睬,活泼泼的思想已如庄子所谓供奉于庙堂上的那只死乌

的前两天,毛泽东已经离开了武汉。此信只好辗转送往北京。

李达的病情更加严重了:胃病频繁发生,出血不止,糖尿病恶化,手颤抖得吓人,进食困难,每天仅靠少量的稀粥维持生命,身体骨瘦如柴。家人看到李达身体不行了,要求去医院治疗,但被拒绝。李达非常痛苦地对看守说:“我们共产党人和解放军就是对待俘虏,也是有病治病,病好后送回原地,可现在就是把我当作敌人,当作你们的俘虏,也要给我治病呀!”过了几天,家人看到李达时有昏迷,要求自费去看病,但仍然被拒绝。

李达的信辗转送到毛泽东手里,已经是8月中旬,毛泽东看后,立即在信上作了批示,要求湖北省委解决李达的困难处境问题。

8月22日,李达已经是奄奄一息了。这时可能是毛泽东的批示起了作用,也许是有一些人“良心”发现,他们才允许把李达“押送”去医院,化名看病。然而,一切都晚了。这时的李达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已经难以输液。8月24日,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毕生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作出了卓越贡献的理论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教育家,走完了他76年艰难的人生之路。8月25日,在李达尸体即将火化时,学校宣读了经中央同意的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开除李达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戴上地主分子帽子,进行监督改造的决定”,并宣布“李达已死”。

(责任编辑 吴思)

龟了。无可奈何的真诚的思想家,这时倒是以反传统的面貌出现了,如嵇康、阮籍之流。这一点鲁迅论魏晋思想时有过很好的评论。宋明理学的隳颓,也是这般情形。

一种比较好的思想,要葆其青春,恐怕一要有不同思想的论争,论争是思想完善、发展的自由之路;二要切实认真地实行,实践的思想才有生命。倘若一面用权力禁止所谓异端,一面把思想变成虚伪的装饰,那再好的思想也会走向末路的。

诗曰:

百家思想各争锋,异彩纷呈千万重。
只道独尊成霸业,不知霸业毁阿侬。

晚 报 界 的 林 放

● 李 普

林放者，赵超构也。这位著名的杂文家一辈子办晚报，而且一辈子办《新民晚报》。我早年仰慕他，晚年同他结交，都同晚报有关。

1982年我退下来以后，主持中国记协的王揖要我帮忙。我在记协挂名主要做了一件事，就是以记协书记的名义连续三年主持了三次全国晚报会议，直到第三次会议上成立全国晚报协会为止。这三次我以主持人身份的发言中，都介绍和赞扬了赵老。抗日战争期间我在重庆《新华日报》，每天必看《新民晚报》，主要是看他的文章，那时我就是他的热心的读者。

我的一位好朋友方言是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所长，从刊物上看到了我的发言以后对我说：“你不怕人家说你右倾吗？”我说何以见得？他说：“你左一个‘赵老’，右一个‘赵老’，人家要抓你的辫子太容易了。”我这才悟过来，那两年正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很起劲的时候。第一次晚报会1983年12月在昆明举行，会后就有人对我说，他们来的时候战战兢兢，以为我是去抓反自由化的。那次赵老没有去《新民晚报》去的是另一位老总束仞秋。

第二次会1984年8月在乌鲁木齐举行，赵老去了，比我先到。他见到我，很高兴，他说：“怕你不来呢，你来了就好了。”这句话似乎含有深意，因此我特别记得。当时没有多问，今天想起来，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曾经为我担心。方言的担心还有他自己的一层原因，他在新华社山西分社社长任上被土皇帝抓起来，蹲了两年监牢。这种事是容不得你申辩的，因此他心有余悸。

我说了些什么呢？现在抄下第二次会上我说的两段话：

我们要向赵老学习。赵老的《未晚谈》为什

么那么叫座，那么耐看？文章写得漂亮，固然是一个原因。我以为更重要的是，他有真知灼见，有见解，言之有物，确实能从一件事件中看出其中的道理，发挥出来，能见人之所未能见；真正能够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软中有硬，软硬结合；清谈娓娓，平易近人。

我接着说道：

说到这里，我想借用龚自珍一句诗：“但开风气不为师”。我们只开风气，不当老师，不以老师自居。我想我们讲的指导性，虽然不一定能和开风气划等号，至少包含着开风气的意思；或者甚至可以说，指导性的主要内容和方法是开风气，是潜移默化，而不是具体指导什么。是和风细雨，经常不断，而不是狂风暴雨，一阵风，雷阵雨。从态度上说，只是作为读者的好朋友，天天到读者家里串门子，像知心朋友那样讲知心话；而不是摆开老师架子，教训人。这个态度问题，是个民主作风问题，又有赖于我们真正能够把一件事情弄清楚，说出个所以然来。为此，必须提高我们的思想政治水平。民主和科学两者，往往是联系在一起。

我这后一段话里，包含着赵老一个观点。他说：晚报要像一支报春的燕子，飞入寻常百姓家。这点我很赞成，在晚报会议的一次会上介绍过。

最近看到年轻学者傅国涌一篇文章，讲南京《新民报》被国民党封杀之后的一些历史。其中说，1944年赵超构，那时候他还很年轻，还不能叫赵老，随中外记者团访问了延安。他的报道《延安一月》在《新民晚报》登出，引起了轰动。傅国涌说他对毛泽东的观察可谓入木三分。关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赵超构说：“我们

的民主观念是以整个国民为主体的，不分阶层和宗派。新民主主义摈弃了‘国民’两字，而正式以阶级为主体。”赵超构又说：“我们最好的态度，是将‘新民主主义’看作是共产党目前的‘政策’或‘政略’，而不要相信这就是共产党的主义。主义是永久性的、它代表一种深远的理想，而新民主主义则不过是共产党在未能实行共产主义时的某一阶段的政策。”

后来的事实很快就证明他的观察多么深刻，这个赵超构多么了不起！翻开《毛选》第五卷，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1953年6月就指出所谓“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这种提法是有害的”，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赵超构说最好是将“新民主主义”看作是“目前的‘政策’或‘政略’”，应当说是对毛泽东这一思想最恰当的注释。

回想起来，我当时既没有看懂赵超构，也没有看懂毛泽东。

我何以没看懂呢？太浅薄了，太天真了，太傻了！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民主主义革命，然后才走第二步社会主义革命。这是1940年写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还是高举着新民主主义的旗帜。毛泽东领导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又叫做《新民主主义共同纲领》。在《毛选》中我们还看得到，毛泽东1950年6月还在强调这个《共同纲领》“是我们现时的根本大法”，又说社会主义改造“还在很远的将来”。可是仅仅三年之后就变了，而且是不声不响、突然改变的，突然改变了之后才大张旗鼓地予以公布和宣传。

这个改变不合法，因为没有经过全国政协，是对全国政协和《共同纲领》的践踏。这“上篇”和这些话事实上真正只是一纸“文章”而已，赵超构所说的“政策”或“政略”，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不过毛泽东亲自给赵超构的观察做的证明，1953年6月就来了。来得这么突然、这么快，是不是也有点出乎赵超构意料之外呢？

（2004，1，21，癸未除夕改定。北京）

毛泽东向教师敬酒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来到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他特意邀请自己在私塾读书时的老师毛禹珠一起用饭，席间热情地为老师敬酒。毛禹珠不胜荣幸，感慨地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却笑盈盈地回答：“敬老尊贤，应该应该！”

周恩来向老师捐款 1952年2月，南开大学老校长张伯苓突患脑血栓逝世，周总理参加了治丧委员会并送了花圈，挽联上写着：“伯苓师千古，学生周恩来敬挽”。1961年国家困难时期，总理给张伯苓夫人送去500元人民币，并嘱咐交际处要加倍关照张夫人和子女。

朱德给老师让座 1959年初春的一天，朱德在云南政治学校礼堂看戏。开演前，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由服务员引了进来，朱德一眼便认出，那位老人是自己早年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时的教官叶成林，急忙起身向前，

名人尊师佳话

江梅

立正敬礼，礼毕又紧紧握住老人的双手将座位让给老人，待老人坐定后，他自己才坐下。

彭总穿便服会见教师 1957年8月1日，是解放军建军3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彭德怀身穿便服，准备接见北京市部分中小学教师代表，工作人员提醒他说：“彭总，您是国防部长，应该穿军服才好。”彭总说：“今天是去见老师，学生见老师应该穿便服。”

鲁迅百忙中探望老师 鲁迅对寿镜吾老师一直很尊敬。他18岁到南京读书，每当放假回绍兴时，不论多忙，总要抽空去看望寿老先生。1902年至1909年，鲁迅东渡日本留学。这8年间，鲁迅经常写信向寿老师汇报自己在异国的学习情况。1906年6月，鲁迅从日本回绍兴与朱安女士结婚，在绍兴只停留了短短的4天，但他仍专程探望了年逾花甲的寿老先生。

共和国才子廖鲁言

● 许人俊

廖鲁言身材魁梧,仪表堂堂,风度潇洒。他19岁入党,32岁当选党的七大候补代表,35岁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秘书长、副主任(彭真为主任),39岁任共和国政务院副秘书长,40岁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41岁任农业部部长兼国务院七办副主任。他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农业部长。

他政策水平高,思维敏捷,富有文采,写文章、作报告、起草文件,一向亲自动手,从不要别人代笔。他记忆力强,善于分析、表达。大会上作报告,常常点起一支烟,熟练地运用各种数据,有条有理,连续四五小时滔滔不绝,透彻地分析农村形势,解释党内外人士关心的重大问题。资料翔实丰富,观点明确清晰,令人口服心服,给大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人们都佩服他,称赞他是共和国的才子。

一、在抗日烽火中出生入死,无所畏惧

廖鲁言是江苏南京人,家庭比较富裕,天资聪明,好学上进,富有正义感。早在少年时期,他就和一些充满爱国主义思想的初中同学,从学校走上街头,参加游行示威,愤怒抗议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五卅”惨案的暴行。读高中时,又和一些进步同学组织文艺团体“人间社”,开展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学籍。

1930年夏季,他毅然告别父母,离开鱼米之乡,登上北去的列车,到北平军医学院读书。后又追寻抗日救国道路,和几位好友一起创办《杠杆》杂志,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思想。两年后,加入左翼作家联盟,担任北平“左联”组织部长,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因组织活动能力强,党组织调他到“北平民众义勇军”任执行委员长和党团书记。他大展才华,带领一批热血青年进行政治

和军事训练,在市区贴标语、撒传单,组织飞行集会和游行示威,常常身穿民众义勇军的戎装,在流亡北平的东北军中四处奔走,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1932年7月,北平地下党组织决定发动进步学生和民众,在市区举行“八一”示威活动,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宣传团结抗日思想,廖鲁言担任示威现场总指挥。“八一”那天清晨,大批进步学生和民众,按照计划纷纷来到西单牌楼附近集合。只见一位青年,突然在大街上点燃起一长串鞭炮,发出示威开始的信号。转眼间,青年消失在人群中,他就是廖鲁言。

由于叛徒告密,廖鲁言被逮捕入狱。面对叛徒指认,廖鲁言只得承认是共产党员,但辩称鞭炮是别人给的,其他一概不知。

尽管敌人严厉逼供,他对党内机密守口如瓶。军法处审讯后,确定“拟判死刑”。远在南京的父亲得知后,悲痛万分。迅速筹集资金,疏通关系,死刑改为6年徒刑。

当时,被捕入狱的共产党人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0多人,廖鲁言是最年轻的党员。经过秘密串联,建立了狱中党组织,议定每20多人推选一名“斯皮克”,即“说话”、代表人,带头同狱方开展斗争。廖鲁言能言善辩,被难友推选为“斯皮克”、“生活委员和分委会委员书记”。他勇挑重担,积极配合难友在狱中开展反迫害、反虐待和说理斗争,参与组织绝食,要求改善生活条件,而且取得了胜利。

廖鲁言酷爱读书学习,狱中四年,他和难友们通过秘密渠道,先后搞到了《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列宁主义问题》等马列主义和中外历史、文学名著共1000多册。北平草岚子监狱,既是他同敌人斗争的战场,也是他专心读书、增长知识的地方。建国后,他在自传中写道:“我的理论修养,完全是在‘反省院’

(监狱)获得的。‘反省院’是我的大学。”

二、组织抗日“决死队”，开展游击战

1936年华北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轰轰烈烈展开，各方人士纷纷要求共产党派干部加强领导。中共中央代表刘少奇得知北平草岚子监狱关押着60多名优秀干部，认为，日军打来，这批同志必遭杀害。他们经过长期考验，坚持不在《反共启事》上签字，是好同志。为适应形势需要，他建议党中央批准这批同志按国民党的规定办理出狱手续。中央领导表示同意，同年10月60多人集体出狱。

当时，山西抗日形势大好，群众同仇敌忾，阎锡山当局寻求共产党合作。党中央指派薄一波、安子文等到山西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党组织安排富有文才的廖鲁言到太原军政训练委员会编辑室，协助杨献珍编写抗日救国宣传教材，并给军政训练班学员讲授政治经济学、农村社会经济的没落、地主和农民的基本矛盾、民族问题等理论专题。对于发动军政人员决心抗日起了积极作用。

“七七事变”后，我国进入全面抗日新阶段。薄一波根据党中央指示，与阎锡山反复磋商，决定共同组建青年抗敌决死总队。决死队又称山西新军，它是通过统一战线关系，以平津流亡学生为骨干建立的抗日革命武装，内部设有秘密党组织。廖鲁言受党组织委派，先任大队政治工作员后到二纵队第六总队任政治部主任。他带领部队在当地开展游击战，打了不少胜仗，为巩固和扩大晋冀豫边区抗日根据地作出很大贡献。

1939年6月，廖鲁言调任山西新军209旅政治部主任。他根据薄一波的指示，利用建旅、编团的机会，大力提拔秘密党员任团长和政治部主

任，撤换反动军官，实现党对部队的实际控制。决死队队伍的不断壮大和影响力的增强，使阎锡山深感恐慌。1939年冬季，他乘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时机，在山西组织了“十二月事变”，阴谋消灭正在崛起的新军和进步力量。当地抗战形势面临危机。廖鲁言获得情报后，在12月26日带着警卫员，利用夜幕掩护，悄然逃出敌占区。随后进入陕甘宁边区，胜利到达延安。

时任总政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得知廖鲁言长期在山西新军从事秘密工作，富有统战经验，推荐他到中央统战部工作，历任友军科副科长、科长。他不负重托，积极搜集有关国民党军队的资料，认真总结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统战工作的经验，编写了一些关于友军问题和对友军开展统战工作经验的小册子，深受中央领导重视。不久，调他任统战部长王明的政治秘书，参与制定对西北地方军阀和少数民族的统战政策。

1943年春，党中央成立中央研究局，刘少奇任局长，杨尚昆任副局长。下设党务研究组、材料组、图书馆。廖鲁言调任党务研究组组长，主要从事调研工作，为党中央制定各项政策提供决策依据和参考。两年后，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32岁的廖鲁言当选候补代表和大会记录组组长。后来他又调任刘少奇的秘书。1948年，中央成立政策研究室，彭真任主任，廖鲁言任秘书长和副主任。他主要给中央书记处起草文电，搜集有关材料，编辑《党内资料》供中央领导阅读。



1965年夏，廖鲁言（中）在石家庄赵县农村同四清工作团交谈

三、积极配合邓子恢,推动农业生产稳步发展

建国后,廖鲁言一直在中央高层领导重大决策的研究。1952年10月17日,他就“五反”运动问题,向中央报告:“为使小城市和大集镇的工商户安心经营,促进城乡交流和经济生活进一步活跃,避免影响秋后旺季的市场活动,建议结束‘五反’运动。凡尚未进行‘五反’的城镇,今后一律不再搞‘五反’运动。对于那些工商界对‘五反’尚存顾虑、经营情况尚不正常的城市,可以以市、县为单位宣布不搞‘五反’。对于那些工商户‘五毒’行为比较严重的城市,自择时间,用几天时间采用开会检讨的方式,以教育为主,组织工商业者坦白检讨自己的‘五毒’行为,订立不犯‘五毒’的爱国公约。只对其中个别‘五毒’罪行特别严重者,给以必要的、适当的处分,随即结束‘五反’……”

党中央认为建议十分重要,指示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参照廖鲁言的意见,根据各地情况,迅速结束“五反”。

也就在这一期间,党中央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组建中央农村工作部,任命邓子恢为部长,陈伯达、廖鲁言为副部长,杜润生为秘书长。中央政策研究室改组合并进中央农村工作部。陈伯达只是挂名,从不到中央农工部机关上班办公。大量日常工作是邓子恢、廖鲁言、杜润生等人操办。廖鲁言积极协助邓老工作,大力推动我国农业合作化稳步发展。

1953年10月15日,邓子恢正在南方考察。毛主席在中南海突然召见廖鲁言和陈伯达谈话,提出“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可带动互助组大发展”;“在新区,无论大中小县要在今冬明春,经过充分准备,办好一两个合作社”;“一般规律是经过互助组再到合作社,但是直接搞合作社,也可以允许试一试”;“合作社不能搞大的,搞中的;不能搞中的,搞小的;但能搞中的就应当搞中的,能搞大的就应当搞大的,不要看见大的就不高兴”;“要打破新区一定慢的观念”。

廖鲁言敏锐地发现毛主席的思想出现了新变化。不久前,中央确定应以发展和巩固互助组为中心环节,如今毛主席提出要以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中心环节。这是一个新思想、大变化,事关重大。他立即给邓老写信,通报情况。邓老迅速同意提前召开全国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重新研究互助合作发展计划。

十天后,廖鲁言在互助合作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但同时强调不能“把毛主席的指示简单化,错误理解为发展合作社要大,要多,要快”。这充分表明他的态度,既积极又慎重。

第二年,年仅41岁的廖鲁言被任命为农业部部长,并兼任国务院七办副主任。他是共和国农业部历史上最年轻的部长。当时,全国农业生产经过四年恢复,农产品和农业产值有较大幅度增长。但生产手段落后,抗灾能力弱,农民生活依然贫苦。他一上任就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边干边学边摸底,然后组织90多名机关干部,由7名局长带队,分赴华东、华南、华北、东北、西南14个省市,深入农村了解情况,协调商业、供销部门的关系,帮助解决生产资料的供应问题,做好春耕的准备工作,多为各省办实事。

他参与起草、制定《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对合作社内部的经营管理作了详细明确规定,并代表起草小组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说明,获得通过,推动了合作化的顺利发展,农村出现一片兴旺景象。

1955年,他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一方面,我国还是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还不能广泛实行农业机械化,更大规模的水利建设还不能全面展开;另一方面,国家的工业化需要大量的资金,主要靠农业的积累来提供,不能采取削减农业投资的办法来增加工业投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依靠互助合作,挖掘农业内部潜力,合理使用劳力,充分利用土地,改进耕作技术,加强抗灾能力,发挥集体生产的优越性。”

这一见解,曾受到毛主席的表扬,认为“此建议很好”。不久,中共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意见,指定他牵头深入农村调查研究,起草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实践一年多后,经过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和最高国务会议通过,最终形成《纲要》四十条(草案)试行。

廖鲁言有思想、有见解,善于发现和提出问题,考虑问题全面。他到农业部后,根据农村工作实际需要,确定自上而下建立农业技术推广、经营管理辅导、植保检疫、畜牧兽医等组织机构,至今仍在发挥作用。1956年3月,他就农、林、水利、气象工作,向中央如实汇报:“农业生产规划,越往下面指标越高,有的干部说,吹牛不上税。”同时指出:“农业生产合作社兴办一些非生产性的事情,不知爱惜民力,这种苗头十分值得警惕。”另一次会上,他还说:“山区人民的生活,特别是偏僻山区人民的生活,是很苦的。有许多山区,又是长期革命

战争的根据地,我们依靠这些山区的人民,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而在胜利以后,他们的生活改善不多,有的发出怨言,说我们下了山,忘了他们。”他强调,山区农业生产必须加强,主张“山区的生产门路是多的,是各种各样的,一般都应该采取农、林、牧业相结合的方针,还必须保持水土。山区的农业生产,不限于生产粮食,有许多山区是适宜发展工业作物的,特别是经济林木。”这一年,他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1961年5月,他到山西长治调查回京,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时,主张“在偏僻山区,应该允许分散的住户设立独立包产组,应该允许山庄独立户作为独立包产户”。

在火热的大跃进年代,他也一度兴奋过。但总体上头脑冷静,不乱放炮、瞎胡吹。他讲话、写文章都强调“农业生产有自身的规律,不能光靠冲天的干劲。冲天的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两者必须统一起来。爱冷不热,是不行的。没有冷静的头脑,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也是不行的。”他主张“应该实事求是,力戒浮夸和弄虚作假。经济工作必须是越做越细致、越踏实”^①;提倡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解放思想,这虽是大跃进的一条重要经验,而敢想、敢说、敢做就有一个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的问题——不是离开马列主义,离开科学去乱想、乱说、乱做。”

有一次,在农业部的会上,他对自己1958年估产过高,宣传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说了一些过头话,给中央提供了错误的信息,深感痛心,作了自我批评。他要求领导干部多下基层看看;“当你看到了许多痛心的事情之后,你就会觉得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我们的压力感也就有了。”他甚至说,“坐在北京对缺点是觉察不到的,对许多方面的认识也是不深刻的。”

正因为这样,中央领导人器重他,甚至拿他开一点玩笑。当时,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经济工作会议。李富春副总理就经济形势做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形势发展是马鞍形。毛主席突然手指梳着一头波浪发形的廖鲁言,风趣地插话:“我们的经济形势不是直线发展的,而



1953年廖鲁言和妻子陶桓馥

是像廖鲁言的头发是波浪式的,有起有伏,有高有低。”顿时,全场哄堂大笑,气氛活跃,搞得廖鲁言既不好意思,又挺高兴。

1964年2月,全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高潮。周总理指派廖鲁言带工作组到山西大寨蹲点调查,实事求是总结大寨经验。一个月后,他向总理递交《调查报告》,实事求是总结大寨经验的同时,也如实指出:到大寨参观访问的人太多,必须由中央和省、县加以控制。他认为,民兵部门要求射击比赛第一,文化部门要求培养歌手等等,也非控制不可。要求一个先进单位什么都第一,这是不可能的。表现了他大胆直言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四、“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诬陷迫害,59岁冤死狱中

1964年,我国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刚刚完成,工农业生产开始全面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然而,此时国内政治风云却悄然发生变化,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五反”和“四清”运动逐渐升温。

“五反”在城市开展,“四清”在农村进行。按中央要求,两个运动都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央指示下达后,国家机关轰轰烈烈掀起“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农业部的干部也发

动起来了。身为部长的廖鲁言,有思想、有智慧、有水平、有能力、有才气,但他工作要求严,为人自负,也有傲气、有脾气、有官气,尤其对领导干部态度严厉。稍不如意就发火、训人、骂人,司局长都怕他,敢怒不敢言。有些问题处理有偏差,得罪了一些人。加之,他平时生活方式比较讲究,运动中许多人就贴大字报,主攻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形成了声势和气氛,引起中央重视,中监委派出调查组进行调查。

恰巧此时,农业展览馆突然发生馆长腐化堕落叛逃的严重事件,轰动全国,惊动中南海。而那位馆长又受过部长器重,还曾把展览馆展览后的农副产品送给廖鲁言。种种事情联在一起,廖鲁言有口难辩,难辞其咎。毛主席极为震怒,严厉批评他是“死官僚主义”。

当年9月,党中央决定廖鲁言带职下放河北石家庄,兼任地委书记。昔日在政治舞台上有过辉煌历史的耀眼明星,从此逐渐离开中央决策圈。

但他工作一如既往,从不马虎。他认为,阶级斗争并没有严重到改变农村颜色的地步。农村出现贫富差别,也并非敌对势力破坏,而是有些政策不当,工作未做好。因此,他领导“四清”运动时,反复强调运动中发现的问题,并非全是敌我矛盾和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不要把基层干部看成一团漆黑,犯“四不清”错误是有的,但不是所有干部都犯了错误。基层干部基本上是好的,不能一脚踢开。他甚至说“前几年农村干部贪污几百元,几百斤粮食,不要硬往资本主义道路上拉。前几年基层干部打了人,不要再纠缠不放。因为前几年基层干部打人是由于上边造成的,上边有责任。”

1966年4月,石家庄“四清”工作总团汇报“四清”后,有的地方反攻倒算,搞复辟活动。廖鲁言严肃指出:“不要到处都说是复辟,挨了整,不讲话,也难说,都算复辟也不行。”他强调:“运动不能放松生产;‘四清’要落实到生产上。”“一个劳动日一两毛钱,不如老母鸡下个蛋,社员感到工分没有味道,劳动就不积极。”他要求:“通过分配,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鼓足干劲,把明年的生产搞好。”

当时,社会上“左”倾思潮严重,不少人认为社员卖一点酱油、盐、醋是资本主义活动。他明确说:“他卖酱油、盐、醋,赚不了多少钱,生活比一般农民富不了多少。大部分村又没有供销社,买酱油、盐、醋,还得跑好几里地,不方便。他送货上门,群众还是需要的,不要看成是资本主义倾向。”有人反映社员开理发店,雇学徒是剥削行为。廖鲁言则分析说:“理发工具、肥皂、烧煤

等,都是开理发店用的吧!人家有成本,学徒交一些钱是合理的,要算算账,不要动不动就看成是剥削。”这些观点,当然是正确和实事求是的,但在那个大批资本主义的疯狂年代,则属于异端邪说和修正主义理论,后来就成了他举白旗、反红旗、反毛泽东思想的一大罪状。

不久,“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席卷全国。1966年国庆节上午,他刚从天安门城楼观礼下来,农业部的红卫兵就紧急出动,打着“造反有理”和“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旗号,把他揪回部机关大楼挂上牌子,开始批斗。他是经过铁窗烈火、战火风云和历次政治运动考验的坚强战士,当然坚决抗争。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1967年3月,林彪“四人帮”又掀起“揪叛徒”的狂风恶浪。顿时,廖鲁言升级为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叛徒集团”的黑干将,罪名是“结成死党,狼狈为奸,进行反党、反毛主席的罪恶活动”。面对强暴,他毫不畏惧,坦然回答:“让我交代反毛主席的罪行,定我为叛徒,我不承认!我是拥护毛主席的,从内心里拥护,不是表面,是真的!我不知道关于我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名是怎么定的,中央对我的历史很清楚。”

在那个疯狂年代,抗争的结果必然是轮番抄家、武斗加身。最后,竟被“四人帮”投入秦城监狱严加审讯,时年54岁。他在狱中历经诬陷、磨难,受尽诽谤、凌辱。此时,多年的糖尿病日益加重,得不到治疗,处境悲惨。1971年春,原农业部留守处干部到秦城监狱,给他送衣服、粮票、家信。他手捧衣物凄然流泪说:“你们还想着我,给我送东西来,谢谢你们了!”声音低沉、凄凉,令人同情、寒心。

第二年11月廖鲁言离开了人间,年仅59岁。监狱按专案组规定通知农林部办理某某编号案犯后事(农业部已撤销,新组建农林部),不说姓名。部机关行政组奉命匆匆赶到秦城监狱,只见遗体身材高大魁梧,掀开遮布一看,发现是廖鲁言,不禁大吃一惊。但当时“四人帮”横行,他们不敢声张,只好运回城里会同家人悄悄处理。

1976年,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终于被粉碎,举国欢腾,万民同庆。1978年底,党中央作出决定,为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廖鲁言等领导干部彻底平反昭雪。不久,又为廖鲁言举行了隆重追悼大会,悼念他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从此,廖鲁言屈辱、蒙冤多年的灵魂,在九泉之下终于得到了最后的宽慰和安宁。

(责任编辑 致 中)

我跟校党委书记拍桌子

● 张系朗

1982年3月,我的老师——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钱谷融先生来泰安讲学。作为他的学生,我设家宴相请。席间,钱先生笑着对我说:“1957年反右时,你作为一名学生,居然敢跟党委书记常溪萍拍桌子,好不简单啊!”

我为什么会跟党委书记拍桌子?拍桌子的举动又给我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这得从我的出身、经历讲起。

我是一个穷孩子出身,12岁才得到读初小一年级的机会,而小学未毕业,就失学、失业了。对我来说,前途是一片迷茫和黑暗。然而平地一声春雷,淮海大战的炮火解放了我的家乡——安徽萧县。1949年4月,我考进了人民政府创办的我县第一所中学——梅村中学。因家贫,享受甲等助学金,即不用交一分钱,即可在学生食堂就餐。我的命运发生的这一巨大变化,使我本能地、衷心地热爱和拥护共产党。

从此,党说什么,号召什么,我就听什么,信什么,做什么。所以进步很快。4月份进校,6月份入党。从1949年9月份起,连续五年担任全校学生会主席。其间,还担任过学校党委总支委员、学生党支部书记、学校团总支副书记职务。1954年8月,考进华东师大中文系,当然也一直是学生当中的主要骨干。1957年整风反右初期,我担任系党总支委员和本年级三、四、五班的党支部书记(一、二班另建支部)。这年的4月间,系总支告诉我:“不久要召开全校党员代表大会,改选党委。党委已经拟定,要把你选为党委候补委员。因此,在选举前,你要更好地工作,更加谨慎。”总之,在那时,党组织对我是非常信任和关怀的。可以说我简直成了党的“骄子”,我对党更是怀有一颗赤子之心。但一场反右斗争的暴风雨,却使

我从“骄子”一下子变成了“支持右派向党进攻”的罪人!事情是这样的:

1957年4月底(或5月初),党委书记常溪萍同志在全校学生党员干部会议上,传达上级有关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并要求我们学生干部号召同学们大胆鸣放,帮助党整风。他并说:“群众提的意见,即使只有百分之零点五的正确,我们也欢迎。”我参加会议回来,忠实地贯彻了常书记的指示,号召三、四、五班的同学积极鸣放。同学们出于对党的信任和热爱,积极鸣放了。果然贴出了许多大字报,提出了不少意见和问题,大家的心情都很舒畅。但进入6月份之后,气氛突然变化了,学校党委指示各个学生党支部,要开会对全体同学进行摸底排队,划出右派分子,并说右派分子同党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性质的矛盾。这突如其来的大变化,使我的头脑一下子蒙了,思想上怎么也转不过这个弯子来:刚刚是号召人家鸣放、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怎么一下子又要把人家当成敌人呢?我们这样做,将来如果再向人家发出什么号召,人家怎么会再相信、再响应呢?基于这种朴素的想法,在我主持召开的支部委员会会议上,当有的支委提出一些同学是右派分子的主张时,我毫不犹豫地进行了反驳,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由于支部一班人的意见不一致,右派划不出来,反右斗争当然也就无法顺利展开。系总支多次找我谈话,批评我,教育我,我不服。最后,党委书记常溪萍同志亲自找我谈话。应该说,平时他对我是比较了解的,也是比较关心和重视的,准备把我选为党委候补委员一事,就是很好的证明。所以,谈话之初,他的态度是很平静的,也是很诚恳的,完全是出于对我的关心和爱护。到此时为止,如果我的脑子能“灵活”一点,接受他的教育和帮



1957年国庆游行队伍

助,放弃自己的看法,就决不会发生后来的事情。但当时,我不仅是一个20多岁的青年,血气方刚,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而且怀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共产党员“无话不可对党言”,共产党员绝不能向党隐瞒自己的观点,向党隐瞒自己的观点,就是对党的不忠,是可耻的。基于这种信念,我没有接受他的教育和帮助,而是理直气壮地坚持了自己的看法,仍然不同意把那些同学划为右派分子。渐渐地,常书记的态度开始变化了,严肃起来了。他明确地批评我这是严重的右倾思想,我则说他是“左倾”。到后来,我甚至当面质问他:“不是你让我们学生干部号召同学们鸣放吗?不是你说,群众提的意见,即使只有百分之零点五正确,我们也欢迎吗?实际上,同学们提的意见,大多都是正确的,现在又要把人家划成右派,这像什么话?我张不开这个嘴!”我这些话,使得常书记大怒了,也许他过去很少被别人这样当面质问过,顶撞过,所以他气得狠狠地拍了桌子;我也在气头上,又是“初生的牛犊”,所以不甘示弱,也拍起了桌子。最后,他气愤地把我赶出了他的办公室。

事后,为了能够顺利地开展反右斗争,党委决定把我这小小的绊脚石踢开,撤掉了我的党支部书记职务(总支委员未撤),并委派学校团委书记顶替我担任三、四、五班的党支部书记。这样,右派分子很快划出来了。于是很多同学成了“人民的敌人”,受到批判和斗争,如三班的秦效琼、四班的王学畅、五班的陈若珂……其中,陈若珂被定为“极右”,先是下放农

村劳改,后被发配到新疆伊犁。

反右斗争结束后,师大党委监察委员会给我作出的正式结论是:“在反右斗争中,犯有‘严重右倾,放弃党支部领导’和‘支持右派向党进攻’的严重错误;为此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的处分”。(可能是考虑到我出身好,一贯

表现好”,否则,结论和处分可能要重得多。)

从此,我只有挨批和检讨的份儿了。但有一点,即我反对把王学畅同学划为右派这一“错误”,我在思想上始终没有搞通,因而也从来没有作过真正触及灵魂的检讨。这一点,要从“肃反运动”说起。

1955年秋季“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在华东师大的学生当中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当时,我是一个刚进入大学一年多的青年学生,政治上十分幼稚,脑子里根本没有什么政策观念。运动开展起来之后,我既未向党总支和学校党委汇报,更没有得到他们的批准,仅仅根据个别同学的“揭发材料”,就自作主张地把王学畅同学作为“胡风分子”,一连几个下午,公开进行大会批斗。一天,我正在主持批斗大会,党委派出的检查各系运动进展情况的检查组让我去汇报批斗王学畅的根据。他们听了我的汇报后,明确地告诉我:“这些不是胡风言论,王学畅不是胡风分子,你必须马上停止对他的批斗。”但由于他们急于要去别处检查,没有来得及交待我如何做好善后工作,就急急忙忙地走了。我当然要按照检查组的意见办事:停止批斗。回到会场,我宣布:“散会”,就此了事。至于把人家批斗错了,我连一个字也未说。我这样做,从表面上来说,似乎仅仅是出于我的幼稚无知,不懂政策;但实质上是因为,当时我作为整人者,根本没有去设身处地为被整者着想,根本体会不到被整者的处境和痛苦!到1957年鸣放期间,一天晚上,在党委小礼堂,常溪萍书记主持了一个“学

生鸣放会”，让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学生党员干部去“听会”。在这次鸣放会上，王学畅同学“鸣放”了。他给我留足了面子，根本没有点出我的名字，但我却知道他批评的就是我。他痛哭流涕地诉说了他在肃反运动中的遭遇。他说：“把我当成胡风分子进行大会批斗，后来明知批斗错了，但却一直当作没有发生这件事，弄得我一年多来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心里十分痛苦。试问这是什么作风？”听了王学畅同学的发言，我的灵魂受到了很大的震动，深深地认识到自己当年实在太荒唐，给人家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而自己却长期“不知不觉”，实在对不起人家。我当时真想马上发言，表示接受王学畅同学的批评，并公开向他赔礼道歉。可是，当时我的任务只是“听会”，当然无权去这样做。但会后，我却在私下里向几位同学吐露了我上述的感受和心声。不料，当我被撤销了党支部书记职务、受到批判之后，有的同学却把我在私下里吐露的心声反映给了党组织。于是，王学畅固然以“攻击肃反，向党进攻”的“罪名”而被定为右派，我在私下里说出的那些话，则成了我“支持右派向党进攻”的三大罪状之一！（其实，当时王学畅同学根本就不知道我有上述的心声和言论）对此，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人家明明是被错误地批斗了，怎么就不可以提出批评意见呢？我只不过是一个基层的学生党支部副书记，人家仅仅是不点名地批评了我个人确实有过的错误，既未涉及全校，更未涉及全国的肃反运动，怎么就成了“攻击肃反，向党进攻”了呢？我明明严重地伤害了人家，本应公开向人家赔礼道歉，我只不过在私下里向别人而非向他本人表示了接受他的批评的意向，怎么就成了“支持右派向党进攻”了呢？这岂不是说我支持他向“我自己进攻”吗？”对诸如此类的众多的问题一直想不通，我如何能够作出真正触及灵魂的检讨呢？

1955年秋季，本应公开向王学畅同学检讨和赔礼道歉，但当时因我的“幼稚无知”而未去做。1957年整风反右时，我认识到应该这样去做，却又不允许我去做。改革开放了，我也退休了，我内心的歉疚之情日甚一日。于是，在我得知王学畅同学现在的通信地址——浙江省瑞安师范学校之后，情不自禁地在1999年11月间，给他去了一封长信，诚心诚意地向他道歉，检讨我1955年的过失，请求他的宽恕和批评。我在信中并说：“如果不是我在1955年错误地批斗了您，您在1957年就不会‘鸣放’，因而也就不会

被打成右派。因此可以说，您之所以被打成右派，并因此而招致了长期的灾难，我实在是‘始作俑者’。”2000年的正月初三，王学畅同学给我写来了满满四张纸的长信，信中不仅称我“学兄”，而且说：“来信充溢歉疚之情、诚挚之情，十分感激”；“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我所受的灾难，也不会责怪您为‘始作俑者’”……读了这封信，我泪如泉涌！这并不是因为我被宽恕之后灵魂得到了解脱，而是被学畅同学那大海一样宽广的胸怀深深地感动了！以后，我们又几次通信，畅叙衷情。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融化了神州大地上覆盖着的极左思潮的冰层，我们年级三、四、五班当年被打成右派的同学，全部得到了改正。因此，加在我身上的“严重右倾，放弃党支部领导”和“支持右派向党进攻”的罪名，当然也就无法成立了。于是，在1979年的4月6日，华东师大党委给我作出了平反的决定。改正和平反虽然来得迟了，但总还是令人欣慰的。

最后，关于常溪萍书记，我还想说几句。当年他虽然斥责了我，处分了我，并因此影响了我一生的前程；但是，说句心里话，我至今仍然对他很尊敬。他衣着简朴，工作勤恳，平易近人，经常深入到学生宿舍，与同学们促膝谈心，到运动场与同学们一起打球，他每周都要到学生餐厅一次，以便了解和改善同学们的伙食情况……可以说，在他身上，的确可以看到我们党的许多优良传统和作风，他不愧为我们党的一位非常优秀的、忠诚的高级干部。但一位干部越是对党忠诚，在党的政治思想路线发生严重错误的时候，他做的错事也就会越多、越大。在1957年，他忠诚地执行了那条极左路线，把一大批风华正茂的青年学生打成了右派分子（全校有多少，我至今不得而知。仅中文系我们一个年级，就达23人之多），这不仅给这些同学造成了长期的苦难，有的甚至家破人亡，而且也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无法弥补的损失。不幸的是，十年之后，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本人却遭到了那同一条极左路线的迫害，被造反派作为“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进行残酷的折磨和摧残，最后竟从高楼上摔下来，悲惨地离开了人世！（至于他是怎样从高楼上摔下来的？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至今也仍然是一团迷雾）他的结局无疑是一种悲剧。

（责任编辑 吴 思）

随毛泽东进京赶考的日子

● 杨志新

1949年3月25日这一天,是我们中央警卫团跟随毛主席、党中央进北平的日子,是我们从最后一个农村根据地——河北平山西柏坡进入大城市的日子,是我们从长期战争环境转入相对和平稳定环境的日子。

那天,春光灿烂,人人心中充满着胜利的喜悦和美好的向往。临行之时,毛主席意味深长地和随行人员说:“我们要进京‘赶考’去。”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也叮嘱大家,要好好学习,争取考好才是。

当时,在毛主席身边担负警卫工作的中央警卫团团团长刘辉山和战士们听了毛主席这句既通俗、又深奥的话,并不十分理解,但也顾不上多问。一路上想着,议论着。到了北平,部队的大部分兵力随毛主席等中央领导进驻北平西郊的香山。

根据中央的指示,中央警卫团除了在新的情况下完成保卫中央安全的任务外,还要学习政治、城市政策、文化知识。重点是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文件,深入领会毛主席关于“进京赶考”的指示精神。

其实,在进京之前,部队就开始学习了。由于这支部队担任直接保卫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会场的任务,近水楼台,等于旁听了会议。中央委员们在会内学习,我们团的干部、战士在会外学习讨论。进京的路上,大家也在议论。进驻北平香山以后,有了正式文件,就进一步深入地、有计划地学习了。学习情绪非常高涨,有时为一个词、一句话争论得面红耳赤。

一天,毛主席出来散步,走到警卫一连(当时也叫手枪连)驻地,听到大家正在讨论。连长何有兴见主席来了,忙迎了出来。主席称赞说:“你们的学习很热烈呀!”何连长说:“热烈是很热烈,

就是文件太深,有些领会不了。讨论题也太多,抓不住中心。现在学习有点深入不下去了。”毛主席接着又问:“同志们都有哪些想法,说说看。”何连长心里正有些事弄不明白,想找个机会向主席请教,这下机会来了。于是他就把大家讨论的情况连同自己的想法,大概地和主席说了一通。他说:“学习二中全会文件,进北京,对这件大事,大家的看法、想法很多,也很不一致。有人说:‘我们这支部队,是战无不胜的军队。三大战役我们打胜了,国民党几百万大军被我们打败了,现在又进了北平,全国胜利就在眼前,再没有什么困难能难倒我们。今后不论是拿枪的敌人,还是不拿枪的敌人,都不在话下。至于今后搞建设,舍得出力就行。’还有的说:‘革命胜利了,今后天下太平,万事大吉,该享清福了!’也有个别人认为:‘我们打天下,坐天下,老子天下第一。’还有的战士想回家,他们说:‘革命胜利了,今后该回家种地了。’还有许多问题弄不懂,例如,二万五千里长征走过来了,也进了北平,为什么还说万里长征才走完了第一步呢?”

毛主席微笑着,边听边点头,听了何有兴的这番如实汇报后说:“那么,我给你们出一道讨论题,就是,我们是共产党进北京,还是李自成进北京呢?你们把这一道题讨论好就可以了。”

何有兴连长如获至宝,高兴地敬了个礼,告别主席回到连里。很快地,团领导得知何有兴领回一道主席给出的讨论题,便决定下达至全团学习讨论。因为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作报告时,曾经生动地引用过李自成进北京的故事,大家都熟知。于是,讨论很快引向深入。大家在会上讨论,会下也讨论,甚至吃饭时也在争论。有的说:“李自成进了北京,以为革命成功,天下太平,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完全松懈了斗志。结果很快被

吴三桂引清兵打败。”有的说：“李自成进北京，以为革命有功，应当坐享其成。三天一节，五天一年，贪图享乐，腐化堕落，只坐了48天的皇帝，就把天下丢了。我们共产党人要牢记毛主席提出的‘两个务必’，永远保持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不被糖衣裹着的炮弹打倒。”大家认识到，现在面前是一片新天地，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好好学习，争取答好共产党人进北平这张考试卷。

通过这次学习和这场讨论，部队觉悟有了很大提高。首先，从政治上、思想上适应了伟大的历史转变。在以后长期的岁月里，在毛主席等中央首长的关怀、教育和熏陶感染下，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和良好的作风。我刚到中央警卫团时，当文化教员。一天早晨，在香山下出早操，领着一营同志们唱歌。见到毛主席走过来。这时候，虽然已经进北平半年多了，他老人家仍然穿着补补丁的衣服。我们刚参军的小青年都比主席穿的好。毛主席艰苦朴素的作风，使我们深受感动，给我们树立了贯彻“两个务必”的榜样。

部队进京之初，有的住老乡房子，有的住在庙里。老乡一致反映，部队秋毫无犯。住在老乡房子里的同志，看到院子里枣树上的枣子、桑树上的桑椹熟了，落了满地，战士们谁都不肯吃一个。老乡外出把家门钥匙交给战士保管或干脆不锁门。战士们把落在地上的枣、桑椹拾起放在篮子里，等房东回来全部交还。刚进京时我们部分战士担任接管任务，有一个敌伪仓库，遍地是新的皮鞋，战士们认真地给收拾起来，整理好，放进库里贴上封条，自己脚上仍旧穿着由于长途行军已经磨破，露出脚指头的旧鞋；有的长了冻疮，谁都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由西柏坡迁到北平，毛泽东与前来欢迎的民主人士在西苑机场合影。左起：陆志伟、沈钧儒、朱德、董必武、李济深、陈其璠、郭沫若、黄炎培、毛泽东、林伯渠、马叙伦

不肯换一双新鞋。

以后，这些同志在学文化、学知识、学理论和军事技术等方面，都如同攻敌人碉堡一样，非常刻苦，十分感人。毛主席看到这些，很高兴。

进京后，中央警卫团办了一张8开小报，叫《士兵报》，毛主席亲自给题写报头。那时每期报纸都给毛主席等中央首长各一份。毛主席有时还作批语，甚至给修改病句。主席还叮嘱部队要好好学文化，他说：“仗打完了，全国胜利了，今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地方要搞经济建设，部队要搞正规化建设，没有文化不行。”毛主席的谆谆教导对部队鼓舞极大。

1951年以后，部队随中央进入北京城内，进驻中南海。就是后来编号为8341的这支神秘部队。随着岁月的变迁，这个团的干部、战士陆续走向了不同的工作岗位，有的在部队当了将军，有的到地方当了市长，有的在经济建设岗位上当了模范，有更多的同志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地作贡献。也有极个别的没有经得住历史的考验，落榜了。

遥想当年，毛主席要我们进京赶考，给我们提出的历史命题，已经55年了。但毛主席的教诲仍时时响彻耳边，似乎那场进京的争论仍在继续，那场考试也还在进行。（责任编辑 吴 思）

韩国华侨的今昔

● 詹小洪

韩华有过的辉煌

发轫期 1882—1927年)

韩国华侨称自己为韩华。韩国何时开始有华侨难于考证。1882年清政府派吴长庆将军率大队清军援助朝鲜政府,有部分商人随军行动办军需,应是华侨大批进入朝鲜半岛的嚆矢。是年,朝鲜政府与清政府签订《朝清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华侨得以名正言顺在汉城、平壤、仁川、大邱、光州等大城市经商。1887年,清政府任命吴将军随员袁世凯任“总理朝鲜商务”,袁干练精明,恪尽职守。在他的统领下,华侨商务迎来第一个繁盛时期。韩华们提供了朝鲜国民绝大部分的日用品。他们还在当地开矿务农,从山东引进种菜技术来朝鲜。朝鲜官民给来自强邻的客人很高的礼遇,称他们为“大国人”或“清商”。朝鲜的华侨95%是山东人。到1906年,在朝鲜半岛共有华侨3600多人,1916年有18000人,从事商业的占一半以上,韩华们凭着重信用善经营,克勤克俭,势力渐趋扩大,几乎垄断了朝鲜半岛的商权,1922年,华侨人数为24000余人,当时朝鲜全国纳税大户全是华商。1910年朝鲜成了日本殖民地后,日本商人一直视在朝鲜的华商为眼中钉,1927年发生了排华的“万宝山事件”,使华侨财产损失80%以上,继之“九一八”事变,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华侨在朝鲜地位更是一落千丈。

鼎盛期 1946—1950年)

1945年日本投降,由于多年战乱,加之韩国幅员小,资源贫乏,当时全国消费品奇缺,华商利用与香港、上海、烟台、青岛、天津、大连、安东等地原有商业往来关系,积极为朝鲜人民提供商品。据《朝鲜年鉴》,1946年,韩国进口商品82%

来自中国。当时华商创立大型贸易公司13家,他们经营的进出口业务占韩国全国进口总量的21%,出口总量的16%。1948年韩国有华侨人数八万多人。笔者近年在韩国光州讲学,一次到仁川旅游,曾听一个侨领津津乐道当年的韩华盛况。他说,在四十年代末,韩国的华商就像东南亚其他国家华侨一样,也几乎掌握所在国的经济命脉。记得一个侨领的爷爷去世时,前来送葬的当地高官政要巨贾络绎不绝,出殡的队伍长达几条街,仁川主要大街挂满挽幛,白花四处飘零。那时在韩国各大城市、沿海口岸,凡大街上西装革履的士绅皆为中国人。

境况不佳的韩华

世界上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唐人街,五千多万华侨,在他们的各居住国,都不同程度有较大发展,华侨凭着自己的勤劳节俭,在各地均创下了灿烂的业绩。在东南亚多个国家,有富可敌国的华商。在美国、加拿大有华人做过国会议员,有大学校长是华人。做律师、大学教授的更是不可胜数。然而唯独在韩国没有唐人街,近半个世纪,韩华们既没有他们的先辈曾有过的荣耀,也没有像其他国家华侨那样的事业发达。上流社会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他们在韩国仍属弱势阶层。韩华们每说到此,就对中韩建交前的历届军政府外侨政策痛恨不已。

1945年日本战败,结束了在朝鲜的殖民统治。朝鲜半岛光复,但很快以三八线为界分为南北两韩。1949年中国内战结束,国共两党隔台湾海峡分治。中朝两国相同的分裂命运也给中韩贸易带来了相应的停顿。紧随而来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既给南北朝鲜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

难,同时也毁灭了华侨们数十年辛苦经营积攒起来的家业,华侨经济遭受了自“万宝山事件”后的第二次打击。战后,韩国相继执政的李承晚“第二共和国”和朴正熙的“第三共和国”和后来的全斗焕、卢泰愚政府无一例外实行了排斥外侨的保护主义政策,给华侨带来深重的灾难。简单地

说有:

华侨难以得到永久居留权。韩国政府很少给外国人永久居留权,出入境管理法上只分“居留者”和“非居留者”。“居留者”到期可申请延长三年,但不保证每次都继续给予延期。到期不办延期手续会处以极重罚金。韩国再入国制度僵硬,几乎不近情理。华人离境,必须要在限期内回来,不然逾期就不准再入境。60年代有个华人老太太到台湾探望读书的儿子。回程前,突患盲肠炎动手术,出院后,发现离再入境期限只有两三天,她持医院证明到韩国驻台湾使馆陈情,要求放宽在台湾多呆几天,待治愈返回,都得不到批准。

韩华们入韩国籍难上难。韩华绝少有从事诸如律师、教授、公务员等职业的。连以前四五十年代韩华们轻车熟路的外贸业华侨也领不到营业执照。因为这些职业要有韩国国籍才行。而韩国法律规定,外国人归化入籍必须要有相当财产或高等学历,还得有政府高官推荐,而这对一般华侨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诸种原因致使华侨子弟在韩国就业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开中餐馆似乎成了近几十年韩华们唯一的选择,50年代,全韩有4000多家“中华料理”店。韩国华侨大多仍以开小餐馆为业,卖炸酱面。韩国甚至有人戏称韩华为“炸酱面”,这真是个辛酸的名词。我们中国来韩国光州任教大学老师们聚会多在中餐馆,价格绝对打半折,老板说,只要收回成本就行。韩华们另一个热门行业是中医药业。他们自己称汉医,韩国人则认为是韩民族本身的医药事业,称这是相异于西医的“韩医”。在1994年,全韩有华侨经营的汉医院174家,药房38家。

限制华侨积累财产。韩国政府上世纪70年代曾颁布《外国人土地管理法》,规定外国人不能同时拥有两处房屋,自住房面积不得超过200坪(每坪合3.3平方米),店铺经营面积不得超过50坪。主要是限制他们财产的扩张和不动产投

资。当时很多富裕华商不得已将自己财产请韩国人注册登记,谓之“寄名”,有点类似改革初期中国一些名为集体实为私营的“红帽子”企业。由于法律风险极大,最后财产被当地人侵吞不计其数,韩华吃哑巴亏,打掉牙齿往肚里吞。限制外国人置产创业的政策直到金大中总统执政时才有较大改变。

华侨与韩国人同工不同酬。我认识一个从祖国大陆拿到博士学位的女性韩华,现在汉城几所大学作时间讲师,还兼一家公司的汉语翻译,每周四个下午有课,二个晚上作翻译,收入一月不过一百五六十万韩元。比同等资历的韩国同事少多了,可她不敢去找校方或雇用她的老板论理,她的父母告诉她要“忍”,因为你是中国人,这是人家的国家。韩国的华侨忍了二三辈子了。与我同校同系的一个华侨W教授,60年代末毕业于台湾大学,现在收入也比同资历的韩国教授少三分之一还多。

看到在韩国难以有前途,在七八十年代,韩华兴起了移民潮,主要是移往美国。据统计,从1970年起至1992年中韩建交前,共有近二万人离开韩国,其中80%去了美国。去了美国的仍称自己为“韩华”。所以到1992年,在韩国的华侨只有两万多人。应该说明的是,选择离开的大多是资金雄厚、经营能力强的华侨。近些年,强烈的“韩华”声音往往不是由居韩国的“韩华”而是由移往美国的“韩华”们发出来的。

韩华的政治取向

韩国的华侨对台海两岸的态度经历过一个变化过程。韩国与西方属同一意识形态,过去承认台湾,与大陆没有邦交关系。加之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屡屡政治动乱,经济凋零,韩华觉得身为中国人,在国外抬不起头来。因而对大陆没有太多的好感。现在韩国的华侨多是第二代和第三代华人,绝大多数持的还是“中华民国”的护照。四十岁以上的高学历韩华都是在台湾上的大学,据统计从50年代以来有一万多人在台湾的大学毕业。应该说,从政治上精神上,他们对台湾的认同感更强。按他们的话说:“过去,我们是坚决反共的,对中共没有归心,也不抱好感的,但从心理上又

无法摆脱对故国的感情。”随着国际上承认中国大陆的越来越多,台湾在国际社会越形孤立,说话没有分量。更直接的是,俗话说“弱国无外交”,所谓的“中华民国”并无力保护韩华们的权益,改变不了他们在韩国屈辱的命运。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国力大大增强,1992年中韩建交后,两国经贸关系飞速发展,韩华们感受到了韩国政府及国民对他们态度的改变。导致韩华们政治上弃台湾趋大陆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李登辉、陈水扁相继执政后的台湾当局“台独”倾向愈益明显化、公开化,韩华们失去了对台湾的向心力。他们是铁了心的促统派,在维护祖国统一问题上,与大陆同胞是高度一致的。下面举中韩建交时,韩华们为捍卫“祖产”(祖国或祖宗)——中国大使馆馆舍发生的动人的故事为例,来说明韩华的爱国心迹。

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坐落在汉城市中心黄金地段明洞二街。是清政府置下的财产,其间历经晚清、袁世凯政府、北洋政府、民国政府还有台湾当局,几番改旗易帜,先后都将使馆设于此处,保留至今。韩华视斯土为“祖先的财产、是祖宗积下的基业”,是“中华历史之延伸、龙种之荣耀、族魂之象征”。中韩建交前夕,台湾当局怕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手中,想以4.6亿美元的价格卖掉馆舍。风闻此消息的韩华无不义愤填膺,无论是在韩国本地的韩华还是美国的韩华侨社纷纷发起了“护馆保产”运动。韩华的立场是:坚决反对台湾当局变卖使馆,对使馆土地不以政治立场视之,乃以中华民族广义角度视之,视该产是中国领土一部分,永为中国所有。有斯土就有韩华,无斯土就无韩华。他们同时致电给台海两岸政府或当局,并向全球的华人表达了上述态度。国内《人民日报》的海外版曾发表文章肯定了韩华此爱国之举。最后,无论是按照国际法还是当时形势,在处理馆产问题上,韩国政府都不敢得罪中国政府,台湾当局也不敢得罪韩国华侨,从而致使他们的“败家子行动”阴谋最终破产。韩华们做了一件上对得起中华民族,下对得起列祖列宗的大事。

韩华们近些日子关心的是两岸的局势,由衷地为两岸和平祈祷,可以说100%希望泛蓝军胜出这次台湾选举。他们认为,五十多年前国、共联

手打跑了日本人,如果当时兄弟携手建国就不会有今日台独分子的叫嚣。大陆人、台湾人都是自己的同胞,共产党、国民党也都是自家人,他们之间的党争也只是兄弟打架,有什么问题不好协商解决。如果蒋家父子大度一点,早点与大陆接触,哪会有今天台湾可能分裂出去的危险。如果中国这一百多年都是像近二十多年一样专心搞经济,中国人地位不知比现在高多少。我们华侨真的希望别再兄弟相残了,外国人尤其是我们的近邻等着看我们的笑话呢,他们包藏着祸心,表面表示中国稳定好,其实无不抱着幸灾乐祸的心理看待台海局势。听了这些韩华们发自肺腑的话,我深有感慨,也许离家的路越远,爱国心越重,只有中国人(无论他身处世界哪个角落)才盼中国好。

我同事华侨W教授曾深有感慨地说:“我们华侨尤其是台湾来的华侨简直是‘弃儿’,韩国说我们是中国人,中国则认为我们出生在韩国,应是韩国人。还又总被人问是大陆人还是台湾人。身份上找不到认同感。真是生的不亲,养的不爱。可我们认为自己是道道地地的中国人,龙的传人,血管里流的是炎黄子孙的血。我们在家里都教孩子认方块字说中国话,但无语言环境,难以吸收继承中国文化。我们这些年近花甲的华侨很少有加入韩国籍的。我们打心里盼望中国强大。无论是大陆人还是台湾人,都是中国人,我们都视他为亲人。”说着说着,就老泪纵横。每当我们对他的帮助表示谢意时,他就颇为生气,说我们太把他当外人看了。我告诉他,国内经济学界对海外华侨的贡献评价甚高。有篇文章曾分析比较过中国与前苏联改革成败原因,认为如舍去其他因素,中国海外5000万华侨对国内的支持——直接投资,是中国改革所以成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听了我的介绍,W觉得挺宽慰。

愿韩华悲情不再

1992年8月24日中韩建交。十多年来,两国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突飞猛进。现在中国已经成为韩国最大的经济伙伴国:1992年两国贸易额不足50亿美元,2003年,达500多亿,扩大了十倍。2003年,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77%投往中国大陆,中国是他们的最大的投资对象国。对韩国经

济来说,离开了中国这个生死攸关的市场,后果难以设想。正应了那句“形势比人强”的话,韩国上下格外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各方面的关系。包括大大改善了对韩华的态度。归化入籍、就业、置产等多年来令韩华们痛心疾首的一系列问题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松动。有些城市首长甚至找韩华侨领袖们商量兴建唐人街问题。我听到韩华们发出肺腑的话:“祖国与华侨唇齿相依,息息相关。”我

觉得这些老一辈的华侨对中华民族、祖国的认同感非常强,而这些华侨对二十多年来国内的改革开放是打心里拥护的,我就听到不止一人说过:“是邓小平让我们华侨硬气起来的。”

我要由衷地祝福他们:韩华同胞,25年的改革已经使我们的祖国空前强大,你们可以理所当然地挺胸抬头,愿悲情不再伴随你们!

(责任编辑 赵友慈)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 价	邮 费
历史转折的前奏	程中原 夏杏珍	38.00	6.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2.00	5.00
人民公社兴亡录	宋海庆	36.00	6.00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	邓 野	29.80	5.00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	吴 思	23.80	5.00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 煌	28.80	5.00
斯大林(上中下册)	德安沃尔科戈诺夫	78.00	8.00
动荡岁月秘闻	温乐群等	72.00	9.00
扛起地狱的闸门	丁 群	21.00	5.00
张闻天年谱	张培森	65.00	8.00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郭玫瑰 黄玉章	68.00	8.00
第二次宣言	王小平	28.00	5.00
知情者眼中的周扬	徐庆全	24.00	5.00
文坛拨乱反正实录	徐庆全	24.00	5.00
再生中国——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	李 艳 熊志勇	44.80	7.00
叶剑英在非常时期	范 硕	36.00	6.00
断桅扬帆——蒙冤 25 年的公安局长	丁兆甲	26.00	5.00
特别审判——林彪、江青			
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	图 们 肖思科	28.00	5.00
李锐其人	宋晓梦	28.00	5.00
25 年——1978—2002 中国大陆			
四分之一世纪巨变的民间观察	王 安	26.80	5.00
我向总理说实话	李昌平	23.00	5.00
白色花劫——“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大纪实	林 希	25.00	5.00
中国人物年鉴 2003	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	168.00	7.00
蒋介石评说古今人物	戎向东	29.80	5.00
十年来影响中国经济决策的论点	张国华	28.00	5.00

代购代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历史转折的前奏》在“文革”十年内乱中,1975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作为从大乱走向大治的努力,作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尝试。作为历史转折的前奏,作为邓小平理论的孕育,1975年整顿的历史,值得浓墨重彩、大书特书

作者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和富有激情的文笔叙述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有许多史料是首次披露,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史料价值和艺术感染力。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年~1946年间,国共两党关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争论,是两种对立的国家政体的争论,是争取一个怎么样的抗战结果的争论,因而也是国共两党政治对立全部历史关系的最高表现形态。本书对这一长达两年的政争的发生、发展和终结,进行了全程的跟踪考察,集中论述了国共两党是如何由政争走向战争的。

《文坛拨乱反正实录》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80代初期,拨乱反正的决策揭开了回春的历程。被称为“政治的晴雨表”的文学艺术界,其从复苏趋向繁荣的历程,不仅与当时的政治气候相伴随,并推进着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作者披露了意识形态领域重大事件的内幕,及新时期文坛从队伍建设到方针调整等诸方面的来龙去脉。作者致力于收藏未曾刊布的文坛名家书札和档案材料,及对诸多文坛老前辈的采访,因而使本书材料鲜为人知、丰富可信。

《扛起地狱的闸门》第二条战线的英雄们,他们与第一条战线上人民解放军英雄一起,怀着对真理、对理想、对光明未来的真诚追求,以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谱写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壮丽诗篇,他们托起地狱的闸门、帮助万千受难者逃出地狱,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为此牺牲了宝贵的生命。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许世友将军逸事

● 李 波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南京军区某军专事新闻摄影,有幸数次跟随许世友司令员下部队视察和采访,耳闻目睹了许将军不少趣闻轶事,并拍摄了一些照片。在我案头上,这几张尘封38年的老照片,述说了将军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许世友将军1903年出生于河南新县一个贫苦农民家里。1926年就参加党领导的武装起义。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戎马一生,从战士、班长、排长、营长、团长、师长……一步步地从枪林弹雨中冲杀过来。红军期间,他五次参加敢死队,当了营长和团长后还参加敢死队。他八次负伤,其中两次是当了军长以后挂的彩。他身经百战,在战场厮杀中,仅乘骑的战马,被敌军打死、打伤的就有几十匹,真是一生沙场,一生

风尘。

将军穿草鞋走过了他的人生路

许世友一辈子穿草鞋,参加革命一直到老年。解放后,要说草鞋的变化,只不过在草中再加棉纱或布条,打成“布”草鞋。许世友穿草鞋不仅在夏天,而是每年从四五月,一直穿到十一二月。

一次,许世友一行在经过某团“红六连”炊事班时,正看到炊事班的战士们在和面蒸馒头。他便跨门而入。一个年纪很轻的战士,上下打量这位不速之客。可能这个新战士,一则还不认识他们的司令员,二则看到他这般模样:大热的天,军容整齐,风纪严密,脚上却穿着一双草鞋的老兵,似有大惑不解之意。许将军看出这位战士的心思,笑着说:“你们看过红军、八路军的电影么?你们看我像不像那里面的一个老兵?”他用手指了指自己身上的军装和草鞋说:“那时候我们穿的是灰布军装,布没有现在的好,可脚上穿的就像这样的草鞋。可别小看这草鞋,好处多着哩!不要选号码,轻巧,透气,还没有脚汗臭。穿破了一甩了事。再找几把草,一袋烟工夫就能打双新的。”

有关“老兵”穿草鞋下连当兵的故事,在这个军的“临汾旅”更是传为美谈。那是60年代初期,这个部队在远离军营的山区进行军事训练。一天,许世友戴着列兵军衔,扛着背包,到某团一个连当兵。起初,连队的战士们只看到他整天军容整齐,脚上却穿着一双布草鞋,与战士同吃、同住、同训练,却不知道他就是威震敌胆的许世友司令员。后来战士们与他闹熟了,知道他不仅枪打得好,武功也特别棒,都想跟他学一手。每当这时,许世友总是笑而不示,说:“那都是基本功,你们现在摸爬滚打,也是



许世友(正中)与南京军区某部军师干部交谈

基本功。要练成真功夫，可并非一日之寒。”凡知根知底者，都对将军的话深信不疑。

幼年的许世友，由于家贫，八岁就到少林寺当了一名杂役。也就在这个“拳禅一体”的少林寺，他得到修身练武的机会。论气功，他能飞檐走壁；论武功，能倒拔杨柳。到十六岁离开少林寺时，不仅刀、枪、剑、戟、叉，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而且臂力过人，大小红拳、罗汉拳、炮拳、梅花拳等也深得精要。他五步起跳可上城墙，丈余高的房子跳上去，屋无声，瓦不碎。

由于他艺高胆大，又是位传奇式的将军，所以，许世友这个“老兵”走到哪里，战士们也就跟到哪儿。为此，他也收了不多少“徒弟”，不仅手把手地教他们学会打草鞋，而且还教了他们几路拳术，使这个部队在很长时间内，官兵们穿草鞋，练功习武成为风气，成为时尚。笔者也是那时跟将军学了少许套路，现在还时常杂耍几下。

这天在炊事班里重提草鞋，许世友更是津津乐道。他问战士们穿过草鞋没有，自己会不会打？见战士们笑而不答时，他说：“你们不会打，办个学习班，叫你们团长、连长都参加，我来当教练，欢迎不欢迎？”说完，他自己也忍俊不禁地哈哈大笑。他这一笑，把这些原本拘泥的战士们也个个逗乐了。

司令员赶麻雀的故事

1965年金秋十月，是个收获的季节。

一天下午，许世友一行由南京乘坐军用吉普车，来到安徽境内某部汪波荡军垦农场。下车后，他们沿着农场的土路，走向一望无际的水稻田。这时，成群结队的麻雀在头顶上唧唧喳喳，从这块稻田飞到那块稻田，毫无顾忌地啄这啄那。许世友时而俯身摸摸稻穗，或摘一二粒放到嘴里嚼嚼，时而抬起头，望着不远处的麻雀和插在稻田里随风摇曳的稻草人。

突然，他拿过警卫秘书的马步枪，对着一群麻雀，“砰、砰”地开了几枪。枪响之后，麻雀纷纷飞去，但过了不大一会儿，它们又聚拢而来，仍安然自得地在稻棵上、稻草人上跳来蹦去。

来农场之前，根据后勤部门的统计报告，每年这个季节里，仅水稻每个连队被鸟雀吃掉和糟蹋的就达上千斤。一个农场就要上万斤。全军区大小几十个农场，其损失便可想而知了。

下午五时许，农场营以上干部会议，在场部门前

空地上召开。会上，他形象地说：“凡事都要心中有数。心中无数者，就像炊事员做饭炒菜不放米和盐一样，结果是清汤寡水，淡而无味。对待鸟虫之害，也要像打仗一样，要摸清情况，知己知彼。”最后，他提出，要保住稻谷不遭损失，就要设法把麻雀赶走！放枪不行，扎稻草人也不行，各连队可以把锣鼓家伙用起来，叫站岗放哨的战士在田边敲锣打鼓，来个声势浩大、威震“敌”胆的人民战争！

会后，农场各连队立即采用此法，从早到晚，锣鼓喧天，彼此呼应，对麻雀实行疲劳战、持久战，不让一个麻雀有落脚之地、落脚之时。不几天，麻雀又饥又累，都纷纷飞到别处去了。当年水稻收成也大大高于往年。此后，我们在报道这个农场丰收喜讯时，着重介绍了这一做法，并在军区各农场推而广之。

“我许世友倒不倒，要由毛主席发话”

1966年秋，一代虎将许世友也处在危难之中。即使如此，许将军仍心系军队，想到部队的训练和生产，想到官兵们的安危冷暖。

一天午饭后，许世友乘坐吉普车，从隐身住地，渡江北上，驶上浦镇北城圩某部视察。闻讯而来的军师首长们，见到被“炮轰”而东躲西藏欠违了的司令员，个个心情激动，倍感亲切。他们相互搀扶着，在坎坷不平的田间小路上，指指点点，谈笑风生。那亲密无间的情景，令人非常感动。我也不失时机地按动着快门，拍下了不少动人的瞬间。

一次，当我站在他的面前，拍摄他的特写镜头时，将军可能听见相机快门的响声，笑着对我说：“怎么又是你这个小鬼？不要再拍了，说不定我还是个黑帮分子哩！”此话一出，顿时惊住了军师首长们。许世友语调平静地说：“我许世友倒不倒，要由毛主席发话！”数月后，周恩来总理在接待江苏省暨南京市造反派代表时，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讲话（即《1·28讲话》），严厉批评说：“许世友打仗这样勇敢的人，都被你们撵得‘钻’了山洞，这是毁我长城啊！”难怪在此后不久，毛泽东主席召见许世友时，他“跪拜”毛主席，一诉衷肠。

悠悠岁月，弹指三十余年，将军早已作古。但他的传奇人生，和那些凡人轶事所体现的品格，却常令官兵们缅怀。

（责任编辑 吴 思）

吕后玉玺与江青

● 王兆麟

在西安城南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展厅里,陈列着一方通体晶莹润泽的玉印,它高 2.8 厘米,重 33 克,印上部为螭虎纽,虎形呈伏卧状,头尾微向左边蜷曲,怒目张口,造型生动。玉印四周有线雕云纹,印面为正方形,边长各 2.8 厘米,上面阴刻“皇后之玺”四个篆字,经考证印的主人是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吕雉。专家认为这方玉印的发现创造了两项全国之最:一是我国最早发现的皇后印玺;二是玉玺的主人是年代最早的皇后。故历史、艺术价值很高,被列为国家级文物。

“皇后之玺”问世于文革前期,出土地点在陕西咸阳汉高祖陵园的一条地沟边,它是被一个小学生在放学途中偶然发现的。

陕西是周、秦、汉、唐等 13 个王朝建都千余年之地,埋藏地下的文物遗存难以计数。据长期在咸阳从事文物工作的学者张德臣、张延峰介绍,事情发生在 1968 年 9 月的一天傍晚。咸阳市区东北 30 多公里的韩家湾公社韩家湾小学的 14 岁学生孔忠良放学回家,他沿着渭惠渠边的路走到狼家沟,无意中看见渠南边的土坎上有个东西在夕阳斜照下闪闪发光,开始他以为是只躲在草丛中的小兔子在偷看他,就好奇地走近一看,却什么也没有发现,只是那亮光仍在闪烁。于是他放下书包,用手刨挖起来,终于发现有个东西的一角露了出来,由于土质疏松,他很快便把这东西刨了出来。他擦去上面的泥土,原来是一块光亮的玉石,玉石的上部趴着一个动物,下面四四方方的,好像刻着字,可是他一个字也认不出来,于是把它带回了家。到家后便把玉石给哥哥看,两人研究半天,觉得可能是颗印章,准备把上面的字磨掉,刻上自己的名字留着玩。可是这

玉石特别坚硬,上面的字怎么也磨不掉。过了几天他们的父亲孔祥发要到西安给生产队办事,孔忠良就把印章拿出来让父亲带到西安,找家刻字铺把印上的字磨平后刻上自己的名字。孔祥发向小儿子仔细问明印章的来由,端详着印章的造型、质地、文字,尽管他也认不出是什么字,但总觉得这东西非寻常之物,他想到印章出土之地在刘邦陵园之内,自己在担任大队干部期间,同到这里来的文物工作者打过多次交道,有一些文物知识,再联系到这一带常有人挖出古代陶盆、瓦罐、瓦当、麻钱之类的古物,意识到这颗印章可能是文物。

第二天他到西安后,先没有办其它的事,而是直接找到省博物馆,请他们对玉玺鉴定。博物馆的人一看印章上的动物造型和印面上的“皇后之玺”四个篆字,当即认定它是珍贵文物,在详细介绍了出土地点和发现经过后,孔祥发表示愿意将这方玉印上交博物馆收藏,博物馆给予了奖励。

陕西省博物馆的有关专家进行了研究、鉴定,结合出土地点,查阅了许多古代文献。据《汉官旧仪》上记载:“皇后玉玺,文与帝同。皇后之玺,金螭虎纽。”而韩家湾发现的“皇后之玺”在吕后与刘邦合葬的封土之西约一公里的陵园之内,其形制、式样、印文内容及字数均与《汉官旧仪》所载相符,当为吕后之印玺无疑了。有些专家还认为,它可能原来是放置在吕后墓旁的便殿中供祭祀之物,后来便殿被毁,玉玺遗落土中,被水冲到狼家沟,遭泥沙覆盖而致湮没二千余年至今。

吕雉(公元前 241—前 180 年)是山东单父

县人,其父吕文,后来一家迁居江苏沛县,吕父和沛县县令是好朋友,吕文看中了沛县泗水亭长刘邦,将女儿吕雉许配给刘邦为妻。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时,发生战争,刘邦出征在外,吕雉留在家乡,项羽把刘邦父亲和吕雉俘虏,成了人质。公元前203年,楚汉停战谈判,以鸿沟划界,刘邦父亲与吕雉被释放。后来刘邦战胜项羽,即大汉皇帝之位,封吕雉为皇后,史称“吕后”。吕后出身贫寒,但颇有才干,为人果断刚毅。在刘邦讨伐陈豨叛乱时,吕后与丞相萧何密谋斩韩信于钟室,继而除掉了一些实力强大、功高震主的功臣,稳定了汉初的政局。

吕雉生一男一女,男名刘盈,被立为太子。女儿嫁宣平侯张敖为妻。刘邦后来认为刘盈生性软弱,天资平常,打算改立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为太子,因吕后不满和朝臣的劝阻,未能实现。刘邦死后,刘盈即皇帝位,因年幼由吕后掌权。吕后掌权后,将戚夫人断其手足,剜眼薰耳,饮以哑药,扔在厕中迫害惨死,又将其子如意缢死被中,刘盈吓得害了一场大病,从此不问朝政,很快去世。吕后独揽朝廷大权后,将吕姓亲属四人封王,六人封侯,以巩固吕氏家族的统治。

吕后所作所为引起朝廷大臣不满,两大势力展开斗争。公元前180年,吕后病死,以周勃、王陵为首的汉室元勋抓住机会,一举诛灭了吕氏集团,拥立刘恒为帝,即汉文帝。由此,吕后的女皇梦破灭,结束了政治动荡时期,汉代进入了“文景之治”的昌平阶段。

由上可知,这方皇后玉玺的主人吕雉,在汉初的政治斗争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并一度掌握了国家最高权力,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凶残专横、篡权窃国的阴谋家、野心家。可是江青却对此人十分欣赏,妄想有朝一日步吕雉的后尘,登基当女皇。她大肆吹捧吕后也了不起。她对汉高祖刘邦的事业起了很大作用。”借以比喻自己。

据学者党军调查,1974年“四人帮”发动批林批孔,批儒评法,为其篡党夺权大造舆论,此时江青野心膨胀,做女皇梦正酣。她听说前些年发现的“皇后之玺”是吕雉之物,欣喜若狂,连忙追问玉玺的下落,快拿来给她看看。当她得知吕后玉玺收藏在陕西省

博物馆时,便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当时正在西安出差的一位中国女领导,要她速将此玉玺找到带回北京。这位领导干部不敢怠慢,立即到陕西省博物馆找来负责人传达江青的话,要他找出玉玺,馆负责人当即领她到“秦汉文物陈列室”看实物,当她看到文物标签上并未标明是吕后之物时,有些不解,陪同的有关专家解释,对此方玉玺学术界尚有不同意见,因此未明确标注。这位领导同志说:“那江青同志说是的,那就是的嘛!”随后命陕西省博物馆派人将玉玺护送去京,江青见之如获至宝,迟迟不还,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这方“皇后之玺”才得完璧归赵返还陕西省博物馆收藏。

早在1973年6月20日,周恩来总理陪同外宾参观设在碑林的陕西省博物馆时,对陕西省负责同志说:“陕西文物很多,展室窄小,在适当时候,新建一个博物馆。”1991年6月20日,一座国家级的大型现代化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在大雁塔西北不远处建成开放,原陕西省博物馆收藏的文物移交新馆(原馆址改为碑林博物馆),这方历经沧桑曲折的国宝,从此在这座被誉为“左都明珠,华夏宝库”的艺术殿堂中正式陈列,公开展出。(责任编辑 方 徨)



吕雉“皇后之玺”印文

梁启超的读书生涯

● 张维绅

人们都说,梁启超是我国近现代史上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我却要说,如从性格本色来看,梁启超首先是个“书生”,而从“书生”的本分“读书”来看,他又是千千万万个“书生”中的佼佼者!

梁启超(1873—1929年)的读书轨迹是曲折而丰富的。他迈入读书园地的第一步是为科举考试而读书。读书的目的是“金榜题名”,仕宦闻达。在这段从四五岁到十七岁的读书时期内,不论读的内容还是方式,都是由家长和塾师决定的。他只是按照长辈和塾师的指点,记诵苦读而已。据史料记载,在这段时期里,他最先熟读的是《四书》、《五经》、《史记》、《汉书》、《纲鉴易知录》、《古文辞类纂》和唐诗、八股文。十二岁考中秀才后,开始学到训诂、词章之学并对它们产生了兴趣。尤其是读到张之洞所著《轩轩语》和《书目答问》之后,眼界大开,开始知道“天地间除帖括外还有所谓学问者”,因而萌生厌弃科考念头。但由于强大的习惯势力的影响和家庭长辈的督责,他还不可能完全背离这条追求个人功名利禄的读书道路。他只能压抑着个人的兴趣爱好,继续沿着这条路艰难迈步,直到十七岁考中举人。梁启超这段读书生涯除了取得“秀才”和“举人”的称号外,实际意义在于熟读了中国文化中的一些基本典籍,对中国的经、史、子、集有了一个轮廓了解,从而为一生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待进入广州学海堂正式学到在当时被视为“显学”的训诂、词章之后,他已经进入了中国旧学中的殿堂。

1890(18岁)是梁启超读书生涯发生根本性转折的一年。这一年他拜康有为为师,进入了康有为的万木草堂求学。在这里,他不仅读到了

万木草堂大量藏书,更在康有为的指导下,用全新的观点,研读了中国典籍,了解了西方的种种学说和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情况,对中国历代的沿革得失、兴亡盛衰的原因及救治方略,都有了深刻了解和明确主张。加之康有为的“志于道、依于仁、据于德、游于艺”的教育思想熏陶,他确立了“经营天下”大志,决心用维新变法来挽救危在旦夕的国势,使祖国走上独立富强的康庄大道。

这一时期的读书是到1894年结束的。梁氏这一时期的读书,由于得到了明师指点,所读所获更加广博、更加深入、更加全面、更加系统;他的知识结构也更趋合理、更趋进步、更趋实用。这为他踏入社会,登上政坛奠定了稳固而广博的基础。从这个角度说,这一阶段的读书,无疑是他一生事业的关键。

自1895年至1912年(23至40岁)是梁启超步入社会后的第一个读书时期。这个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它们以1895年9月戊戌变法为界。政变前,梁启超用其所学,协助其师康有为策划、组织、领导“公车上书”,积极参与变法活动。梁氏在这段辉煌岁月里,以其十余年读书所获,发表了《变法通议》等著作,鼓吹变法维新,在社会激起了强烈反响。他也像一颗灿烂明星,辉煌于中华领空,为千百万人所识、所知、所仰望。梁氏这一阶段的读书,是紧紧围绕维新变法进行的。这时的梁氏已经把读书视作变法斗争的手段和武器,自觉地运用读书为变法斗争服务。从他这一时期的许多著作可以看出,他阅读最多的是“西书”,即西方的译著。例如在他1896年编撰的《西学书目表》中共搜罗到325种西书,他读过的即达252种,余下的只是些当时并不急需的

医学、工政和兵制著作。这些阅读,对他的变法维新的宣传,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寓居日本后,梁启超为血腥的政变所震撼,他沉痛地回忆着变法的前前后后,思考、分析着变法失败的原因,寻觅着进一步斗争的策略。当时他认为,要想取得变法的最后胜利,必须开发民智,走“新民”的道路。因此他创办了《新民丛报》,提出了“新民”学说。而为了实现“新民”理想,他大读“西书”和“东书”(日本人著作),并将读书所感、所悟、所得向国人作广泛介绍。根据记载,梁启超这一时期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大量文章,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一些国家如英、德、法、俄、日致富致强的原因,包括变法的经验、教训,以及他们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建设。二是一些国家如波兰、越南、朝鲜等国固步自封、因循守旧而衰亡的原因。三是歌赞一些保卫、建设祖国和革命斗争中的豪杰与英雄,如意大利的罗兰夫人、英国的克林威尔等。四是对西方和日本的主要社会学说、哲学思想及其代表人物的推介。如孟德斯鸠、卢梭、霍布士、斯宾诺莎、培根、笛卡儿、康德等这些评述介绍,都是他广读“西书”、“东书”的结果。可以这样说,“新民”说的产生和提出,就是梁启超在他通过读书获得的广博知识基础上,博览“西书”和“东书”并加以融汇的结果。

自1913年至1929年(41岁至57岁)是梁启超步入社会后的第二个读书时期。这一时期也可分为两个阶段,而以1920年游历欧洲归来为界。梁启超是在民国建立的第二年即1912年归国的。归国后,他希图通过“贤人政治”,实现“改良国家”的理想。因此先后出任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财政总长,还组织过政党,担任过进步党主席。当袁世凯恢复帝制时,他不顾身家性命的危险,和蔡锷等策划、组织了反袁斗争。张勋复辟时,他又参加了反复辟斗争。这一阶段的梁启超,可以说日理万机、席不暇暖,但他仍见缝插针地读书不停。他的这时期读书基本是围绕所担任的职务和工作来进行的。如研读许多有关宪法、法律、货币、财政、税法等方面的中外著述与文献,并写出了许多相关专著和专文。

1920年,48岁的梁启超由于目睹了欧洲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和弊端,对中华传统文化重新

燃起了希望。又由于“贤人政治”理念被军阀争权夺势、互相残杀的残酷现实所粉碎,他对政治完全失去了信心,决定息影政坛,全力从事教育事业,用传授中华传统文化来培养年轻一代,以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由1920年开始到1929年去世,是他整个读书生涯的最后阶段。在这一阶段,他的读书是基本围绕着整理、发扬中华传统文化进行的。根据他的著述可知,这时期他的读书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1、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的学术思想史;2、佛学、佛典;3、文学艺术;4、读书、治学、做人;5、教育。根据这些阅读,他为人们撰写了一大批永垂史册、泽被后世的著作,如《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墨经校释》、《老子哲学》、《儒家哲学》、《中国佛教史》(未完)、《大乘起信论考证》、《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治国学的两条大路》、《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作文教学法》等。就是这些著作,把梁氏推上了杰出的学术大师宝座,永远受到人们的崇敬和敬仰。

梁启超的一生,是在紧张的读书中度过的。读书一面给他以精神的满足,一面又激起他更强烈的读书欲求。就在这种不断的精神满足——追求更大的精神满足中,他的知识不断的积聚、更新、创造着,他的为人也在人生台阶上不断攀登,不断地被塑造着、改变着。综其一生可以看到,读书先使梁启超掌握了帖括之学,成了秀才和举人;读书又使他学得了训诂、词章以及康有为的“新学”,使他站到了当时中国学术的最前沿,成了立志经营天下的变法志士和维新运动的领袖;读书还使他登上文坛,创造了一种明白晓畅、笔锋饱带感情因而耸动一世、风靡海内外的“新文体”,将当时的西方思想、学术介绍给了国人,撕破了笼罩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封建思想的罗网,他自己则成了中国思想界的陈涉和文坛盟主;又是读书,使他成了学术大师和年青一代的导师。因此我们说,梁启超是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但他首先是“书生”,是“书生”中的佼佼者。

(责任编辑 吴思)

缠放足的波澜

● 刘志琴

20世纪初年的辛亥革命,在中国是惊天动地之举,这不仅表现在自古以来的封建专制王朝从此被推翻,成就了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而且是席卷全社会的大浪潮,包括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心理、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这是影响社会各阶层的全方位的大变动。

这变动对老百姓来说,影响至深至广的是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变化,如果说,政治革命的成功不久即遭失败,但在扫除积弊、移风易俗方面,却造福后世。

在一百多年前,男子脑后拖着辫子,女的缠小脚,是最有损中国人形象的两大陋俗。前者是满族强加给汉民族的装饰,在中国有200多年的历史;后者却是汉民族压迫女性,畸形审美的产物,沿袭近千年,如果以20年为一代来计算,在中国已传沿四五十代之久。

缠足给妇女带来身心扭曲的痛苦,在世界上也属罕有。从记载所见,这缠足是用5尺长2寸宽的布条,紧紧地缠在女童的足上,把足背及4指下屈,压至足心,被缠者痛得汗如雨下,甚至鲜血淋漓。亲自动手的往往是母亲,缠一层,还要抹一些唾沫以便防滑收紧,不管女儿如何哀哀痛哭,做母亲的毫不怜惜,说是“娇女不娇足”。长大后双足因肌肉挤压,指甲软化,嵌入肌肉,肌骨变形成弓状,腿部不能正常发育,瘦削如棍。脚长以三寸为佳,因此称为“三寸金莲”、“弯弓”,所谓“小脚一双,眼泪一缸”,真切地反映了女性缠足被摧残的痛苦。这种违反人性的陋俗,并非没有人抨击,早在宋代车若水就指出,妇女自幼“无罪无辜,而使之受无限之苦,缠得小来,不使何用?”清初张宗法痛斥缠足之害说:“今俗尚缠

足,堪伤天地之本元,自害人生之德流,而后世不福不寿,皆因先天有戕。”著名诗人袁枚痛斥这是男子的主使:“三寸弓鞋自古无,观音大士亦双趺。不知裹足从何起?起自人间贱丈夫。”真是一针见血。

关于缠足的由来,说法不一,不论是起自南北朝说,始于隋炀帝说,还是五代南唐说,从有缠足以来,就不断有人谴责这一残害妇女的陋习,如果说在19世纪末以前还属个别有识之见的话,到清末已形社会性的舆论,凡此揭露性的文章,是篇篇血泪。

要知道缠足并非是华夏的古风,更不是满人的风俗。清朝以马上得天下,满族妇女都崇尚大脚,清初几度禁止缠足,抗旨者,其父或夫要受杖刑和流放,然而这些法令抗不过习惯势力,又不得不弛禁,从此缠足风愈来愈炽。

为什么历代文人的抨击,清初的严刑峻法,对此都无可奈何?男尊女卑的社会机制,视女性为玩物的男权思想,依附男性的女子心理和畸形的审美观,都助长了这一恶习的流布。

自古以来虽然不乏有为女性痛苦呐喊的有识者,但更多的文人雅士,却对女子缠足,赞誉有加,不惜为文揄扬《采菲录》、《莲吟》、《韵语》、《香莲艳唱》、《竹枝词》等长篇短论,充满了鼓惑人心的词句:什么“世俗所称折腿腕”,最为灵妙耐人看。“第一娇娃,金莲最佳,看凤头一对堪夸。新荷脱瓣、月生芽,尖瘦帮柔绣满花。”“尖如角黍俏如菱,肤似羊脂白玉凝,最爱绣床新睡起,横担膝上束吴綾。”“足美尤将履样妍,底分厚薄口尖圆,但期秀称须纤瘦,晨夕休忘紧紧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有的还专门就此

进行研究,用“尖、瘦、弯、小、正、软、香”,所谓五字诀、七字诀,把女人的足分为超品、上品、中品、下品、劣品等五等十八式。这些作者并以莲痴、惜红生、莲意等笔名,表示对小脚的醉心和迷恋。骚人墨客甚至用女人的小脚鞋盛酒痛饮,以为风雅。

这种审美观也影响了女性以小脚取悦男性,在清末时兴的选美活动就是选小脚。山西大同有“亮脚会”,每年农历六月初六妇女坐在家门口,伸出小脚来供来往行人观赏品评,比赛谁脚最小,绣鞋最精致。男子挑选配偶也以脚小作为重要条件,有的歌谣说:“看我腿,是好腿,红绸裤子绿穗穗,看我

脚,是好脚,梅花高底菜碟搁。”在河南也有类似的小脚会:“盖元旦至初五,此数日间,凡大家小户妇女,无不艳装坐于门外,将双足露出,任人往观,评定甲乙。”这缠足之风除了少数民族和广东、岭南等地的劳动妇女以外,遍及全国各地。

作为社会的恶习并不限于缠足,诸如吸毒、赌博等都损害社会的治安与健康,但这毕竟是部分人的行为,也容易被唾弃,唯有这缠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甚至嗜痂成癖,有的男子走火入魔,也仿效女子缠了足,这不能不是社会病态的怪现象。

缠足危害之大,不仅损害了二亿女子,近全国一半人口的健康,也不利于子孙后代的发育成长。上亿的女子由于腿足不便,被幽禁在家庭之内,难以走出家门,不可能使自身获得解放。使中国人蒙羞的“东亚病夫”,社会的积贫积弱,莫不与缠足有关。而国人对此种陋习的麻木不仁使人触目惊心。有人记载说在湖北天门县有一打花鼓女子,从俄国沿铁路步行到西欧卖艺,卖纸花兼卖小脚,给钱就任人观赏,把这种有辱人格、国格



清末裹着小脚的少女

的行为视为生意经。传说李鸿章出使俄国,参观盲哑学校,盲诗人爱罗先珂私下摸李的脚,以为中国的男性也是小脚,种种在国内外流为笑谈的恶习,严重地挫伤了民族的自尊。这危害国民体质,民族心理健康的缠足陋习,可谓20世纪初年的公害之尤,要求变革的仁人志士,莫不对这恶极无量的丑行,拍案而起,口诛笔伐。

在移风易俗运动中,以放足发动最早。清初的旋禁旋弛说明,改良习俗如果没有社会变革的支持,就事论事,免不了要被旧习惯势力所吞没。到清末,维新变革已蔚为思潮,反对裹足又得以避开满汉的民族矛盾,因而受到当

政者的支持。光绪三十年颁布《劝行放足歌》的诏书,其中的歌词琅琅上口:“照得女子缠足,最为中华恶俗。”惟当缠足之时,任其日夜号哭。对面置若罔闻。女亦甘受其酷!为之推原其故,不过扭于世俗。”然而,面对这已流传近千年的旧习,即便有了最高当政者的指令,也遭遇陈腐观念的顽强抵制。你说这缠足是女子的痛苦,“小脚一双,眼泪一缸”,却有人说:“在小脚盛行的时代,裹脚的时候,果欲痛泪直流,待到双脚裹小以后,博得人人瞩目,个个回头,在家时父母面上有光辉,出嫁后翁姑容上多喜色,尤其十二分快意的,便是博得丈夫深怜密爱。……哭在前,笑在后,哭是暂时的,笑是永久的,所以‘小脚一双,眼泪一缸’,这两句话,未必是事实。‘大脚一双,眼泪一缸’倒是常有的事。”这明白宣告博得男性欢心和投合习俗的偏好,是反对放足的重要缘由。

这一放一缠之争,主要是如何对待习已为常的习俗,而习俗的改变,不仅需要新的观念和当政者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要有带头人以实际行动

作出示范效应,还要有相应的社会团体对民众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使之深入到家家户户,这在报刊上进行学理上的论辩,更为复杂和艰难。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康有为在家乡成立“不缠足会”,身体力行,首先给自己女儿放足。为了解除女子放足、出嫁困难的顾虑,天足会还规定,入会者若有女儿放足嫁不出去,可在会内联姻。在上海召集大会,发布公开信,呼吁有识之士动员妻女放足。蔡元培公开征婚,以放足作为第一条件,以一名翰林之身作出这样勇敢的抉择,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之举。在这些先进分子的带动下,短短几年,不缠足的社团组织遍布上海、湖南、广东、福建、湖北等各大城市。

然而风俗的变化并不那么简单,这是沉潜在民族心理深处的烙印,经过一代又一代的积淀,已成为民族难以磨灭的记忆,在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更不能期望受到男性宠爱的小脚会一朝绝迹。早在19世纪末苏州成立不缠足会进行劝导时,弄得“舌敝唇焦”,20世纪初绥远的天足劝导员“游说期年,听者藐藐”,任其用强制的办法“当街令妇女脱去鞋袜”检查,或者进行罚款,自愿响应者也不多。有的认为女人裹足是天经地义的事,赞美小脚是中华文化的“巧思”,对放足极尽攻击之能事,说:“女人裹足是天经,贫富何尝判渭泾,雪色足缠红色履,鲜明紧洁俏无形。”事事惟将欧美夸,便从扎脚鄙中华,富强只是弹高调,女足何能系国家。”

20世纪初,反缠足宣传非常火热,各种报刊连篇累牍地刊载有关文章《天足会报》、《天足日报》、《天足公平报》等专刊联翩发行。戒缠足的歌谣、弹词、小说、漫画广为传布。有的还采用民众喜闻乐见的说唱形式普及到街头巷尾,主要的宣传要点是:

其一、加大力度口诛笔伐这种摧筋折骨的陋习。《大公报》一创刊即发表《戒缠足说》,拟出缠足的三大害处:一伤身体,二行动不便,三于生育受害不浅。从古今中外、天理人情方面说明这一恶俗之害。《宁波白话报》模仿十送郎调的民歌填上《缠足叹》的歌词,吟唱道:“金莲小,最苦恼,从小那苦起受苦到老,未曾开步身先袅。不作孽,不作恶,暗暗里一世上脚镣。”《苏州白话报》还发起读者自行传播:“百人传千,千人传

万,普中国的小女子,一朝提出苦海。大家、大家,快些、快些,功德无量。”

其二、以放足增强女性的自强和爱国意识。在民间传唱的一首歌说:“休缠足,缠足岂争妍,闺阁本来天赋,质女郎亦有自由权,何苦乞人怜。”文明足儿顶呱呱,细能绣花粗能打杂,妈儿啥!女娃赛过男娃。”在女性中最有盛名的《妇女杂志》呼吁国人要以“助生理之发育,洒国民之耻辱”的精神,“使全国妇女未缠者全其真,已缠者弛其缚”,号召女性“痛自猛省,革千年之毒,复本来之天。”一些民间团体开办各种讲座,1904年12月10日的《成都日报》刊有成都福音堂的广告:“讲天理脚之道,请众人来听。”英国教堂在成立天足会时,邀请留日学生黄英演说:“听者数百人,妇女亦百数,皆大感动。”

其三、对天足实行奖励,以实际行动冲破习惯势力的阻挠。有些地方官员给放足者发放纪念章,以资鼓励。地方官龚某赴乡镇检阅团练,“传见不缠足之女孩,奖给银牌数百”,并题“坤维向化”四字。新繁县令余某夫人在该县召开第2次天足会时,“亲身到会演说,并捐资制造银牌徽章二百,凡未经缠足者给予徽章一面,饰诸袖上,以示表彰而资鼓励。”《时事新报·图画新闻》载文说:“湖南抚院为破除缠足之害,必须当道者躬行表率,嗣后无论绅宦妇女,一律改作圆头薄底靴,俾民间得资楷模。”有首《放脚乐》到处传唱:“放脚乐,乐如何?请君听我放脚歌。棉花塞脚缝,走路要平过。醋酸同水洗,裹脚勿要多。七日剪一尺,一月细工夫。夜也赤脚睡,血脉如调和。放了一只脚,就勿怕风波。放脚乐,乐如何?请君同唱放脚歌。”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为扫除积弊,更新气象,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条件。1911年10月19日,辛亥起义成功后的第9天,湖北军政府



缠足妇女的小脚

即发布妇女放足的通告。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立即于1912年3月13日发布命令:“恶习流传,历千百岁,害家凶国,莫此为甚。……当此除旧布新之际,此等恶俗,尤宜先事革除,以培国本。为此令仰该部,速行通飭各省,一体劝禁,其有故违禁令者,予其家属以相当之罚,切切此令。”

各地政府纷纷呼应,常州光复后刚刚创刊的《新民日报》,第一版即敦促人民剪辫子,废除缠足,改变服饰,严禁鸦片。四川境内所办的女学,规定入学者必须天足。各地报刊争相刊载颂扬放足的文章,凡有民众聚会的场所,如书社、茶园、读报社、讲演堂,都配合进行宣传,宣传天足的文章还选进小学教科书,一批民众喜闻乐见的歌谣、说唱、戏剧,活跃在舞台上,使放足为荣做到家喻户晓。

放足运动到民国时期首先在大城市得到普及,在上海还成为新的时尚《海上竹枝词》就有这样的诗句:“学界开通到女流,金丝眼镜自由头。皮鞋黑袜天然足,笑彼金莲最可羞。”泰山东岳庙供奉的娘娘,泥塑金身,三寸金莲,朝拜者多用自制的大脚锦鞋,换去娘娘的小脚鞋,以娘娘实行放足,普告钳制之妇女。”连菩萨都放了足,可见放足已经深入人心。在沿海和一些大都市,天足女郎、天足女孩成为时髦女性的美称,风行一时。

民国初年之所以能取得这样大的成效,是历经维新、新政、革命运动坚持不懈地除旧布新,广泛传播文明生活观念的结果,推行得力的主要是在开埠较早的大城市,可在内地像湖北缠足者还有相当数量。在广大的农村和边远地带,缠足者更多。云南民政厅在1934年对全省的视察报告说:“有全县皆缠的,有全县皆不缠的,也有境内部分区域缠而部分不缠的。”一省尚且如此,全国的发展更多反复,有的地方缠缠放放,一波三折,断断续续,长达一个世纪之久。

仍以云南为例,当局早在1913年就规定15岁以下的妇女不准缠足,已缠的要立即放足,嗣后又规定6个月的劝导期,进展并不大,直到30年代初昆明县汉族妇女缠足的仍占80%,省政府又提出《禁绝妇女缠足办法》22条,通令各县城的民政厅、教育厅和民众团体通力合作,对25岁

以下的缠足妇女,实行强制性放足,遇有知情不报的要给以处罚。这一年嵩明县向省民政厅呈报情况说:“积习相沿已数千年,实有积重难返、弊深难革之势。以故政府曾三令五申,而一般人民仍置若罔闻、视若无睹。革除之难,可概见矣。”云南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少数民族妇女并无缠足的习惯,居住在山地的汉族妇女由于在山路行走的不便,也很少缠足,为什么在这样的地区放足又这样困难呢?传之久远的陈风旧习固然是一原因,传统的华夷之辨也起了重要作用。在民族杂居的地方素来讲究夷夏之分,小脚为汉族的崇尚,有些地方的汉人“娶媳妇时要先问是否小脚,如果是大脚,便以为是猥猥之流。”或被视为下等人,致使有些少数民族的居民为了表示与汉族并无二致,特意效法汉人,让妇女缠足,这无异宣扬了以缠足为荣的心理,更加重了放足的阻力,由此可见陈旧的文化观念实为缠足陋习的主要支柱。

如果说云南是一特例的话,山西缠足的反复在内地就很有代表性。山西省政府早在1916年就已实施严禁缠足的条例。各县都成立天足会,各级官员都为当然会员。1918年成立《全省学生不娶缠足妇女会》,规定会员未婚者不得娶缠足女子;已娶缠足者,一律放足;违约者罚以重金,家长为幼女缠足者罚金加重10倍。1919年又将禁止幼女缠足作为村规,经常鸣锣示众,沿街张贴布告,如此兴师动众,不可不谓雷厉风行,成效也不可不谓不大,如在大同,“二十以下之女子率皆力趋新潮,城外乡僻中容或有此十八世纪之美人,至城中则已如凤毛麟角,不可多得矣。”然而这只是在交通发达的城市,在那些偏僻的乡村又是另一种景象,城乡落差非常大。1933年缠足就有复苏的趋势,据当时《中央日报》的报道,山西省15岁以下的女孩缠足的还有32万2千余人,致使这恶习迟迟不能绝迹。直到20世纪90年代,一篇报告文学《中国最后的小脚部落》揭示,云南通海县的六一村,至今还生活着300多位缠足的老太太,她们大多经历缠缠放放,放放缠缠,有的1946年缠,1954年放;有的1943年缠,1950年放,1951年再缠,直到1958年才解缠。现今70岁的老人差不多到共和国成立前后才放足,称为“解放脚”。(责任编辑 吴思)

林则徐译报： 中国人办报的先声

● 郑连根

关于报刊在中国的发展,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米怜在马六甲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份近代中文杂志《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到1833年,英国传教士郭士立在广州创办了《东西洋考》,这才是第一份在中国境内出版的中文报刊。随后,不断有传教士在中国创办中文报刊。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报形成了一个小高潮。外国人在中国的办报活动对中国的新闻事业起到了刺激和示范的作用。通过借鉴传教士们的办报经验,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自己创办报纸,揭开了中国新闻事业的新篇章。不过,在外国人办报和中国人自己办报之间,有个过渡,这个过渡便是林则徐组织的译报活动。虽然林则徐对报纸还采用“情报”的眼光来看待,虽然他组织的译报并不发行,只供他本人和朋友做“内参”用,但它毕竟是中国人第一次和近代报刊这种新事物打交道。

外国人在中国创办报刊之时,中国人对办报活动是不屑一顾的。如此情形之下,林则徐便是中国重视近代报纸的第一人了。林则徐于1838年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前往广东禁烟,抵达广州后,他发现“沿海文武官员并不谙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林则徐《东西各洋越窳外船严刑惩办片》)于是,他一面“指点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四处探听,按日呈递”,一面派人搜集当时在澳门出版的主要外国报刊,然后选译员进行翻译,以了解敌情。对于组织译报活动,林则徐在给奕山的信中说:“澳门地方,华夷杂处,各国夷人所聚,闻见较多。尤须密派精干稳实之人,暗中坐探,则夷情虚实,自可先

得。又有夷人刊印之新闻纸,每七日一礼拜后,即行刷出。系将广东事传该国,并将该国事传至广东……近雇有翻译之人,辗转购得新闻纸,密为译出,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取准备之方,多由此出。”(林则徐《答奕山将军防御粤省六条》)因为林则徐组织译报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夷情”,所以,最初的译报内容便是当时政治、军事和中外贸易等方面的时事报道。随着对“夷情”认识的不断深入,翻译的内容也逐渐有所扩大。

林则徐组织译报活动所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选译员。“大清国”向无这方面的“人才储备”,广州海关的通事虽懂外文,但文化素养很差,不足以胜任翻译报刊的工作。但是,经过林则徐多方罗致,一个译报班子还是建立起来了。这个班子的主要成员有袁德辉、梁进德、亚林、亚孟等人。

袁德辉,原籍四川,曾在槟榔屿一所罗马天主教所办的学校里学习拉丁文。他的中、英文水平俱佳,是林则徐翻译班子的骨干成员。除了翻译英文书报外,他还常将林则徐的重要文稿译成英文,他还曾翻译过林则徐、邓廷桢、怡良三人致英国女皇的信。

梁进德,广东人,是中国第一个基督传教士梁发的儿子。他经常往返于马六甲、新加坡和澳门、广东之间,与英美人士有着广泛接触。他被认为是翻译班子中水平最高的人,因此很得林则徐的赏识。他的工作主要是将澳门出版的英文周报翻译成中文,再将其中的重要部分转给中央政府。

亚林,英文名为 William Botha 先后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和费城两地的教会学校读书,1825 年来到中国广州,1839 年被林则徐聘为译员。

亚孟,其父为中国人,其母为孟加拉人,曾在印度塞兰普尔的一所教会学校里学习,他的老师是著名的传教士卖西曼(Dr.Marshman)。他 1830 年来到广州,1839 年被林则徐聘为译员。

这样译员的翻译水平在当时无疑算很高的了,可林则徐对他们的工作并不是很满意。袁德辉翻译林则徐、邓廷桢、怡良三人致英国女王的信,林则徐很不放心,就请人再译成中文加以核对。对于从译报中选出的呈送道光皇帝的译稿,林则徐还要亲自动手修改润色。

林则徐译报活动所保存下来的成果就是《澳门新闻纸》和《澳门月报》两份译报稿汇编。《澳门新闻纸》有 6 册,译稿自 1839 年 7 月 23 日至 1940 年 11 月 7 日,所涉内容十分广泛,主要内容是外报有关禁烟、抗英的新闻报道和评论。这些译稿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忠实原文,无所顾忌。译稿中以相当辛辣的语言揭露了清廷官府的腐败无能,议论清军队不堪一击,对乾隆、道光皇帝也出言不恭。对林则徐本人,译稿中有称赞之词,也有严厉的责骂。如指责他失信背约,不自量力;所做之事,俱是性急、冒失及自傲”,说他所造成的灾害“已布满此省及近海之处”。

《澳门月报》在魏源的《海国图志》中署“林则徐译”,其实,译稿多散见于《澳门新闻纸》,可以推断它是根据《澳门新闻纸》中的材料加工整理而成,因要送呈道光皇帝御览,所以文字可能多由林则徐加工、润色,所以《澳门月报》的译稿要比《澳门新闻纸》文雅、简洁,但也有了避讳。例如《澳门新闻纸》中有这样一段译文——

……而中国永远如一,非是中国无内乱,然亦常有相继血战。此不过是一人之贪欲,中国暂时受苦。无论有了何等主人,国中即复如前。中国也曾为外国人所平复,然仍是暂时之乱,即平复中国之满洲王,定比用中国之风俗律例。此可谓胜中国人以力,而中国反胜之以文。

到了《澳门月报》中,这段译文被润色为——

……中国非无变乱,不过暂时受害,乃有一主,即复统一如前。即平复中国之金朝、元朝,必



林则徐

用中国之风俗律例。此可谓胜中国人以力,而中国反胜之以文也。

两相对比,就发现后者比前者精炼、文雅,并将直呼“满洲王”之处改成了“金朝、元朝”,这当然是为了避讳了。

当然,无论是《澳门新闻纸》中原汁原味的译稿还是《澳门月报》中的修改稿,都不对外发行。这些译稿只供林则徐用以掌握“夷情”。林则徐看过之后,也常寄给邓廷桢、怡良等重要的同僚,觉得有必要让皇帝了解的,再送呈中央政府。这样的译报跟中国人真正创办报纸显然还有着一段相当的距离,不过,说《澳门新闻纸》和《澳门月报》是中国早期的“内参”似乎并不为过。

林则徐组织的译报活动虽然持续的时间只有一年多(林则徐被罢官后,译报班子被解散,译报活动也就停止了),但它显示了官方有识之士对近代报刊的重视,是国人创办近代报刊的先声,推动了近代报刊在中国的发展。

(责任编辑 吴思)

思想打架

——精神现象零拾之十六

● 陈四益 文 丁 聪 画

读思想史，常常有看打架的感觉。打架的因由不同，方式与结果也两样。

不同思想派别的打架，是因为“道不同”。道不同，不相为谋，各说各的不就行了？不行。因为每家都以为自己的思想是最好的、最正确的，所以就容不下“异端”，一定要鸣鼓而攻之。攻之其实也不妨。本来，思想只有比较好的，没有绝对好的，有人来攻，才会有防。你攻我，我也可以反攻。攻来攻去，把对方学说的漏洞都暴露出来了，于是解释的解释，补苴的补苴，可以表述得更加严密也更加完善，思想也就丰富了、发展了。不过，这样的情况，只出现在双方都无思想以外的力量可以借助的时候。一旦有了外力尤其是政权势力可以借助时，有势力的一方便觉得争来争去太过麻烦，解释补苴太过罗嗦，不如让对方闭上嘴巴来得简便。要对方闭嘴也不难，把他抓起来或者关起来就是。发现了这个秘密，谈思想的人便把争取权势当作光耀学派的不二法门。一旦得了权柄，思想也便风行。这时，架也打不起来了。思想史每到无架可打的时候，横说公有理，竖说也是公有理，一家独尊，一支独秀，也就索然无味了。没有了对立面，谁也不敢挑刺儿，即便是比较好的思想，在保持了“永恒正确”的同时，也就保持



了“永恒停滞”。

停滞是思想败坏的开始。败坏的催化剂则是另一种“打架”——“真诚的思想家和冒牌的思想家之间打架”。真诚的思想家是那些思想的真诚信奉者，他为推行所信仰的思想而求助于权势。冒牌的思想家则是那些借思想获利者，他为权势而利用思想，但并不准备真正实行。汉代的儒学，因权势者的支持而取得了独尊的地位。但权势者看中儒学，只是因为它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一套设计（即陈寅恪所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於《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至于仁政啦、义啦，民本啦，选贤任能啦，忠呀孝呀，不过是挂在嘴上哄哄人的。真诚的思（下转 51 页）

本期：终审 徐 孔

执行主编 吴 思

审校 赵友慈

欢迎继续订阅

《炎黄春秋》

求实存真 秉笔直书 以史为鉴 与时俱进

《炎黄春秋》是以史为主的综合性纪实月刊。以弘扬中华文化、增进爱国大团结为办刊宗旨。对古今中外、特别是当代革命和建设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是非功过，依据翔实的史料秉笔直书，不增美、不溢恶、不媚俗，求实存真，以史为鉴，以史资治，在林林总总的期刊之林中具有鲜明特色。

《炎黄春秋》拥有一大批高水平作者。他们有的是老革命家，是革命和建设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有的是资深的专家学者，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有深入研究。他们的文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史料价值，在海内外读者中享有很高声誉。

2004年以来《炎黄春秋》订户逐月上升，希望广大读者下半年继续支持本刊，订阅本刊。

本刊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总发行：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82-507 国内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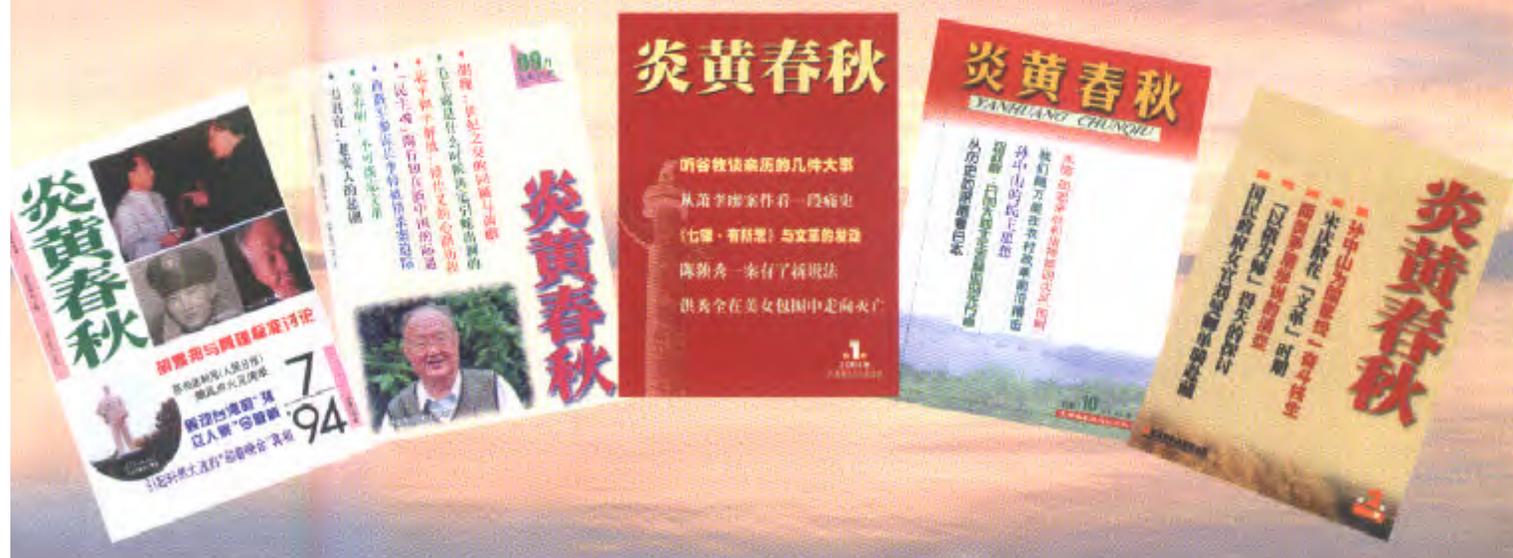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邮发代号：1274M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68532048 68532569

如在当地邮局订阅有困难，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订阅，免付邮费。



- 目送胡耀邦的灵车
- 韩国华侨的今昔
- 纪要：江青文革中的“碑石”
- 也谈秦家店的来由及其内涵
- 张闻天在苏区建设中的民主主张
- 林则徐译报：中国人办报的先声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4.80元

炎黄春秋

2004/7(总第148期)

社长(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社长 :徐孔(常务)

执行主编 :李晨 徐庆全

编辑室主任 :赵友慈

办公室主任 :底先华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理事长 :陈渊

秘书长 :徐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管

本刊长年法律顾问 :

张思之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271606)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 :100045

电话 (010) 68522852(办公室)

(010) 68534879(编辑室)

(010) 68532048(发行部)

传真 (010) 68532569

印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 :龙源期刊网

网址 :www.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E-mail)地址 :

Yanhcq@sina.com

出版日期 :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079号

定价 :4.80元